

公益慈善周刊

2013年3月3日

2013年第07期(总第061期)

◎微观点

◎政策点击

- 全国政协社法委组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协商 5
- 中央财政今年购买 470 个社会组织项目 9
- 民政部将采取有力措施 逐步解决社工薪酬待遇问题 10
- 今年民政部专项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预算达 2 亿元 11
- 李立国：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 推动民政事业科学发展 12
-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召开新闻通气会 17
- 非公募基金会可在温州直接审批登记 19
- 厦门市首次登记管理非公募基金会 20

◎专家视野

- 王振耀：社会组织发展将迎来巨大机遇 21
- 王振耀：大额捐赠需佐证 23
- 邓国胜：公众捐赠停留在眼泪指数阶段 27
- 刘玄奇：2013 公益十大猜想 29

◎行业观点

- 人民日报：深圳社工为什么留不住 32
- 公益时报：使用不到两年老山希望小学因征地被废，公益资产、品牌如何保障 35
- 社科院法治蓝皮书：我国慈善制度体系存在很多法律空白 38
- 中国环保公益诉讼路途遥遥 39
- 慈济的细节 42
- 官办慈善，如何转身 46
- 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模式 48
- 北京法官认为志愿者服务受伤也应是工伤 50
- 崔永元：让公益成为体面的行业 51

程玉：如何解读可持续发展与创新	54
程玉：改造世界与改善自身——在银杏伙伴 2013 昆明聚会上的发言	58
程刚：中国基金会：2012 “正能量”	61
王维嘉：自保、自治、自律——企业家 NGO 的公共诉求	65
冯仑：民营企业和个人已成为公益慈善主体	72
刘选国：从国际红十字组织建设看中国公益组织建设优劣	79
焦兴旭：也说公益领域的社区之争【作者投稿】	82
◎行业动态	
第五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揭晓 2012 年十大公益新闻事件	83
首届全国高校公益论坛暨公益未来项目启动	84
中国慈善捐赠进入百亿级时代	87
中国红十字会酝酿财务制度改革	88
乐施会“品牌背后”全球倡导活动在中国启动	89
广州部分非营利社会组织免税困难 地税局回应申请有三注意	91
桃源居移交逾亿元社区公益资产——开创国内政、企、社顺利对接社区治理新模式	92
深圳民管局设专案组调查深圳狮子会菩提服务队	93
民间收养“收编”之感	96
◎公益人	
银杏伙伴成长之路	103
王静艳：“这个项目不虚伪”	122
◎国际观察	
美国公益风险投资运行概述	124
看国际基金会如何做工作评估	133
视觉春天：给穷人更好的视觉	139
Professor H. I. Latifee：全球化语境下的格莱珉模式	141
TOMS SHOES-买一捐一背后的隐忧	143
◎企业社会责任	
2012CSR：入春	146
发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149
博世中国慈善中心发布慈善项目三年计划	150

媒体批肯德基做伪善公益	152
◎专题报道	
盖茨这样做慈善	154
重新定位国际援助	164
◎公益布告栏	
NPO 财务 3A 培训——阿里班学员招募书	168
全球 CSR 专家探讨如何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水平	170
2013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申请说明	172
VS0 分享：搜索引擎优化 (SEO)	175
加措活佛做客京师公益讲堂，畅谈“佛法与公益”	176
◎新书快递	
守护自然·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TNC 不寻常的成长故事 [平装]	177

◎微观点

关于中国慈善联合会的定位，个人认为，它是但不止是慈善组织联合会，它是但不止是慈善家联合会，它代表和维护的是整个慈善行业的利益，维护包括捐赠人、慈善组织、志愿者的、受助人的合法权益。它是整个慈善行业的大本营，大联合，大团结，而不是一个会员俱乐部，更不是精英的小圈子、政府的小衙门。

——@刘佑平

转帖，#第五届公益新闻年会#旅游卫视韩国辉总裁说，他规定旅游卫视每天至少播出 10 条公益宣传片，大家如果有公益宣传片可以发给他们，达到播出要求的，可以免费播出。

——@洛午

昨天和一个公益组织讨论财务透明度的问题：1. 组织在国外定位是 NGO，在中国注册是企业，有律师建议基于企业的性质不用公开；2. 因为有很大的现金流，害怕公开财务会造成公众质疑；3. 不知道公开财务报告的范围应有多大；4. 到底向谁报告。我觉得：1. 公开、公平、公正就行。公益人，你觉得呢？

——@何智權 Brian

围绕生态的美丽中国的议题可能会成为今年的公益热点，好的环保组织的作用并不在于它要如何展示它是一个环保专家，而是它能够极大而持续地动员公众的关注、参与和自发行动。强的环保组织则表现在它能够以环境为价值整合各界的资源 and 能量。当前，急需跨界联盟，急需南北呼应，急需民主环保方面的领军人

——@朱健刚

[【返回目录】](#)

◎政策点击

全国政协社法委组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协商

在政协常委会和主席会议的领导下，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按照全国政协工作的总体部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议政建言，努力开拓创新，在加强团结民主、维护公平正义、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编者

2012年9月11日，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会议厅内灯火辉煌、座无虚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专题协商会在这里举行。

社会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和基础。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管理”日渐成为当代中国的高频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更是被称为中国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之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3月，“社会管理创新”第一次被以重要篇幅写进政府工作报告；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出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全党全社会的一篇大文章，也是人民政协献计出力的一个大课题，而这次协商会也是十一届政协的最后一次专题协商会，被媒体称为十一届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的压轴大戏。

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社会管理领域的重点问题；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法制保障……会上，政协委员们带着对社会管理的深沉思索，纷纷建言献策。而此前，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牵头组织下，有关专门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积极参与，通过各种形式广泛深入了解有关情况，研究相关问题。协商会上各位委员的发言，就是他们思索、总结、升华的结晶。

建设服务型政府 保障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攻方向，不是要加强对社会的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强和创新不同于行政管理的名副其实的社会管理，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协商会一开始就对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

创新管理，服务为先。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切实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让群众权益得到保障、心情更加舒畅。

但旧的管控思维不可能迅速去除，原有的工作方式还有一定惯性。建设服务型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李君如的发言准确叩击社会管理的重点难题，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

很多委员表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如果没有政府改革，如果不能把一个全能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政府要在社会管理的观念、方式和体制上进行深刻反思和积极探索。在管理理念上要变“让群众服从”为“为群众服务”；变“为民做主”为“公民自治”，不要事事由政府出头；把政府为群众服务与群众自我服务结合起来。在管理方式上，要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可以推广北京、上海建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的经验，同时理顺社会工作委员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

在转变政府服务方式的同时，委员们也很关注民生的改善问题。其中如何维护留守妇女儿童权益的问题被广泛提及。其实，早在 2011 年 6 月至 8 月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就组成调研组，就“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情况”赴湖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区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分别与省、市、县、乡(镇)党委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有关专家及农村干部群众和留守妇女等进行了座谈，实地考察了农村小区、妇女儿童活动场所、吸纳留守妇女就业的企业、留守儿童寄宿学校，还慰问了贫困留守妇女儿童户，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截至 2010 年底，全国有留守妇女 4800 万，留守儿童 5600 万。留守妇女生产生活负担重，心理压力，婚姻家庭不稳定，权益易受侵害；留守儿童亲情关爱缺失，教育引导缺位，人身安全缺乏保障。他们的生存发展状况是需要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黄晴宜表示。

针对这些问题，委员们建议，应把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统筹部署，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落实和完善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同时也应加强农村妇女的教育培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并实施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

完善体制机制 加强法治保障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点多面广，只有坚持顶层设计、注重统筹规划、完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整体推进。

围绕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委员们从各个角度提出了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长张来斌代表民盟中央建议，建立健全事

关民生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凡涉及劳动就业、医疗保险、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先都要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李钺峰委员代表台盟中央在发言中提出，社会能否和谐有序、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诚信素质与诚信意识。当前，诚信缺失提高了企业间交易成本，阻碍了民族品牌发展，给企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在有的地方也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建议出台国家诚信教育规划，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不诚信行为的惩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经济发展指标比较全面具体，而社会管理比较抽象，缺乏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唐铁汉建议合理构建社会管理的绩效评估、决策监督和问责机制，使社会管理的责任得到落实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工商联主席李汉宇 2012 年 4 月至 6 月参加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的调研活动，到贵州、四川、辽宁等地对建设法治政府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问题进行调研。调研发现，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实施 8 年来，我国建设法治政府成效显著，同时问题不少。比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进展不平衡，重大决策公民参与不够，行政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等。他建议，要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李汉宇的建议得到了在场委员的认同，很多委员表示，应加强社会管理法制建设，严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在全社会建设健康和谐的法治文化。同时也应重视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建议、改善政府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把那些政府不适合办、办不好的事务大胆地交给社会组织。对此，中央要在制度和政策上给予支持，尽快出台社会组织管理条例。

2012 年 3 月下旬和 4 月上旬，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曾组织调研组，分赴广东、湖南、江苏、上海等 4 省市就“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专题调研。先后召开 20 多个座谈会，与地方党委、政府、政协、有关部门、社会组织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 300 余人进行了座谈和讨论，并实地考察了社会组织孵化园、社会组织工作机构，对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有感触。而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在互动发言中也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协调出台关于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的指导意见，培养一批影响力大的社会组织及公益项目。

点面结合着力解决重点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青少年犯罪预防、发展老龄事业、信息网络服务管理……解决好社会

管理重点领域涌现出的问题，重大而又迫切。

这些问题也深深地牵动着委员们的心。协商会上，委员们就各自关心的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要从根本上厘清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位，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完善体制机制，努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使他们成为良性发展、健康有序的群体。”

“当前，城市管理权责不对称，归口管理五花八门，暴力执法时有发生。对小摊小贩采取什么态度，反映我们的执政理念。我建议，要创新体制，敢于给城管独立主体地位。”

“当前小区建设还存在管理体制不清、小区职能行政化、自治机制运行不畅、政府投入不足，小区工作人员身份不明、素质不高、待遇偏低等问题，应把小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探索领导协调体制。”

委员们将社会管理领域的重点问题一一指明道破。而毋庸置疑，抓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大重点难题，因此，也得到了委员们的格外关注。

大家纷纷表示，应加快编制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设定不同类型的城市落户条件，并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机制。建立健全以统筹资金、校企联合、订单培训、直补企业等措施为主的流动人口培训机制，逐步提高劳动力素质。解决人口统计指标公安、统计、计生部颁标准不统一问题，完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和人口流动迁移动态监测体系。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说，按照中央部署要求，2011年下半年中央综治委实有人口专项组成立以来，协调组织22个部门和单位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如期完成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政策总体研究报告。公安部也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项目建设。今后，公安部将加快推动加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建立健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分类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建立和实施居住证制度。

在这次协商会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了52篇会议发言材料，27个部、委、办领导到会听取委员意见建议，会议得到了国家相关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而在过去的五年里，社法委为推动民生改善、推进司法改革、促进社会和谐所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中共十八大报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壮丽的征程，也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描绘了更加美好的前景。在未来五年，我们将毫不懈怠、尽心尽力、有条不紊地做好社法委当前各项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继续围绕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法委主任张福森表示。

来源：中国政协新闻网

地址：<http://www.cppcc.gov.cn/zxww/2013/02/26/ART11361862791158299.shtml>

[【返回目录】](#)

中央财政今年购买 470 个社会组织项目

近日, 2013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工作完成。据民政部网站发布消息, 根据《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民政部关于印发〈2013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和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2013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共立项 470 个项目。

2012 年 12 月 11 日民政部印发关于《2013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显示 2013 年项目预算总资金为 2 亿元。其中发展示范项目(A 类)约 5000 万元, 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B 类)约 7000 万元,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C 类)约 6000 万元, 人员培训示范项目(D 类)约 1500 万元。

记者从立项通知里发现, 最终 A 类立项 189 个项目, 主要支持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西部困难地区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服务、养老服务、医疗救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社会服务活动, 每个项目资金为 25 万元。

B 类最终立项 112 个项目, 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 34 个。在全国性社会组织中, 获得支持最多的是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申报的“地球站”公益创业工程项目、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申报的留守儿童关爱试点项目和中国经济林协会申报的受灾群众救助试点项目, 每个项目资金为 130 万。地方性社会组织获得的项目资金则从 19 万到 100 万不等。山西省晋中市扶贫开发协会的太行山革命老区“千村万户”玉米高产扶贫示范项目就在 B 类中, 会长任张广告诉《公益时报》, 这已经是协会第二年立项, 获得了 50 万元支持。任张广表示, 2 月底, 70% 的项目资金即将到账, 其余的 30% 将在年终评估结束后到账。

C 类立项 116 个项目, 项目以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等社会服务活动为主。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 34 个,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妇女手工编织协会的发展妇女手工编织促社区和谐安定示范项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关爱青少年彩虹行动示范项目获得支持最多: 每个项目资金 130 万。其他地方性社会组织获得的项目资金则从 21 万到 50 万不等。

立项数额最少的为 D 类, 共立项 53 个项目, 支持具有教育培训职能和培训经验的培训机构(包括社会组织)开展社会组织负责人、业务工作人员培训。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 5 个。53 个项目获得了从 10 万到 40 万不等的支持。

来源: 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3-02/26/content_5271.htm?div=-1 [【返回目录】](#)

民政部将采取有力措施 逐步解决社工薪酬待遇问题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 2012 年底，我国已拥有近 30 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其中取得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人员 84126 人（社会工作师 19525 名、助理社会工作师 64601 名）。

当前，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还比较低，总体看低于同级别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有不少地区甚至比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还低。这种较低的薪酬待遇水平，难以吸引、留住社工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社工人才。

为解决这个问题，民政部推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明确要求建立薪酬保障机制；将专业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范围；要求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推动解决在民办机构就业的社工工资待遇问题。

下一步，民政部还将采取更加有力措施，逐步解决社工薪酬待遇不高、职业吸引力不强问题。

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晋升机制。制定社会工作者和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评价办法，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形成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水平评价体系，将取得职业水平证书的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人员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范围。

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薪酬保障机制。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保障和表彰奖励，在城乡社区和公益类社会组织工作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求所在单位合理确定薪酬水平；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工作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工资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在事业单位从事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可享受相应职级的职称待遇。鼓励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办理社会保险。

三是畅通流动选拔渠道。鼓励公益类社会组织吸纳一定比例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并以此作为评估公益类社会组织的重要指标和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条件。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聘、招聘社会服务相关职位工作人员和选拔干部时，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录用具有丰富基层实践经验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注重把政治素质好、熟悉社会服务与管理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吸纳进基层党员干部队伍，选拔进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支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入地方基层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来源：人民日报

地址：<http://www.chinanpo.gov.cn/1940/61473/index.html>

[【返回目录】](#)

今年民政部专项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预算达 2 亿元

正在十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稿中，国务院组成部门民政部涉及在社会管理等方面扩大职责。多个民政系统人士说，与其他经济管理部门相比，其职能转变自 2011 年起已有明确方向，今后是否持续有效，取决于是否有更高层面的资金和制度支持。

民政部现有职能中，即有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和民间组织管理、社区和基层自治组织管理等都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在“十二·五”规划的专门一篇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原则是“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统筹兼顾，动态协调”。

在这一原则下，“民政部扩权”会有怎样的方向和空间，正在引起业界专家讨论。一位就职中共中央副部级智囊机构的承担相关项目的专家对本报说，在社会管理诸多职责中，民政部门有能力“扩大”或“增强”的部分，恰恰有很多是需要“政府丢出去的职能”。这位专家说，其中社会组织管理是最显著的领域。

一位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高层在内的多个民政系统消息源称，在三类社会组织(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法规修订草案中，将双重审批制转为登记备案制，增加无业务主管单位组织数量的试点，已经得到认可。虽然三个条例修正案未能在本届政府任内公布实施，应该不会影响改革趋势。

此外，在社会组织内外部强化党组织的覆盖率和作用；将政府职能更多转向社会组织的做法，也会同时加以延续。

另一方面，如何发挥这些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尤其在急需资金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领域，民政系统不像负有投资职责的政府部门，在预算中的稳定增长份额。其体系内主要可用于开发新项目的资金，主要有一部分彩票公益金收入和其主管或发起的慈善组织的捐赠收入。民政部认为这种投入能起到带动作用。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曾被视为调整结构的实现形式。在政治局委员汪洋推动下进行改革的广东省，曾将培育社会组织视为体制改革的首要办法。在广东 2013 省级财政预算中，直接相关的资金只有购买服务专项经费和孵育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各 1 亿元。本报记者获悉，2013 年中央财政预算草案中，将专项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也稳定在 2 亿元。

以财政部、发改委和民政部对优秀试点地区上海市的调研报告为例，2011 年当地各级政府用于购买社会服务的财政资金达到 41.02 亿元，在其 3436 亿的财政支出中，仅占 1.2%，在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支出大类中，也仅占 10%。并且当地各区级政府的支出规模并不均衡和稳定，以 2012 年为例，仅闵行区区级财政此项支出即有 23 亿元，之后较好的静安区仅为 6500 万元。

自 2011 年开始，在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等几个领域，以民政部草稿为蓝本，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体系建设”文件，但“增加财政投入”方面没有量化规定，仅能由各地量入为出。“如果像明确低保标准一样，进一步明确中国要实施怎样的福利制度，应该有多少资金进入这些领域，可能才会带来大的变化。以我个人的经验，如果没有大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仅进行民政内部资源和机构的调整，可能效果有限。”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

两位民政部特邀专家分析，目前要从整体上提升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标准还有困难，专项社会事务是民政部回应社会期待的主要做法。比如，过去两年该部门推动“免费午餐”和“大病医疗”。在减灾救灾领域，民政部曾通过国家减灾委员会平台和一系列明确责任分级的法律和预案，掌控了比较明确的协调主导权，此次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扩权会采取怎样的机制，目前仍没有准确消息。

以该部近年着力最深的养老领域为例，其 2012 年 7 月制定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中，关于资金方面，最实际的一款即是“各级民政部门福利彩票公益金每年留存部分要按不低于 50%的比例用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此外文件中对地方财政、土地、税收政策的倾斜政策，由于直接下发到各地民政系统，很难对各地政府有直接的约束力。此外如慈善组织的普遍减税政策，也存在尚未彻底解决的协同问题。

现年 60 岁的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近年多次说，希望提升这个部门官员运用市场化机制的能力。他在两年前提出“民政公共产品”的概念，提出要运用多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提升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等领域的供给效率。该部门也不同于拥有优良资产资源的一些经济管理部门，与市场化主体合作更依赖政策支持，这方面仍需要和多部门协同。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6976>

[【返回目录】](#)

李立国：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 推动民政事业科学发展

近日，李立国部长在《人民论坛》2013 年第 6 期撰文《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 推动民政事业科学发展》，全文如下：

在社会建设中，要通过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增强社会自治和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民政骨干作用

2013 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关键一

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重要一年。全国民政系统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贯彻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统筹谋划民政工作。

要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着力发挥民政在加快城镇化建设、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方面的作用；在政治建设中，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和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在文化建设中，通过加强烈士褒扬、发展慈善事业、开发地名文化、开展志愿服务等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通过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推行绿色节地文明殡葬，既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又保护自然环境；尤其在社会建设中，要通过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增强社会自治和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民政骨干作用。

继续加强以综合防御能力为支撑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

2013 年，民政系统要深入贯彻《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继续实施防灾减灾“十二五”专项规划，完善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联动机制，做好有关项目论证工作及尽早实施。大力推进农村住房保险工作，促进政府救助、社会捐赠、灾害保险有效衔接。接续实施 11 个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新建改扩建项目，优化中央救灾物资代储布局，提高救灾物资储备的标准化水平。继续推动建立各级特别是省级以下减灾救灾综合协调机构，60% 以上的省份成立省级减灾中心。贯彻防灾减灾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重点加强村级灾害信息员队伍业务培训。广泛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新建成 1200 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同时，要继续完善各级应急预案，普遍建立省以下救灾资金分担机制，提高救灾补助标准，加强灾情核查和评估，规范救灾物资和资金管理使用，切实做好受灾群众应急救助、过渡期生活救助、冬春救助、倒损农房恢复重建工作。

加快发展以养老服务为主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事业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审议通过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务院将要出台《关于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若干意见》。民政系统要认真贯彻上述法律和政策文件并结合“十二五”专项规划实施，继续开展“推进年”活动和实施“敬老爱老助老工程”，推进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相互衔接和共同发展。要完善和落实政策措施，支持多元主体发展居家养老服务，逐步建立居家失能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普遍建立为老服务热线、紧急救援系统、信息网络系统，为居家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康复护理、辅具配置、安全援助等服务。要积极支持发展以日间照料为主的社区养老服务，加强城乡社区老人日间照料、托老所、互助养老等服务设施建设。要依据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国家层面制定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鼓励民间资本和多元主体兴办养老机构，实施全国

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工程。要推动高龄老人津贴和生活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基本覆盖，探索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同时，要落实和完善孤儿保障制度，做好向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费工作，推进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建设。协调制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策，发展康复辅具事业，协调调整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残疾人集中就业。

切实做好以退役士兵教育培训为重点的优抚安置工作

2013 年，民政系统要深入贯彻《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和国发〔2010〕42 号文件，切实加大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力度，努力使退役士兵有专长、有能力按社会需求和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加强教育培训政策宣传，创新教育培训形式，推行异地教育培训、承训机构直接补贴、购买社会组织培训服务，制定教育培训机构选定标准，健全培训考核体系、机构评估和年检制度，加快形成覆盖城乡的退役士兵就业服务信息网络。要制定符合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岗位落实刚性措施。同时，要探索创新优抚安置工作服务管理体制机制，按法定原则调整提高抚恤补助标准，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工作，推进优抚信息系统部、省、市、县联网，推动《退休军官安置条例》制订工作，加强优抚安置事业单位能力建设，规范军休服务和军供站建设管理，纪念延安双拥运动 70 周年，开展“关爱革命功臣、情送基层官兵”活动。

协调推动有利于健康发展和作用发挥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2013 年，民政系统要加快推动修订 3 个条例，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发挥服务社会作用。稳步推进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按照国务院即将出台的行业协会改革试点意见积极开展行业协会直接登记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继续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和异地商会登记管理权限，扩大地方试点管理涉外社会组织范围和领域，在设区市和县（市、区）设立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要依托城乡社区，依据群众需求，简化备案登记手续，大力发展基层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要加快出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政策文件，既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又提高社会组织承接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中的作用。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式，重点发挥行业协会反映诉求、维护权益、行业自律的作用。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塑造品牌与服务社会活动，促进民办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发展枢纽型、联合性社会组织，利用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社会组织。同时，要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分类评估，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率达到 70%，地方社会组织评估率也要明显提高。完善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和失信惩罚机制，加强对离岸社团、网络社团和在境内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监管，依法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行为、坚决取缔非法社会组织。

深入推进以完善社区治理为着力点的城乡社区建设

2013 年，民政系统要着重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发展社区服务，增强城乡社

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推动修订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完善村委会选举规程，探索外来常住人口参加居住地选举的方式，依法开展村（居）委员会换届选举，重点加强“农转居”村、村民居民混居村、流动人口聚居地等村（居）委会建设，抓好“难点村”后续治理等工作。促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更好地行使自治职能，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规范村（居）民议事活动，提高基层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水平。推广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村务公开目录和程序，完善居务公开制度和民主评议规则，强化基层民主监督。要继续实施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十二五”规划，贯彻落实“福州会议”部署，加快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比上年增长 10%。要推动制定《关于加强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深入开展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扎实推进全国社区管理和创新实验区工作，积极完善与人口大规模流动、利益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社区建设体制机制，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服务完善、管理民主、充满活力、和谐幸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扎实开展区划地名工作

民政系统要推动制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和城市型政区设置标准，逐步优化大中城市市辖区结构，支持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县城、兵团垦区、重要边境口岸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促进现有城市群功能提升、布局优化，支持新的城市群培育和发展。继续配合开展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加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论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稳妥做好行政区划调整审批工作。推动建立平安边界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推进全国平安边界创建示范活动，启动全国第三轮省界联检和省界界桩更换试点工作。推动修订《地名管理条例》，加强地名规范管理和示范工程建设，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推进地名文化建设，完善地名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国家区划地名信息化工程建设。

努力提高专项社会事务管理服务质量

民政系统要推动修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认真贯彻国办发〔2011〕39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大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尤其是街面、社区主动救助保护力度，巩固“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成果，联合开展“流浪孩子回校园”专项行动，切实做到街面发现一个就主动及时救助保护一个，同时规范流浪未成年人家庭寄养、支持重点县（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建设、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探索开展未成年人社会救助保护工作。要启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和全国公民婚姻状况数据库建设，规范结婚、离婚登记服务。推动出台《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条例》，制定收养评估、华侨收养子女登记等办法，建立全国统一的收养登记公告平台。推动修订《殡葬管理条例》，扩大基本殡葬服务惠民范围，加强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推广生态节地型殡葬方式，提高殡葬服务标准化水平，筹备开好第四次全国殡葬工作会议。

广泛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民政系统要贯彻相关规划和意见，落实“上海会议”部署，依托社区、立足民政、面向社会，实施社工人才培养计划，完善行业社工政策，开发专业社工岗位，发展民办社工机构，广泛深入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积极落实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制定有关特殊人群专业社工服务计划方案，实施“三区”专项计划，启动社工服务标准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按群众需求提供社工服务，尤其要为残疾流浪儿童、不良行为青少年、精神病病人、艾滋病病人、吸毒人员等特殊人群提供专业疏导和矫治服务。积极实施志愿服务记录办法，认真做好志愿服务记录试点工作，着力构建志愿服务记录信息平台，广泛开展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助幼、抢险救灾、环境保护、重大活动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大力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民政系统要继续深入贯彻慈善事业“十二五”指导纲要，推动慈善立法，协调制定《关于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的意见》，引导和激励越来越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加入慈善事业行列。鼓励企业以捐赠资金留本运营、利润分配、安置就业、股权捐赠、股息使用等方式参与公益慈善、帮扶困难群众。鼓励成立慈善领域行业性组织，继续举办深圳慈展会，支持宁夏“黄河善谷”等慈善产业园区建设，推广上海“公益伙伴日”做法，制定慈善超市建设和运营社会化的政策，继续推进公益慈善载体创新。福利彩票在高位运行的条件下，防控各种风险的压力增大，各级民政部门务必把安全运行、创新发展放在首位，继续贯彻《彩票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加强发行销售管理，开展公益金绩效评估，确保福利彩票持续平稳增长。

进一步加强烈士褒扬工作

民政系统要深入贯彻《烈士褒扬条例》，修订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办法，加大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力度，推进境外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完成零散烈士墓抢救保护工程总量的 90%、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程总量的 80%。协调制定《关于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烈士精神的意见》，完善烈士褒扬金发放和烈士评定备案制度，规范烈士祭扫礼仪，抓紧做好国家烈士公墓建设论证、中华英烈网开发、烈士英名录编撰等工作。

在 2013 年工作中，要增强法治意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民政立法工作、依法行政、执法检查力度。把民政标准化建设摆到更加突出位置。争取 2013 年完成“金社”工程立项工作，扩大“12349”全国民政公益服务热线开通范围。认真贯彻全国民政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加强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开展民政行业领军人才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遴选工作，加快民政职业种类和业态发展。要强化民政基础研究和康复辅具、减灾救灾、殡葬等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民政科研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大力推进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运营机制创新，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加强

民政领域国际合作、涉港澳台交流，加大境外资源利用力度。民政系统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扎实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对中央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政风行风建设和纠风工作力度，完善民政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提高勤政廉政水平。

来源：民政部网

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302/20130200422602.shtml>

[【返回目录】](#)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召开新闻通气会

为及时回应新闻媒体关于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工作的关切和采访要求，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于2013年3月1日下午召开新闻通气会。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詹成付司长、王素英副司长、徐建中副司长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通气会由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王金华主持。

会上，詹成付通报了2013年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工作打算，主要有：

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广泛深入宣传贯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推动实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继续开展“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年”和“敬老爱老助老工程”活动，完善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监测指标体系，扩大高龄津贴和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实施范围。会同发展改革委制定《关于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意见》。研究制定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及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加大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推进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拓展儿童福利事业。落实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扩大儿童福利保障范围，推动建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推进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出台《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和《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推动制定《儿童福利条例》，加强儿童福利立法工作。继续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制定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规划，加快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体系建设。制定《加快促进儿童福利机构发展指导意见》，提升儿童福利机构管理水平，推动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发展。建立完善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长效机制。抓好儿童福利合作项目资源

整合、开发和运用。

完善残疾人福利政策。大力推进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力度。一是做好调查研究，尽快形成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设计；二是继续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加强残疾人福利机构建设。继续加大投入力度，2013年，民政部继续投入部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加强残疾人福利机构建设，提高残疾人福利服务水平和康复养护水平；做好福利企业服务与管理的工作。联合中国残联，继续协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调整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残疾人集中就业。进一步加强福利企业资格认定管理的规范化水平，研究建立福利企业产品服务政府采购优先制度。

加强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和公益金使用管理工作。研究制定《福利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建立福彩公益金信息系统，加强公益金使用的社会宣传。制定《福利彩票废票、尾票销毁管理办法》。优化彩票品种结构，创新丰富彩票游戏，规范电话销售业务，论证、探索互联网销售方式。加强彩票业务规范和制度建设。在保障安全运行基础上，保持彩票发行销售平稳增长。加强销售网点建设，提升服务水平。深化福彩文化建设。

支持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推动《慈善事业法》立法工作。协调制定支持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慈善行为倡导及联动机制，政府与媒体相互合作的慈善宣传机制，政府主导、机构自律的慈善信息统计与披露机制。制定慈善超市建设和运营社会化政策，完善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做好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继续支持深圳等地举办慈善项目交流展示活动。

此外，就社会普遍关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儿童福利发展、个人和民间机构收养孤残儿童、慈善文化环境建设、慈善立法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来源：民政部门户网站

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303/20130300423579.shtml>

[【返回目录】](#)

非公募基金会可在温州直接审批登记

基金会数量：截至 2013 年 2 月 25 日，我国基金会总数达 3040 家，其中公募基金会 1325 家，非公募基金会 1715 家。2013 年 2 月 2 日，我国基金会数量首超 3000 家，其中公募基金会 1319 家，非公募基金会 1683 家，共计达 3002 家。数据来源：基金会中心网

2013 年 2 月 20 日，“温州市鹿城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在温州市行政审批中心民政窗口获准审批，这是温州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首家基金会，也是全国首家在地级市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据悉，该基金会以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引导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为宗旨，将资助社会组织解决启动资金和办公经费困难，资助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超过 2000 万，向民政部提出设立申请的非公募基金会和境外基金会在华代表机构的登记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和不属于前款规定情况的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工作。

温州市作为地级市，实施这一举措则得益于今年 1 月 16 日，民政部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签订的《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协议》。其中，民政部同意浙江省民政厅授权温州市民政局开展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试点工作。具体内容包括引导和鼓励个人、企业等社会力量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支持非公募基金会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同时，要求制定更多非公募基金会优惠鼓励政策，并加强对非公募基金会的监督管理。

温州市民政局负责基金会审批工作的王姓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措为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参与公益事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以前登记非公募基金会都要省民政厅管理，要预登记、交材料、审批环节，少说也要跑杭州三四趟，每年评估、年审也要到杭州去，过程很繁琐。我市获得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限后，可大大方便本市非公募基金会审批办理，同时也方便监管机关对其进行管理。”

截至目前，温州市在浙江省民政厅登记的基金会有 41 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 26 家。王姓工作人员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温州市鹿城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是民政部同意浙江省民政厅授权温州市民政局开展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试点工作以来首家登记成功的基金会，目前，还有 3 家基金会提交了登记申请，基金会审批过程非常顺利，耗时远低于法定的 60 个工作日。同时，他补充，公募基金会的审批工作还继续在省民政厅或者国家民政部进行。

此前的 2009 年 7 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推进深圳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明确授权深圳市民政局可以对基金会和跨省区的行业协会、商会进行登记管理。温州则是首个有

资格审批基金会登记工作的地级市。

2011 年 12 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民政会议上表示“将下放非公募基金会的审批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可以解放更多的爱心生产力，让民间慈善迎来全新的发展”。

“温州市鹿城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的获批拉开了温州市非公募基金会登记试点的大幕。温州市民间组织登记中心主任蔡建旺表示：“今后只要是非公募基金会，都可在温州市民政局直接登记了，不仅更方便，也更利于监管。”

对此，有专家表示，非公募基金会作为一种引导个人和组织财产流向社会，主要用于救助弱势群体公益组织形式，有助于削弱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温州市经济发展迅速，商人较多，作为试点可以看成民政部鼓励非公募基金会注册的一个信号。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302/147132.aspx>

[【返回目录】](#)

厦门市首次登记管理非公募基金会

厦门市翔业爱心基金会最近正式成立，成为福建省民政厅下放审批权后厦门市首家由市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非公募基金会。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规模逐年扩大，与此同时，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潜力和社会需求也在加大，下放基金会审批权有利于推动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行政效能的提高，为举办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也可以激活民间慈善力量，引导民间财富进入慈善事业。为加快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根据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有关精神，经福建省民政厅研究同意，改变基金会由民政部或省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现状，下放审批权，在厦门市民政部门试点登记管理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

厦门市民政局高度重视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授权工作，为此做了充分大量的登记准备，在接到拟申请成立厦门市翔业爱心基金会的相关报告后，对基金会名称、设立申请、法人登记申请、章程、场所等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同意成立厦门市翔业爱心基金会。该基金会成为厦门市首家由市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非公募基金会。据悉，厦门市翔业爱心基金会将积极募集资金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立足厦门乃至福建省贫困地区教育助学活动，主要资助学校办学、特困老师和学生，以及参与

其他公益慈善活动。

来源：厦门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

地址：http://www.xmmzj.gov.cn/xxgk/zwgk/rdxw/201303/t20130301_616886.htm

[【返回目录】](#)

◎专家视野

王振耀：社会组织发展将迎来巨大机遇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同时，多处论述涉及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甚至单独以报告的第七部分对“社会管理”进行论述。

这其中释放出怎样的政治信号？社会组织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局面？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如不出意外，“如何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又将成为广大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话题。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记者专访资深专家、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以上问题进行个人解读，或可为参政议政及建言献策提供更丰富的视角。

在王振耀看来，如果在“社会体制改革”的框架下看待社会组织发展，那么，后者无疑将迎来巨大的机遇。

记者：十八大报告多次提到“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组织”这 3 个关键词，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王振耀：我认为，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枢纽、基础或“承载器”。

未来几年之内，我们要达到人均 GDP1 万美元的水平。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仅是量的增加，而是意味着一系列新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要素的重新组合，意味着新的组织方式的产生，人们的社会需求会逐渐增多，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化社会服务。

这种社会服务，需要社会组织来完成。因为当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靠一户一家来提供服务显然满足不了需求；政府也不可能直接提供这些服务。比如，居家养老的老年人，需要送饭、喂食、聊天等服务，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可以直接提供这样细腻的服务。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只有发展社会组织，才能进行社会管理。

在我看来，这 3 个关键词释放的信号就是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要落脚于社会服务，要

发展各种各样的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展开各种服务。

记者:十八大释放出的政策信号，可能会带动一系列政策、行政要素的调整。您对此做何预期？

王振耀:首先，政府会鼓励更多民间组织注册、发育、成熟。未来，以家庭服务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会得到快速成长，这将对养老、儿童、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形成巨大的促进。

其次，慈善公益组织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更多的企业家会参与进来，下一步，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在未来会发展更快。我估计，每年的慈善捐款将达到几千亿元的规模。政策信号就是财富，它会带动大量捐款，捐款又会对公益事业产生出更大的促进。

再者，政府职能将产生深刻的变化，公共服务职能将得以强化。一方面，政府会加大投资，兴建更多的公共服务设施；另一方面，政府会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组织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鼓励专业化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政府的综合协调功能、提供资金规模及购买服务的政策会得到强化。

政府花钱、民间捐款，慈善事业得到发展的同时，政府和社会大众间的环节会不断强化，从而产生新型社会结构，这就是社会体制的建立。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养老服务，社会组织派出专业社工服务老人，政府在哪里？它在后面，提供信息、资金、政策，并监督社会组织。

此外，社会道德的建设方式会产生深刻变化，公众参与的方式也会变。

记者:十八大报告单独拿出一个部分(第七部分)来讨论社会管理，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管理的涵义有所变化？今后，社会组织的发展将处在怎样一个格局中？

王振耀:我认为，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社会管理，是服务型、保障型的社会管理，是提升老百姓生活质量的管理。

这次把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健全各种保障体系纳入了社会管理，这是和以往的一个重大区别——它把服务放在了首位。

只有这样做，社会管理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管理，而不是一种被管的、要老百姓服从的管理，不是计划经济式的管理，也不是原来“维稳型”的管理。它通过解决老百姓日常的各种困难来实现社会管理，它在报告中被纳入社会建设，是建设性的。

你看十八大报告的第七部分，谈了教育、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和社会管理，又在社会管理中阐述了多个方面。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它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作为社会管理的重点，就是要服务人民。

记者:既要“政社分开”，又强调“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您是如何理解的？

王振耀:过去我们说的社会组织，大体上有3类:最高端的就是“政府组织”，比如工会、共青团、

妇联、残联等，其从业者类似于准公务员；第二类是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比如各种各样的政府退休人员办的或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办的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各类草根组织。

过去政社不分，注册组织要求有主管单位，这造成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的干预过多，或者别的部门很难监管有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这就需要政社分开。

社会组织应该是独立的，这意味着法律可能要做大修改。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改革，我认为经验比较成熟，可以尝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那么，在政社分开的背景下，我说的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比如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是否要取消它们呢？我不太同意简单的“去行政化”，这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我觉得，这些大型社会组织，可以不取消，而是进行功能转型，搭建桥梁和枢纽，与民间组织形成互动。比如，残联可以作为枢纽型的社会组织或机构，与助残类的社会组织进行良好的互动，为这些组织提供平台、资源等等；妇联也是一样，可以帮助妇女类的社会组织发展。

未来社会组织的格局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社会体制改革跟别的改革还不一样，它是转型，而不是剥夺某些人的利益，不是要取消现在的人民团体。

来源：人民政协网

地址：<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226/c34948-20602160.html>

[【返回目录】](#)

王振耀：大额捐赠需佐证

今年 2 月 1 日，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2012 中国捐赠百杰榜》（以下简称百杰榜），其中黄怒波和王文彪分别以 500 亿元、100 亿元的捐赠承诺位列榜单第一、二名。

榜单公布后，黄怒波所在的中坤集团却声明称 100 亿元捐赠是“愿景”而非“承诺”，此番变故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捐赠承诺”的讨论。

“背靠背”避免私下毁约

很多企业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承诺的压力，今后涉及承诺捐赠的问题都应当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得知黄怒波在榜单发布后发表声明表示自己 10 年捐赠 500 亿只是一个愿景，而不是一个承诺？

王振耀：就是榜单发布的 3 天后。

记者：你怎么看待榜单发布后黄怒波从承诺变为愿景的这种态度的变化？

王振耀：黄怒波在作出承诺后，根据捐赠的规则就要举行仪式。比如在国外，比尔·盖茨或巴菲特作出捐赠承诺后，都要举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现场可能会有律师等人在场。

而黄怒波在作出承诺以后，紧随其后有很多新闻报道，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社会的一个“仪式”，当百杰榜正式将黄怒波列在排行榜首位的时候，黄怒波可能才意识到，过去他是不是有做得不妥的地方，这个承诺可能是需要负责任的，随后可能他的理事会也需要据此作出严肃而庄重的决定。

记者：当时榜单发布前是否和本人沟通过？

王振耀：没有。与其他榜单不同，我们是背靠背进行的数据统计，主要是依靠舆论界，比如在网上、报刊上承诺的消息，并经过核实，但主要信息源是舆论界。

记者：为什么不和本人提前进行沟通？

王振耀：我们这个选材的标准就是这样，百杰榜主要依据舆论传播的原因是因为捐赠这件事情在社会大众面前已经得到了反馈，全社会都已经知道捐赠人要进行捐款了，如果要事前核实，面临的状况就会比较复杂。

比如我们事前核实以后如何跟舆论交代？正是我们这次做得比较规范，我们没有找本人进行核实，反而是找舆论报道来核实情况，舆论上的事实确切，黄怒波才感到需要正式澄清了。如果研究院和黄怒波在私底下澄清，可能又会出现问题，舆论仍会有质疑，就会出现第二个负面问题了。

因此，研究院定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客观上这对于舆论也产生了压力，报道的时候大家也需要更专业，这是一个互相提升的过程。

记者：你认为这是否能被称为诈捐？

王振耀：不妥，因为没有举行仪式，黄怒波只是表示而已，尚未成熟。前年在百杰榜中，黄怒波因向北京大学捐赠9亿而榜上有名，他真是在捐赠。诈捐这个词太重了。

我们并不想让这个事情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500亿这件事就算作一个插曲，通过百杰榜，把这件事澄清了也是件好事情。

记者：通过这件事总结出了哪些教训？

王振耀：其实就像黄怒波自己在微博中表示的，这是企业家需要上的一堂课。据我从侧面了解，很多企业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承诺的压力，今后涉及承诺捐赠的问题都应当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仪式可为承诺捐赠的佐证

咱们的慈善家现在要过一关，对自己做慈善时要规划、专业，如果承诺没有仪式，只是口头说说，那真的只能是表达愿望。

记者：出现这样的事情以后，承诺捐赠还可信吗？

王振耀：慈善界的承诺是一诺千金，根据《捐赠法》，承诺是等于捐赠的。不能随便承诺，宣布完社会就进入到一个监督。

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企业家也会逐步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不管是运用商业方式或是通过捐款来做公益项目。

因此，这只是一个开头，今后承诺捐款也会越来越多。

记者：什么样的承诺才可信？

王振耀：原则上，慈善界的承诺从全世界来看，只要举行过仪式，如果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一般都会兑现，几乎没有发生过违背承诺的情况。

我们国家没有举行仪式的习惯，也没把承诺这件事复杂化。诺捐后的仪式是什么，大部分都靠企业家自己说，随后也没有律师进行公证，更没有在公开场合下举行庄严的宣布仪式，捐赠双方也没有签订协议，只是口头上的表达，因此慈善就容易简单化。

咱们的慈善家现在要过一关，对自己做慈善时要规划、专业，如果承诺没有仪式，只是口头说说，那真的只能是表达愿望。

记者：如果承诺未能履行，是否有惩戒方式？

王振耀：一般还没有什么惩罚措施。

本来捐赠就会在名誉上有增加值，除非有天灾人祸或遭遇各种经济危机，那大家理解出现的违反诺捐的情况，但一般情况，如果作出承诺后又没履行，那承诺人自己的名声也会扫地的。

记者：此事是否也给百杰榜敲响了警钟？

王振耀：给所有的人敲了警钟。包括我们搞慈善榜的人，今后需要依据承诺仪式化进行梳理，特别是对于一些极大额的捐赠，需要有正式的仪式佐证，仅仅是对外宣称不能成为唯一的依据了。

74%大额慈善捐款集中环保领域

中国慈善发展一定是跳跃式的，中国的慈善条件成熟了，但很多体制有限制，因此会呈现出规则的跳跃式发展这样一个态势。

记者：此后百杰榜作出了哪些修改？

王振耀：除了更正之外，现在也在对新的数据进行分析调整。

记者：现在百亿捐赠额大部分集中在哪些领域？

王振耀：2012年大额捐赠的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了环保领域。以环保为主题的捐赠超过了100亿元，占大额捐赠总额的三分之二。

接收方面，基金会成为了主要的捐赠接收方，共接收捐赠总额109亿元，占有所有类型机构接收

捐赠的 74%。

记者：为何出现捐赠“扎堆”环保领域的情况？

王振耀：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也是一个大飞跃。

此前由于百杰榜纳入了黄怒波的 500 亿捐款，因此统计后的数据显示，大部分捐款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体现出了我们国家一个捐赠的特点，容易把捐赠救助说得特别重要，缺乏慈善和社会服务的有效对接。

但由于后来将黄怒波排除在捐赠榜之外，整个排行榜出现变化，数据结构调整以后，我们也发现，现在 74% 的资金集中在了环保领域。

这反映出，中国慈善发展一定是跳跃式的，中国的慈善条件成熟了，但很多体制有限制，因此会呈现出不规则的跳跃式发展这样一个态势。

慈善百亿时代的新挑战

如果百亿捐赠未来 5 年、10 年都能实现的话，那意味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现代慈善就到来了。

记者：你曾表示，百亿捐赠的出现还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来临。目前只有王文彪一人捐赠 100 亿，并且仍未履行，那还能称为百亿捐赠时代来临吗？

王振耀：当然，实际上还有捐款人未在公众面前承诺，因而舆论界没有报道的捐赠行为存在。

记者：百亿捐赠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王振耀：任何一个影响力项目的产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大量的资金才会带来大的社会感知和社会效应。

百亿元的捐赠就能做相当规模的慈善事业。如果百亿捐赠未来 5 年、10 年都能实现的话，那意味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现代慈善就到来了。

记者：什么是现代慈善的标准？

王振耀：现代慈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是对人提供直接的服务，这是财富转化为为人所用必须的环节。

记者：哪些因素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王振耀：我们做慈善首先想到的是“清流”，而西方做慈善首先想到的是“投资”，在欧美等国，慈善和商业联系得非常紧密，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就在研究怎样筹资，怎样募款。而在我国，现在对慈善的投资经营、专业的募捐还都接受不了。我国在现代理念方面还差得很远。

因此，仅仅强调人人做慈善，如果没有一套现代的运作机制，这样的慈善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记者：大额捐赠是否也会带来创新与挑战？

王振耀：前些年我们都是小额捐赠，小额捐赠要求什么？要求直接、迅速，要求当年就把钱花

得差不多，所以基金会条例规定每年必须花掉 70%，但亿元大额捐赠的来临，则对慈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比如说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注册时只有 25 万美元，但现在通过信托和投资，资金已高达 110 亿美元，光是每年的支出就有 5 亿-6 亿美元之多。而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捐了十多个亿，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收人家 6 亿的税，这不是慈善界的笑话吗？

百亿来了，那慈善界的财务管理如何呈现？怎样投资？又怎样来运营？你还能放在银行吗？这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来源：京华时报

地址：

<http://www.charity.gov.cn/fsm/sites/newmain/preview1.jsp?ColumnID=640&TID=2013022513514706665>

[4428](#)

[【返回目录】](#)

邓国胜：公众捐赠停留在眼泪指数阶段

2013 年 2 月 28 日，第五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暨中国传媒领袖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做主题演讲。他在致辞中指出，公益界是社会良心和信任的体现，公益新闻年会、公益媒体未来更多的探讨如何激发这个社会的正向能量，激发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爱。

以下为其实录：

主持人：下面有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为我们演讲。

邓国胜：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能够来参加会的对北京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用我们的辛勤的努力工作使我们北京的空气得到了更好的净化，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新环境。因为公益就是要去回应社会紧迫性的需求，这些年我们公益行业发展的环境确实产生很大的变化，我相信在五年之前很多同志没有听说过三聚氰氨，你们听说过 PM2.5 吗，你听说过雾霾吗，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学习了新的知识，这些都是我们面临新的环境。正是由于我们的环境发生大的变化，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整个社会在回应这样一些紧迫性的需求方面其实作为非常有限，整个公益行业看不到有多少有力量的回应，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我们的问题所在。环境确实变了，但是很多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更好的有效的去解决和回应，这里面很多的原因，我们都

希望我们的公益能够有更多的大众参与一起提倡呼吁公众参与，但是中国的公众参与够吗？非常不够。我总结三有三少，有爱心、少捐赠；有意识、少行动；有想法、少平台。有爱心，中国公众多有爱心，怎么会没有爱心呢，你去做调查很多公众不乏爱心，特别是汶川地震大的灾难的时候这种爱心激发出来，但捐赠其实是不多的，中国整个每年的捐赠公众来自于个人的捐赠比例大概 20%—30%，这都是高估的，我知道在座很多大的全国公募基金会很多资金每年的募款资金来自于个人的捐款比例可能也就 10%几最多 20%几了不得，在美国来自于个人的捐款大概 70%—80%，也就是说我们的公众我们的老百姓是有爱心的，但是他捐赠其实是不多的。有意识少行动，我们的老百姓意识超前，我们做过很多调查，有没有环保意识？有。有环保行为吗，有行动吗？少。最近这两年参与国什么环保活动吗？基本没有。问他有没有环保意识，基本都有。我们还做过一个调查，消费者知道不知道企业社会责任，了解不了解，认识不认识？大家都知道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但是问他当他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会不会由于哪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而去在同等价值的前提下去选择企业社会责任好的企业，你问他会不会，消费者一般都不会，他有观念，但是他基本上没什么行动。有想法想做这个志愿者又想做那个志愿者活动，想法都很多也很想去为公益事业做一些贡献，但是没什么平台，经常有人求我，邓教授，我孩子寒暑假没事干，帮他找一个机构去做点公益慈善，很难，没有地方给你提供这种平台和机会，真正吸纳志愿者的公益慈善组织能有几何？这就是目前的原因所在，公众参与度不足。很重要一个原因公益慈善机构非常不发达，别看我们现在捐款都稳定在一千亿左右，但是说实话我们的公益慈善组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很多捐赠都是行政劝募都是慈善风暴，搞一个一日捐活动煤老板们一夜之间捐十几个亿，但是其实真正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劝募能力不高非常弱，我们的公益慈善组织非常不发达，使得我们的公众缺乏参与的平台。我们公众参与少，公益慈善组织也不是很发达，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面临新的环境，我们其实公众的慈善观念，我们公益慈善组织的创新其实都非常得落后，我们都停留在非常传统的阶段，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所以我们才需要不断在新的环境之下去创新。

我们的现实，我们公益慈善组织我们的公众捐赠基本就是停留在这种眼泪指数阶段，我们认为的慈善就是极度的贫困，基于眼泪指数的捐赠，很多慈善组织没有掏钱倡导，而是被动的跟随传统的工作理念，没有进行更多的公益倡导，使得公众的慈善意识能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公益慈善组织在这方面确实也缺乏创新，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创新这个领域不像技术创新你有知识产权保护，我有动力去创新，创新之后能挣到钱，对于只是创新来说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现实，这个领域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实也导致了我们的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缺乏创新，对很多新环境下的迫切社会问题没有去回应。他的回应就是追随公众的传统落后的慈善理念去回应眼泪指数，你看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就是让人流眼泪了，我们公益

慈善组织就做成了，都是做传统的事情，而没有回应更迫切的社会需求。我们很多公益慈善组织稍微有一点创新大家互相模仿抄袭，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创新，所有的公益组织大部分做的事情都差不多，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名字叫的都不一样，宗旨不一样使命也不一样，但是做法差不多。中国的公益环境确实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也是对我们公益慈善行业巨大的挑战，需要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需要公益慈善组织不断的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呼吸，没有被污染的空气，我们才能喝上洁净的水，我们才能放心的吃安全的食品。

来源：和讯网

地址：<http://news.hexun.com/2013-02-28/151580856.html>

[【返回目录】](#)

刘玄奇：2013 公益十大猜想

1、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难”的问题将逐步破解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为发挥好社会协同作用奠定组织基础。” 这将对公益组织“注册难”等问题有根本性的破解。

2012 年，地方政府已经积极行动，比如广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民间组织发展的立法，如《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等，帮助社会组织真正扫除了“出生”障碍；而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地方相关的慈善立法也已通过。各地方的“公益孵化器”也不管涌现，注册问题将不再是个困扰公益事业发展的难题。2013 年将会有更多地方政府加入，甚至会出现中央政府从上而下的推动。

2、政府将继续加大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

2012 年，中央财政首次向社会组织拨款 2 亿元，支持其开展社会化服务。中央财政埋单，由社会组织实施服务项目，这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一种新尝试，向公益领域释放出一个非常积极的政策信号。

某些地方政府对对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也不甘落后，如 2012 成都市政府首期向成都市社会组织基金会注资 3 亿元，用于向各公益组织“购买”服务，孵化公益组织等。另外向广东的深圳、中山、顺德等地纷纷加大了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

十八大之后的 2013 年，政府将继续加大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政府将坚持“政社分开、管办分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把能够由社会组织做的事情，通过政府委托、公助民办、购买服务等

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

3、社会创新支持性机构遍地开花，尤其是区域、本土的支持性机构

2012年，“社会创新孵化园”、“公益孵化园”、“社会组织孵化园”等如雨后春笋般的涌出。譬如，成都成立了成都社会组织基金会，推出“公益组织服务园”；杭州成立了杭州恩众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推出杭州首家社会组织孵化园，长沙成立了“社会创新管理孵化园”；苏州成立了“社会企业产业园”；南京成立“社会组织孵化中心”；顺德更是超前地提出成立社会创新中心的理念，采用法定机构的全新组织形式等等。

这一领域NPI的推动作用非常大，有不少区域公益支持机构多是NPI的学生，但很好的结合了本地的特色和资源。“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到了2013年，本土的支持性机构将继续遍地开花，而已有的机构也将做得更加扎实，发挥更大的作用。“官民合作”，基金会参与、企业支持、媒体传播、民间公益参与的模式将成为2013年“公益支持机构”的发展趋势之一。

4、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将成为助推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社会对企业责任的重视使一些企业主动寻求非政府组织作为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有关建设问题的解决方案。

大众通常更加信任公益机构，特别是在有关环境或社会责任的问题上，因此，与公益机构合作的企业拥有更加良好的公众形象。非营利组织也好，企业也好，双方都互有需求，2013年开始，公益机构与企业将会有更多的合作，企业做社会责任的需求将成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非营利组织要善于借助企业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使命。

5、2013年将成为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关键之年

近几年有关社会企业的创投基金、网站、培训、大赛、孵化器开始浮出水面，社会企业的理念已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如英国文化协会做了4年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苏州成立了社会企业孵化园、DSI中国联合湖南大学中国公益创业研究中心退出了中国公益创业者训练营、北京的新社会企业网、岚山社会企业投资基金、创益社会企业孵化器、宁波诺丁汉大学举办的社会企业创业大赛等，这些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项目在2012年有迅猛的增长。

201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解决社会问题呼唤发展社会企业》的文章，呼吁“政府应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扩大社会企业融资渠道，并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政府应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推动社会企业在参与公共服务中发展壮大。”

经过几十年发展，发达国家的社会企业在扶贫、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为中国的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2013年，社会企业在中国将迎来突破性的发展。未来企业的社会责任项目转型为社会企业，以及企业与公益机构合作

成立社会企业将会成为一个趋势。

6、高校开始重视公益创业教育，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的比例增加

2012 年 8 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要求高校在“通过创业教育教学，使学生掌握包括创业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相关理论……以及社会创业的理论和方法”。这是教育部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社会创业，社会创业亦即公益创业。

目前已经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温州大学等高校在开始探索公益创业教育。其中清华大学连续 3 年举办“北极光”杯大学生公益创业实践赛，湖南大学的公益创业教育模式曾获“中华慈善奖”，温州大学创新性的成立了“党员公益创业中心”等等。这些都表明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关注、重视公益创业教育。

此外由于有零点公益创业发展中心、滴水恩公益创业发展中心、德鲁克青年社区网、i join 社会创新咨询、大学生公益论坛、春晖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等支持青年公益创新的机构迅猛发展，使得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的比例不断增加。2013 年开始，这些机构必将有更大的突破，且会涌现更多区域的支持青年发展的公益平台，青年参与公益渐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

7、新媒体将深入助推新公益的发展，微公益不“微”，并渐成规模。

微公益不“微”，已成为国人共识。2012 年，“免费午餐”、“大爱清尘”等都是微公益项目的典范。到 2013 年，以微博为平台的公益活动将继续呈现多样化、纵深化趋势。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由微公益引发的大型网络热点事件超过 40 次。可以预见的是，新媒体环境下的微公益将持续推动网络正能量的释放。

另外，微公益使更多的网民通过微公益“简单、直接、透明”的运作模式看到了慈善事业发展的未来。与之相对应的是，部分传统慈善公益机构的运作不规范，使其在新媒体时代面临更大的拷问。2013 年开始，微公益将逐步倒逼传统慈善公益事业改革，增进传统公益机构的透明度。而传统公益机构也将借助新媒体而大大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8、2013 年公益慈善人才培养将迎来更大突破

2012 年是公益慈善人才培养发展的起始年，公益行业迅猛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2012 年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最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的推出，并举办了首期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发展研讨会。该计划是在民政部指导下，由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安利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项目。项目为期三年，安利公益基金会出资 1000 万元，通过实战培训，专家指导，机构资助，海外考察交流，专业论坛与行业课题研究等形式，对接公益慈善人才需求，支持公益慈善领袖个人成长，探索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新模式。

2012 年除了“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还有中国公益研究院的各种培训项目、中国人民

大学“百人计划”、深圳慈善会的“公益星火”计划、银杏伙伴计划、易社计划、BC 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中国公益创业者训练营、黑苹果社会创新营、友成新公益大学等。这些项目还远远不能满足行业发展对专业公益人才的需求。2013 年，将有更多的投入到人才培养这一块。

9、环保、教育、养老、青年发展等将成 2013 年后的公益热点

气候、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危机感增强，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环境。这是最容易与企业社会责任结合的公益领域之一，保护环境将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首要议程。教育领域的公益机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且易于得到关注，支持该领域的基金会较多。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扶老类的公益机构、社会企业开始涌现，并成规模。支持青年发展的公益机构在国外较多，大陆本土从近几年年开始，也渐渐成长了一些支持青年发展的公益机构，如德鲁克青年社区、黑苹果、SIFE 等。2013 年尤为看好环保、教育、养老、青年发展等几个领域。

10、民间公益形式更加多样，专业化、发展速度将逐步提升

2011 年，中国慈善事业遭遇冰火两重天：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因诸如“郭美美事件”而公信力破产；同时，以邓飞等人创办的“免费午餐”计划的民间慈善行动却在迅速崛起。到了 2012 年，虽不及 2011 年的风起云涌，但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公益机构由阳春白雪和曲高和寡的状态，真正走向民间。2013 年，民间公益力量将继续得到增强。民间公益的发展趋势是形式多样，包括草根公益、微博公益、社会企业、企业 CSR 等。民间公益因为支持性组织的发展，其专业化也将得到增强，将有更多专业人士进入该领域。民间公益将是现代公益、慈善发展的主要方向。

来源：新浪博客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8dbb101015igi.html

[【返回目录】](#)

◎行业观点

人民日报：深圳社工为什么留不住

近日，深圳社工协会报告显示，深圳社工流失率正在逐年攀升。

深圳市 2007 年起实施社工试点，建立了全国首个较为系统的社工制度，曾被称为社工的“黄埔军校”。

作为示范城市，深圳为何越来越留不住社工呢？

待遇偏低供求失衡

社工“黄埔”盛况不再

日前，深圳社工协会发布报告：2012 年深圳社工流失率达 18.1%，并呈逐年加剧之势。

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深圳共有从业社工 2761 人。近年来，深圳社工流失率不断攀升：2008 年 8.2%，2009 年 9.8%，2010 年 13.4%，2011 年 17.6%……仅 2012 年从深圳外流到广州、东莞的社工就达 80 余名，其中督导助理以上优秀社工达 23 名，早期来深社工仍在岗的已不足 30%。

“社工薪酬待遇相对较低，是深圳社工行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深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据统计，目前深圳市本科以上的一线社工，实际收入平均为每月 3500 元到 4000 元（不含五险一金），本科以下学历待遇则更低。

目前，深圳市政府购买社工岗位经费标准为 7 万元（在实际执行中个别区还低于此标准）。这只是按一线社工岗位计算，而社工机构还需支出运营必需的管理、行政、财务人员和办公场地等费用。

因此，社工机构实际人均经费标准远低于 7 万元。再加上近几年房租、物价的上涨，社工住房公积金和老社工必要的工龄工资等新增支出，让许多社工机构入不敷出。

根据 2010 年的统计数据，深圳市 58% 的社工机构亏损。社工机构人员（包括机构行政人员）薪酬支出，已经占到其政府购买岗位服务收入的 87.4%。社工机构提高社工薪酬的能力已经十分有限。

此外，社工人才供求失衡，也是导致深圳社工流失率增高的重要因素。

“每年全国只有 2 万左右的社工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他们中间大多会转行。”该负责人表示，与社会潜在和实际需求相比，现有高等教育社工专业人才供给可谓杯水车薪。再加上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招聘社工专业人才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这无论是对毕业生，还是对已经从事社会工作的人，都更有吸引力。

政策未能调整跟进

购买服务标准该提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总干事孙亚华认为，深圳社工高流失率不完全是薪酬的问题。深圳 2007 年颁布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1+7 文件”中，7 个附件应该是动态的文件，社工政策应该随着相关工作的不断推进而调整。

据了解，2007 年深圳市开始实施社工试点工作，于 2007 年 10 月颁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及其 7 个配套文件，建立全国首个较为系统的社工制度。

以深圳市 2007 年首批招聘的 37 名社工为例，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其中包括 5 名硕士和 28 名本科毕业生。在薪酬待遇上，本科生从事社工工作，在见习实习期的平均薪酬可达 3660

元。

孙亚华说，深圳市在推动社工发展政策的调整上，的确有所欠缺。“2006年深圳市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926元，社工工资在此标准上定为每月3500元，实际薪酬则远高于平均工资。但到2012年，全深圳市平均工资水平少说也超4300元，而社工的工资仅与平均工资持平。”

据悉，2011年深圳市城镇职工月均工资为4595元

据孙亚华介绍，深圳市近年来虽然为吸引人才提供了许多优厚条件，但社工一直没有被纳入“人才”范畴。“如果政府将专业社工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纳入人才体系，使社工可以享受到人才的真正待遇，‘孔雀东南飞’后再飞回来，也不是问题。”

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标准、增加资金投入，是解决深圳社工薪酬待遇偏低、增强深圳对社工人才吸引力的主要途径。

他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经费标准应当进行合理动态调整，除考虑一线社工薪酬待遇因素外，还应科学测算机构管理行政人员费用、办公场地、纳税额度、业务培训、服务研发及社工储备、社工辞工补偿等各项因素。当然，在提高经费和待遇标准的同时，也要加强监管，严格专业社工岗位人员准入。”

深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工服务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公共财政发挥资源主渠道功能是各国的普遍做法，社会力量很难作为社工服务的主要资源渠道，国内更甚。“面对几乎是唯一的资源渠道，社工机构毫无议价能力，因此资源供给不足，最终只能以社工队伍素质和服务水准下降为代价。”

提供优岗高薪优待

周边地区纷纷挖人

“深圳社工的流失是国内社会工作发展不均衡的体现。”孙亚华说。

近年来，随着中央相关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各地社工发展明显加快，对社工人才的需求都急剧增加，各地对社工人才争夺日益激烈。

比如广州2012年建成130个家庭服务中心，每个中心配备约20名社工；东莞2012年建成60多个社区服务中心，每个中心配备8名社工；佛山、中山等地也迅速推进社工发展。许多地方都以优厚待遇和优质岗位招纳优秀社工，社工人才争夺空前激烈，导致不少优秀深圳社工流失。

不仅如此，深圳社工机构新招收社工也越来越困难，新招社工整体素质下降，更多的社工毕业生选择深圳以外地区。

“深圳由于推动社工发展起步较早，在深圳经过1—3年发展的职业社工，常常会被作为骨干，挖去广州、东莞等地任机构的主任、副主任等职，在薪酬上也有提高。”深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 2012 年流失的社工中，有大约 30% 是被周边地区挖走的。

深圳某机构社工谢女士介绍，自己的同事选择到广州或东莞工作，都是因为能得到更好的职位，薪酬也提高不少，上升的空间会比较多。在周边地区对社工人才的争夺中，深圳社工薪酬待遇水平确已处于劣势。“对于优秀社工，不少地方提供的是很多优质岗位，还有的开出年薪十万元甚至月薪 1 万元以上的待遇水平，对在深圳工作的社工诱惑力还是蛮大的。”

在她看来，再加上物价因素，在东莞、佛山等地，社工实际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深圳。“虽然深圳的整体吸引力突出，社工发展机制也有优势，但对新毕业社工的吸引力却远逊于其他地区。”

来源：人民日报

地址：<http://cpc.people.com.cn/n/2013/0227/c83083-20614444.html>

[【返回目录】](#)

公益时报：使用不到两年老山希望小学因征地被废，公益资产、品牌如何保障

2012 年 2 月 18 日，贵州省凯里市龙场镇鱼洞村岔河发生塌方，在事故地点正对面，隔着河沟和公路的一块缓坡平地上，已空置两年多的香港灵泉老山希望小学，也由此被发现变成了垃圾回收站。

2 月 21 日，一则基于上述事实的“贵州一希望小学变垃圾场”的新闻引起各界关注。22 日上午，《公益时报》记者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和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贵州青基会）组成的调查组抵达老山村。

《公益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早在 2004 年左右，老山村因缺水和自然环境恶劣，被列入凯里市生态移民搬迁计划，新址即选在山下的希望小学校址附近，但长期未能实现搬迁。2008 年 3 月，老山希望小学开建，同年 11 月投入使用。2010 年，凯里至余庆的高速公路规划通过这里，生态移民搬迁地便改到了龙场镇。希望小学正处在征地范围内，使用不到两年的老山希望小学因此被废弃。如今，高速公路即将开工，这所校舍也将在近期拆除。

回溯：

老山希望小学的前世今生

在希望小学背后山上，是老山村剩下的最后几户人家，大部分村民现在已搬到约 3 公里外的龙

场镇上居住。

老山希望小学建于2008年。2008年初，严重冰雪凝冻灾害使原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山村小学校舍开裂，成为D级危房（注：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据2000年到老山小学工作的教师杨成莉回忆，孩子们和老师在帐篷里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条件很艰苦。

当时凯里市团市委联系到的香港灵泉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为灵泉基金会）希望在凯里捐建小学，经与市教育局等部门商定，其中一所便选在老山村。灵泉基金会捐款20万元，凯里市政府匹配资金15万元，新学校2008年3月份修建，11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命名为香港灵泉老山希望小学。

学校修建时，预计覆盖附近几个村落及小煤矿的工人子女等学龄儿童大约200名，2009年实际学生人数是30余名，5个年级。2010年高速公路修建规划，已迁至岔河的30多户村民陆续搬到了龙场镇。另外，政府加强了对煤矿的规范管理，岔河周边的一些煤矿被关闭，这部分流动人口离开，这些原因导致生源剧减。2010年，老山希望小学只有两个班（一年级和三年级），11名学生，3名老师。高速公路规划通过这里，希望小学正处在征地范围内。2010年10月，老山希望小学学生全部迁到龙场小学就读，老师被分配到龙场小学和其他教学点，只有新的一年级学生到附近鱼洞村就近入学。

于是，香港灵泉老山希望小学在使用仅一年多后空置，交由老山村委会管理。看管学校的人住在这里，同时照顾自己的生计，将其作为临时废旧物品分拣点。据了解，媒体上所见的废旧物出现于半年前。如今，高速公路即将开工，这所校舍也将在近期拆除。

善后：征地补偿款

用于迁入学校建设

前往老山村的途中，可以见到凯里至余庆高速公路施工标识，这是贵州省内高速路网中的一条，联通黔北和黔东南。贵州地无三里平，修路不易，能够取直的路段尽量取直，节省建设资金。

如今，希望小学的学生大多就读于龙场小学。

读6年级的学生杨秀凯，老山希望小学建成时，他还是低年级的小学生，2010年来龙场小学寄宿就读。由于家就在塌方地点附近，事故之后，杨秀凯一家被政府暂时安置到龙场中学的宿舍里。据杨秀凯的爸爸介绍，住宿的学生学校每学期有500元的生活补助，家里再补贴100元左右就够了，杨秀凯和他上中学的姐姐都是这种情况，这点费用对家里来是没问题的。学校食堂做饭的师傅是本地人，饭菜家长也比较满意。

据龙场小学校长沈庭高介绍，学校现在有666个学生，住宿生有78人，其中包括老山村的8名学生。龙场小学现在使用的教学楼也是由香港捐赠方在1998年捐建的。规划好的综合楼就在它的对

面，建好后现有教学楼将拆除，这点已取得捐赠方的同意。

2012 年 7 月，老山希望小学征地拆迁的补偿款确定为 54.99 万元。凯里市政协副主席兼教育局局长潘七一说：“这笔资金的使用程序是，先入市级财政，然后专项拨付龙场小学新修综合楼使用。学校资产没有进行变卖，全部进行了登记。学校的动产，能够使用的已经搬到龙场小学继续使用。龙场小学的综合楼共投入 390 万元，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中国青基会 2006 年制定的《关于对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需撤并希望小学的捐赠资产、校名的处置意见》规定，“希望小学如确需撤并，要坚持希望小学牌子不丢、希望小学捐赠资产不丢的原则。”

中国青基会调查组工作人员宋彦彬解释说，希望小学资产包含社会捐赠资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相关规定，要保证把捐款方捐建希望小学时的捐赠等值资产用于并入的新学校。希望小学的校产并入新学校后，新学校仍以原希望小学的名称冠名或一所学校两块牌子。

疑问：

捐赠人利益如何保障

宋彦彬表示，希望小学撤并之前应告知青基会，也要取得捐赠人的同意。希望小学建了 20 多年，有的捐赠方联系方式、地址都换了，联系不上，这种情况下也要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撤并。“教育资源整合是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措施，我们需要配合，但要做到最大限度保护捐赠人的利益。”宋彦彬说。

联系灵泉基金会的凯里市团市委，并未在老山希望小学确定因修建高速被拆迁时即与其进行沟通，与捐赠方的联系是在被新闻曝光之后进行的。

凯里团市委书记杨帆说：“此前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最近与灵泉基金会负责人沟通过，首先表达了我们的歉意，表示将原希望小学征地补偿款全部用于综合楼的建设，新建综合楼将以‘灵泉’命名。学校建成后，也将铭刻碑文，记述捐资、建设历史，资产变动，将爱心传递下去。捐赠方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意。”

据统计，贵州是依托“希望工程”援建小学数量较多的省区之一。上述中国青基会于 2006 年下发的意见，要求需要撤并希望小学应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撤并理由及希望小学资产、校名处置方案，报省级青基会会商捐赠人同意。

办法：“两个不能丢”

据统计，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希望工程共援建希望小学 17900 多所，其中中国青基会援建 3499 所。希望小学是当地教育部门规划和管理的学校，中国青基会动员社会力量援建。建设资金中社会捐款是一部分，另一部分由当地政府配套投入。学校建好以后，归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具体管理，青基会对其后续的投入支持在希望工程层面上，如教师培训、教育教学设备配备和举办公益活动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其目的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早前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全国希望小学被撤并掉的占比约在 5%左右，也就是大约 800 多所。而据《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 22.94 万所，减少了 52.1%。教学点减少 11.1 万个，减少了 6 成。相比之下，希望小学的撤并比例比较低。

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晓禹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中国青基会 2006 年制定《关于对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需撤并希望小学的捐赠资产、校名的处置意见》，要求撤并中校产不能丢、校牌不能丢。媒体对灵泉老山希望小学空置报道后，中国青基会立即会同贵州青基会组织联合调查组，赴凯里实地调查处理。原学校拆迁补偿款用于新学校的建设，捐款人的捐赠资金也纳入其中，符合希望工程的有关规定。中国青基会感谢媒体能够及时将这件事情报道出来。公益需要全社会的监督和支持，这样才能获得健康发展。

事实上，希望小学的援建对于贵州省农村基础教育的改善起到了很大作用。贵州省青基会副秘书长陈保国介绍，省内第一所希望小学诞生于 1992 年，2012 年底的统计数量为 1951 所，这其中得到了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爱心机构和人士的很多支持。撤并中对资产、校牌的保护，也是对品牌诚信的维护和对捐赠方积极性的保护。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3-02/26/content_5274.htm?div=-1 [【返回目录】](#)

社科院法治蓝皮书：我国慈善制度体系存在很多法律空白

人民网北京 2 月 25 日电（记者 赵艳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13 年《法治蓝皮书》发布暨中国法治发展与展望研讨会”25 日在北京举行。《法治蓝皮书》指出，2012 年，有关机构和慈善组织根据慈善事业的新发展和新需求在慈善法治建设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但慈善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还很突出。

《法治蓝皮书》指出，2012 年，在慈善组织制度方面，民政部印发了《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将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规则上升为有一定约束力的部门规章。在慈善行为制度方面，民政部印发了《志愿服务记录办法》，着力通过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国情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

2012 年，国务院将红十字会列为国家社会领域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单位，随后印发《关于促进

红十字会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红十字会开展社会组织改革试点”，把其改革作为社会组织改革的破题之举，也为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社会团体改革探索出路。

各地积极探索慈善法治的完善工作。深圳市民政局组织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送审稿）》，试图系统全面地制定慈善事业的各方面法律制度。有些地方则采用单行法的方式对慈善领域重大问题进行规范，如《广州市募捐条例》《上海市募捐条例》修订后的《黑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等。

《法治蓝皮书》同时指出，慈善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还很突出。慈善制度体系存在很多法律空白，如慈善组织的界定和认定、慈善募捐的统一法律规则，至于志愿服务、慈善信托等更是缺乏制度规范。另外，慈善法治的价值体系不明确，如慈善组织的双重管理制度使得准入门槛过高，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等，都使得鼓励扶持慈善事业的价值目标难以实现。而且，法律法规的逻辑体系不周延，不同法律文件各自为政导致有些交叉领域出现法律冲突。

来源：人民网-法治频道

地址：<http://www.chinanpo.gov.cn/1940/61398/index.html>

[【返回目录】](#)

中国环保公益诉讼路途遥遥

有人曾做过一个试验：取一块草地，把草地划分成若干块分别派发给牧羊人，但在中间保留了一块公共用地，这块公地每个牧羊人都拥有使用权。一年下来，被划分给个人的草地被有计划和节制地使用，而作为公共用地的草地却因为过度放牧而荒芜。

人们在爱护了自己土地的同时都在榨取无人监管的公共用地，公共利益在无保护的情况下被严重破坏，诉讼法理论认为，利益受到了损害，受害者就有权向法院起诉，那么“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人们就有权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寻求司法支援。

这就是著名的“公地悲剧”现象。公益诉讼是解决“公地悲剧”的一种诉讼手段，它在我国的出现体现了我国公众对保护公共利益的诉求。

而事实上，我国的环保公益诉讼仍属“奢侈品”，暂处于刚刚起步、发展缓慢的“混沌”阶段。那么这样的状况背后包含着怎样的原因？我国的环保公益诉讼目前正面临怎样的困境？它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主体范围窄、门槛高

在我国，“公益诉讼”术语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既定概念，迄今为止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一般来说，公益诉讼包括民事环保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按照适用的诉讼法的性质或者被诉对象（客体）的不同划分的；按照提起诉讼的主体，公益诉讼可以划分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提起的环保公益诉讼，前者称为民事公诉或行政公诉，后者称为一般公益诉讼。

据了解，2011 年 10 月 24 日，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环保公益诉讼制度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拟首次赋予社会团体提起环保公益诉讼的资格，被视为推动环保公益诉讼前行的突围之举。修正案草案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按照民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环保公益诉讼的主体就是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但是现在我国环保公益诉讼主体存在着范围窄、门槛高的问题。”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李刚博士说道。“主体范围窄主要体现在排除了公民个人参与环保公益诉讼的机会，而门槛高体现在“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表述不明，有些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未经依法注册的 NGO 组织被排除在外了。”

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资深律师安翔则认为，我国大的公益诉讼从范围上说，可以做两种意义上的界定，第一种是对于某个案件的当事人本身进行的一种公益法律帮助的行为；另一种公益诉讼的受益者则是普罗大众，所有的法律支援其实是旨在帮助所有不特定多数的公众。“像我国推行的法律援助的制度，其实就属于公益诉讼的第一种，而像水污染问题的诉讼，受益者不仅仅是原告本人，而是更多像原告这样的受害者以及潜在受害者。”安翔解释道。

安翔告诉记者，环保公益诉讼很大一方面需要专业性法律人才的支持和援助。除去律师自发援助外，国家也应进行必要的法律专业援助。“我国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下法律援助是绝对不收费的，但适用的案件类型是有严格要求的。一般来说像因水污染患癌这样的个人，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的人相对是少数。这样就直接导致了环保公益诉讼范围窄、门槛高的情况。

“而英国的法律援助方式则不同，法院是从人的生活困难程度来划分减免律师服务费用标准的。比方说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不是赤贫，但是处于一个比较贫困的状态，那么他就会得到一定比例的律师服务费用减免，而非自行承担全部的费用。这样一来，需要获得法律援助但生活困难的人群可以通过较少的钱获取必要的诉讼法律援助。”安翔说。

直接利害关系原则

“其实特别要指出的是，广义上的公益诉讼还包括以检察院或者检察官作为原告，就影响到公

益利益的事件去起诉，从而形成的环保公益诉讼。但是我们国家按照诉讼法律规定，除刑事诉讼有公诉机关外，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就是说，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根本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安翔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饭店卖给A号桌一瓶有毒的水，那么只有A号桌的人才能向法院起诉商家，B号桌的客人即便看见了水有毒，也不能进行起诉，因为并没有直接侵害到B号桌客人的利益。

而一条河流遭到污染，它所产生的受害人群则根本不能简单的以直接、间接来区分，事实上，每个依靠这条河流生存的人都会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那么，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对每一个公民而言，都应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公共利益和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二者本身就是赤裸裸的直接利害关系，根本没有间接之说。公民通过诉讼程序，向法院直接起诉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并不是对他人私权利加以干涉，而是保护自身利益的合理途径。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此“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本身就有误区。”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李刚这样说道。

需靠政府先行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法院受政府制约，那么政府自身政策的缺陷，就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发展环保公益诉讼，必须先给环保公益诉讼松绑，这就要求政府首先要有接受批评和监督的勇气和自觉。”李刚说道。

“必须要有通气口，才能释放压力，否则没处疏通，社会就容易陷入一种“以暴制暴、鱼死网破”的恶性循环之中。”安翔律师表示，“对于环保公益诉讼这种最文明、社会成本最低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政府和公众不需要对其心怀恐惧，反而应该认为这是一种用理性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事实上，地方政府在环保公益诉讼方面已做出了初步尝试。2011年6月，云南省曲靖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铬渣污染事件。针对此次污染事件，曲靖市环保局、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共同对责任企业提起了公益诉讼。这样一来，在草根环保组织证据基础不足，大量的监测性数据、处罚报告都由地方环保局掌握的情况下，与当地环保部门联合成为原告，从而进行公益诉讼，也不失为在环保公益诉讼法律机制不完善的情况采取的“应急方针”。而澳门地区，已经有了专门关于公益诉讼的立法。

“当然，人大代表多学习法律知识，从立法上推动环保公益诉讼的发展，是重中之重。”李刚博士说道，“其实，公益诉讼本身，为政府和人大代表搭建了一个沟通的平台，它是能够深刻地改造中国的法制环境的，地方政府没有必要惧怕公益诉讼。”

“我国也出现了地方环保审判庭、人民法庭以及合议庭的多种公益诉讼协助模式，而我也希望

能有越来越多的 NGO、基金会能够参与到环保公益诉讼的事业中来。” 律师安翔补充说。

“其实目前，专注于环保领域的公益组织和草根 NGO 并不多，而且力量也非常薄弱，因为资金、人力、物力短缺原因，它们能充分调查取证的难度非常大，而你知道环境污染问题极端复杂，取证过程充满周折，而若取证不全面不充分，法院便不会接受这里环保公益诉讼请求，因此最后能真正走到环保公益诉讼这一步的公益机构和民间 NGO 组织，是少之又少的。” 李刚如是说。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charity.gov.cn/fsm/sites/newmain/preview1.jsp?ColumnID=362&TID=2013022615254305878>

[0585](#)

[【返回目录】](#)

慈济的细节

11 月初，北京很多会议错后或者取消的时节，第二届慈济论坛“佛教与慈善”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由台湾慈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共同举办，以“佛教与慈善”为主题，探讨佛教慈善思想的当代实践。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著名学者、宗教界人士及社会各界近 400 人参加，再次让人惊叹慈济的力量。

2008 年，国台办正式批准成立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这是内地首家由非大陆人担任法定代表的民间基金会，简报曾就此访谈慈济人，联络接洽中慈济的高效令笔者惊叹。慈济的慈善事业世人皆知，参与过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慈善活动，全球志工达到数百万。而每遇灾难，慈济都走在救灾者的前列。庞大的慈济何以如此高效？创办人证严上人如何将普通人的一毫善聚成大善？媒体学界有很多探究慈济内部运作的，慈济案例也上了哈佛大学的讲坛。因为同样的原因，笔者一直期待近距离看慈济。终于在 11 月 3 日，第二届慈济论坛在北京召开之际，得以有机会管中窥豹。

感动第一

还未进入会场，先见到会场外的大厅有很多穿着蓝天白云服装的慈济志工，仿佛每个来宾的需求他们都能立刻察觉到，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后来看到资料上说，这次 400 人的会议，有 130 多位京、津两地的志工参加筹备。落座后，发现每个人的面前放了一个环保杯，里面已经有半杯热茶。司仪在会议间隙几次提醒大家环保杯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这是结缘(免费赠送)给与会者的。

会场内，正巧坐在慈济的志工身边。女性志工略施粉黛，将头发盘起，精致的蓝色的头饰上绘

有白色的莲花，统一的蓝色旗袍和平底布鞋，仪态端庄高雅。即使在散会后，他们走到人大校园，也是自然走成两排，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女性志工的旗袍看起来都是在一个水平面的高度上。后来才知道，为了让旗袍看起来更整齐，慈济人也是反复修改的。最初以每个人膝下的一定距离为标准，但是因为人的个子高矮不一，看起来还是不整齐，后来决定以距离地面的一定高度为标准。

同很多会议茶歇一样的有茶点和水果，不同的是，点心和水果都是可以一口下肚的，这也是费心安排的。由于尊重会场的规定，志工们此次无法展示茶道，但在有限的空间下，志工们仍然巧思尽出，在水果、小茶点的供应上，每一样点心都要叠放得容易拿取、大小要让人容易入口，让来宾们用茶点时也能保持行仪，同时加快人员流动周转。

在外人看来这些不过是繁文缛节。然而一位慈济志工说，这些渐进的、由外而内的举止，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出家人深知因果（一切都是因缘，一切都是果报）。

会场外，有机会分别请教了慈济美国总会副执行长葛济舍先生和慈济基金会宗教处谢景贵主任：一个庞大的慈善团体却能如此高效并协作完美，是不是从企业学来的？我们经常说公益组织不好管理，因很多人都为自己的理想而来，有自己的想法，很难如企业那样管理。同样，在慈济志工的管理也不是容易的事。

两位先生都谈到沟通的重要。协同高效的前提是耐心相互沟通、了解之后有认同，就可以共事。怎么践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 8 个字，也是要经历很长的过程，所以证严上人的每日开示的静思语，进行了几乎 40 年。

笔者问：“这么漫长的沟通，会不会觉得没有效率？”谢先生笑答：你要这么快的新陈代谢干什么呢？随后他详细解释：“先从简单的做起。不要一开始就做 100 万人、1000 万人的规模。如果你不坐下来沟通，那么着急向前，那就你一个人往前做吧。”

谢先生说，企业的管理方式我们都很尊重，行政绩效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将行政绩效作为第一要件，放在第一位的而是怎么让人感动。比如一个桌子，2 个人抬就可以了，但是有可能会 4~5 个人抬桌子。有人会问：2 个人的事情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干，这样不是没有绩效吗？这 4~5 个人不是我们安排的，是大家自动做的。慈济那么多志工，希望每个人都有参与感，参与的感动从面上看没有效率，但是因为抬桌子而感动，将这种感动持续下来，继续付出，这是更了不起的。

慈济为什么能够发展到这么多地方？葛济舍在会议中分享：“表面上看起来，慈济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其实在做事的背后，是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慈济精神来自《无量义经》：“从一种子生百千万，百千万中，一一复生百千万数，如是展转乃至无量。”

在慈济内首先强调包容，志工做的只要是好事，大家就赞叹感恩。另外对志工来说，服务社会

不是可以自傲的资本，相反，个人的修养就是知足、感恩。通过社会实践清净自己，经由利益他人完成自我，藉此体现佛教慈善精神。

慈济对志工还有精进的培训，就是在付出无所求的当下也要非常用心，上人给大家开示的时候，最后一句就是“多用心”。不管处理什么事，为他人做事，都要一点一滴，安排得好好的。在笔者观察到的细节里，看到了用心。由此，高效与精严并非企业所独有，这本是公益组织里最核心的价值：发源于内心、多用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元春说，证严上人宣导慈济人要“以戒组织，以爱管理”，从而实现“自我管理”的理念，既契合佛教本怀，也符合社会慈善的根本精神。正是这样的理念，成为慈济社会慈善的内在动力和组织保障，让慈济人在“诚正信实”的价值诉求中，实现“慈悲喜舍”的人生抱负。

不过，这不是片面的强调宗教信仰与理念的作用，而是肯定“人生信仰”是任何社会慈善组织和管理所必不可少的“价值支点”，是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最根本的保障。

政策破冰

宗教是世界慈善组织三大源流之一，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本土的宗教慈善在大陆一直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一境况到了2012年初在政策上有了突破。2012年2月，国家宗教局联合中央统战部制定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活动的意见》，为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政治保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评价是：对大陆宗教史或者慈善史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宗教政策与慈善政策的根本转变，特别是给佛教慈善带来重大机遇。

2012年9月，以“慈爱人间，五教同行”为主题的全国“宗教慈善周”启动仪式在武汉举行，还召开了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经验交流，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均属第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至今，全国佛教界投入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和实物，折合人民币近18.6亿元，涉及多个领域，呈现出创造理念新型、体制不断完善、重视专业运作、体现佛教特色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公益慈善经验。开幕式中，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庄坚永致词时表示，2008年慈济基金会作为大陆第一家非大陆居民成立的基金会，按照大陆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慈济四十年来的发展好经验、好办法带来大陆，将在宗教界、学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推动大陆与台湾文化往来。

王振耀是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的重要推动者。他说，现代慈善离不开佛教。2012年5月，王振耀到台湾与慈济人促膝长谈并颇有收获。他认为，台湾以慈济为代表的宗教慈善团体已经完成了现代慈善的转型。慈济的理念不仅仅存在于一般的佛教经典，而是非常细腻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北京大学的佛学教育中心正在支持深圳弘法寺建设一座佛学院，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四龙说，近年来社会各界都在讨论宗教能为和谐社会做些什么？各个宗教怎么能够和谐共存，携手并进？他认为，慈善和教育是大抓手，宗教的慈善工作是一个涉及身心灵的系统工程，并不是简单的提供一些物质帮助。台湾慈济大学校长王本荣则提到，宗教是人类心灵上的拐杖，人类需要宗教，人性上心灵的矛盾需要宗教的调节，在度化众生，净化人间，生命无限的可能性中探索生命的价值。上人定义“宗教”为生命的宗旨、生活的教育。

在这次会上，展示了多家宗教慈善机构的运作样本。一位基层民政官员当场向来自河北的常辉法师致敬。近二十年来，河北佛教协会慈善功德会会长常辉法师一直践行慈善，将佛教慈善从传统的寺院道场走入社会公众。法师创办的河北省佛教协会功德会，现今已有近三十万会员。它的创办和慈济有关。1995年7月20日法师与上海慈济志工邱玉芬相识，常辉法师听了邱玉芬分享证严上人创办慈济的事迹，顿时打开了他出家10年来一直思考的佛教出路的心惑——佛教经典中记载着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悲天悯人的心怀，而社会民众为何不能接受佛教这样好的理念呢？甚至还会排斥呢？思索许久，他悟到的是佛陀的慈悲没能走入群众。慈济理念与行动的例证坚定了法师终生力行慈善的决心。

这次会上，常辉法师提问：现在已经有了文件，大陆宗教界怎么得到政府的支持？一般的情况是，地方上相关部门看到文件，很快就放到文件柜里了，佛教界怎么有效地与政府沟通？

王振耀回应说：重要的政策要落实下去，还会有很多理念的障碍。根据我的经验，现在是考验我们大陆宗教界的行动能力，考验做慈善行动研究者的能力的时候了。

他进一步说，比如现在慈济和大陆的对话有助于将格局打开。但是要让活动成为行动，还需要一定数量的案例。他希望大陆佛教界也有自己的实践案例，用这些很好的案例与慈济展开一些积极的对话。从中央的层面将气氛做起来，而不是佛教团体先一家一家的去敲地方民政部门的门。因为如果地方政府还不太理解，会将文件搁置。

政策的门已经打开了，如何把这个门打开的更大一些，是需要智慧的。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冬季刊

地址：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360>

[【返回目录】](#)

官办慈善，如何转身

2.73 亿元！刚刚过去的 2012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接受捐赠额再创新高，增幅接近 15%。

这家“中字头”的基金会，早在 2000 年就主动放弃了事业编制，取消了行政级别，实现了人事权、财务权与政府的脱钩。随着竞争机制、考核机制的引入，近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运营绩效大幅提高，从过去的官办非营利组织转变成了民间组织。

在经历了 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之后，2012 年，我国慈善行业依然麻烦不断，从金华市慈善总会分支机构社工募捐可以提成，到成都市红十字会善款未取发霉长毛，再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账目出错引发质疑……这些事件不仅挫伤了公众的热情，更损害了慈善业的形象和公信力。尤其受到关注的是，这些事件大多与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有关。

当前，官办慈善机构的改革转型，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官办慈善如何才能实现转身？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不是孤例？

官办慈善非改不可

官办慈善机构的兴起和发展，与我国的国情相关。

在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看来，包括官办慈善机构在内的官办非营利组织有两大来源。

一是改革开放初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非营利组织。由于当时没有法律规范可以遵循，各级政府的表态就成了非营利组织设立的依据。成立于 1989 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在改革过程中诞生的。这些非营利组织设立后，往往由政府领导人担任负责人，由编制部门核定编制，由组织部门任免干部，并设置了一定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这样一来，官办慈善机构从一开始就处于政社不分的状态。

二是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也催生了官办非营利组织。在多次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有些政府职能部门转化为官办非营利组织，以行业协会的方式出现。但在较长时间内，这些行业协会还是保留了政府部门的特点。

“官办非营利组织最受诟病的就是它的行政化，在决策、财务、人事、职能设定、组织目标等方面，都遵循着行政程序。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去行政化，破除对政府的依附性，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金锦萍说。

“我理解现在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其实它还是政府部门的一种延伸，做了一些政府部门想做的但还不太方便做的事情。”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也表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官办的非营利组织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现在要深化社会建设，这些机构也需要

改革了。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向记者坦言，作为全国妇联管理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是名副其实的官办基金会。“但这个身份让我们在运作中有不少限制，我觉得改革是大趋势，而且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扶贫基金会样本

中国扶贫基金会较早迈出了去行政化的步伐。

200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中编办写报告，要求取消行政事业编制，实行全员招聘制和干部竞争上岗制，建立新的人事管理制度，打破“铁饭碗”。

此前，这个机构仅有事业编制20多个，此外用人只能按非在编人员进入，福利待遇都跟不上。“这就搞成了两拨人，人为制造了不平等。取消事业编制之后，完全按照市场决定，机构能负担多少人就进多少人。”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王行最说。

没了行政级别还有一大好处。此前，因为基金会的官方背景，许多人将此作为晋升的跳板。改革后这条路被堵死，想谋求政治地位的人自动离去，留下的都是真正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员工队伍就此稳定下来。

另外，基金会还理清了理事会、会长会议、秘书处的职责分工，三者相互制约，秘书长在会长会议领导下负责具体运营，相当于CEO。经历了体制改革的阵痛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驶上了快车道，资金实力、项目数量和社会知名度大幅提升，迅速成长为我国扶贫领域最大的公益组织。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改革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但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看来，官办慈善机构、官办非营利组织的改革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现在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往往都安排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官员进到里面去，变相地成了延续政治生命的场所。所以内部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改革的动力一定来自于外部。外部改革，就跟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相连，乃至跟整个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紧密联系在一起。”陈友华说。

怎样去行政化

金锦萍表示，官办非营利组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地位和性质不明确。当务之急，是要从法律上分清“私法人”和“公法人”这两大概念，为改革提供依据。

她认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做法，就是一个“私法人”的改革路径，通过去掉编制、脱离政府背景而真正成为社会实体，并引入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源从而获得成功。“在改革中，大量的官办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都应该选择私法人路径。”

“同时，极少部分涉及到公共职能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像红十字会，可以保留下来，变成公法人的非营利组织，但这不是主流。”金锦萍说，国外政府也常常间接或委托设立一些机构承担公共职责，

但并不是按照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以美国为例，美国有数千家归为“准政府”的实体，分成七个类别。这些机构由政府批准设立，私人公司参与运营或支持，效率非常高。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赞同金锦萍的设想。他表示，红十字会还承担国际人道职责，具有特殊性，还有其他个别特殊的官办的非营利组织，可以保留下来。“但大的改革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未来都应该走向私法人。”

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强调，官办非营利组织要去行政化主要是去掉两个：“一是在资源配置上的行政化，要让官办的非营利组织更多的向市场、民间寻求资源，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去获取；二是在管理上去行政化，按照私营部门的模式强调内部管理，提高效率。”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则提醒，从日本、俄罗斯的实践来看，非营利组织和政府脱钩之后，可能也会出现问题，甚至滋生腐败。“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建章立制，对它们进行制度上的约束，防范风险。”

来源：光明日报

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1/c_124370908.htm

[【返回目录】](#)

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模式

缘起

非营利组织是相对于政府组织和营利性企业组织而言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指那些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特征的正式组织，也被称为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益组织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在我国蓬勃发展，不仅数量大幅增加，业务范围也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几年国内各类非营利组织却遭遇到普遍性的发展危机，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非营利组织发展模式的思考。

传统上，非营利组织所采用的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发展模式，即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企业和个人捐助来维持公益项目的运作以及组织自身的发展。但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不仅企业 and 个人的捐赠大幅减少，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也大幅下降。加之“郭美美”事件等负面报导的传播，更是使社会各方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锐减。在此情境下，各类非营利组织纷纷陷入发展困境，一些组织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但与此同时，民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的需求却日益提高。如何在实

现自身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已经成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严峻现实问题。

目前，在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向社会企业转型正在成为非营利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企业是一种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的新兴组织形式，是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组织的创造性结合，其通过兼具社会性和商业性的运作模式，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支撑起社会目标的实现。

社会企业在现实中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大都体现出以下特征：既追求社会价值，也追求经济价值；通过商业活动获得的收益来支持社会活动；由市场驱动，同时受社会使命引导；同时衡量财务绩效和社会影响；融合非营利组织和商业企业的资本和管理方法。可以看出，与传统非营利组织相比，社会企业同样将创造社会价值作为首要目标，但在实现社会目标和自身发展的方式上更加强调自给自足，致力于通过自身的商业活动来维持组织存续和公益项目拓展。

从国内外的实践情况看，非营利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通常通过三种方式实现：

第一，公益与商业融合式，即通过挖掘原有公益项目的商业价值将现有组织整体转型为社会企业。例如原本以扶助残疾人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整体转型为以残疾员工为主体的商业性企业。此种模式下，公益与商业融为一体，组织多以企业身份注册，其转型难度最大，但一旦转型成功，成长后劲也最强。

第二，公益与商业交叉式，即在现有公益项目之外，创建相关商业项目。例如，原来为农民提供养殖技术培训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在公益项目之外成立养殖企业来创造经济收益，同时也扩大对农民的扶持领域。此种模式下，公益项目与商业项目间存在较大的业务关联，受助对象同时也可能是组织的供应商或合作伙伴等。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转型模式。

第三，公益与商业分立式，即在公益项目之外，创建非相关型商业项目。例如，原来单纯从事扶助贫困儿童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在网上成立慈善商店来获取经济收益，并从收益中提取固定比例为公益项目提供财务支持。此种模式适用于难以从公益项目中开发商业价值的情况。

社会企业对各类社会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以及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正使其成为众多非营利组织的转型方向，该模式对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而言，同样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首先，向社会企业转型，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克服资金约束、提高组织独立性。通过运用企业化的手段来创造经济价值，可以使非营利组织从根本上摆脱对政府和社会捐助的依赖，不仅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也为其持续履行社会使命奠定了基础。资金上的独立，也意味着非营利组织在决策和行动上更加自主，可以以一种更加独立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公益的舞台之上。

其次，向社会企业转型，有助于非营利组织改善组织效率、提高组织竞争力。近年来，我国非

营利组织的发展十分迅速，除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外，还存在大量“草根”型非营利组织，使非营利组织之间在产品和服务方面不可避免地形成竞争关系。此外，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企业在公益领域的竞争同样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状，大部分非营利组织都应对乏力。由于传统非营利组织的成员多由热心公益的社会人员担任，他们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多为兼职，流动性大，组织内部结构通常十分松散，导致传统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工作效率低下的状况。即使一些非营利组织已经意识到加强管理的重要性，但“非营利”的特点也常常导致其很难吸引到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向社会企业转型，一方面表明了非营利组织改进组织效率和提高竞争能力的决心，另一方面，转型所带来的更高的经济收益以及更大的成长空间也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更好地实现社会使命。

最后，向社会企业转型，也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创新公益手段、增强社会救助功能。传统非营利组织和公益人士习惯运用“授人以鱼”的方式进行社会救助，这一方式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受助群体的生活，但由于其可能导致被救助群体产生依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被救助群体提高自身技能的动机，弱化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因此，从长期看可能并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向社会企业转型，可以促进非营利组织将慈善重心转向通过更新、更系统化的方法来满足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比如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参与者提高个人技能，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这种通过创造性的资源整合来同时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发展模式，无论对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其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而言，都更具积极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

地址：<http://www.wuxuebing.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6>

[【返回目录】](#)

北京法官认为志愿者服务受伤也应是工伤

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但是留下“伤”怎么办？房山法院法官认为，志愿者参加公益活动受伤，应该享受工伤待遇。

李某是某搜救队队员，在一次进山寻找迷路驴友的搜救中不慎摔伤，花去医疗费近两万元，他向搜救队申请工伤赔偿时遭到拒绝，最终只能自己承担费用。

类似这种参加公益活动负伤发生纠纷的案例近期多发，法官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公益组织还不够规范，公益活动风险过大，例如，公益组织不与志愿者、服务对象签订正式的服务协议，怠

于为志愿者购买保险以及提供安全、医疗卫生保障等。

法官建议，本市志愿者条例应该把为志愿者缴纳保险作为强制条款写入条例，而且应该明确志愿服务过程中受伤应视同工伤。“只有充分保护志愿者权益，才有可能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参加到公益事业中去。”

法官解释说，志愿者参与公益服务活动，虽然不会与相关组织产生劳动合同关系，不符合工伤认定前提，但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了例外条例，即“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视同工伤”。因此，志愿者有权享受工伤待遇。

此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帮工人”的规定，志愿者遭遇人身伤害，也可以要求公益组织赔偿。司法解释规定“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我国志愿活动，大多是由相关单位、组织发起的，所以其有义务对“帮工”性质的志愿者承担赔偿责任。

“无论‘工伤’还是‘赔偿’，说到底，是法律对于志愿者角色定位的问题，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特别明确志愿者的社会属性。”法官说。

法官还提出，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之间侵害的问题，也应进一步明晰权责，例如服务对象在接受志愿者服务过程中，造成志愿者损害，应当自行承担民事责任。公益组织应当支持并帮助受损的志愿者向相关服务对象追偿损失。而当志愿者伤害了服务对象时，公益组织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公益组织进行赔偿后，有权向故意或有重大过失的志愿者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来源：北京日报

地址：<http://beijing.qianlong.com/3825/2013/02/27/2000@8525947.htm>

[【返回目录】](#)

崔永元：让公益成为体面的行业

2012 年岁末，经历了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崔永元当选“十大杰出红十字志愿者”。在与其他志愿者交流经验的座谈会上，他讲述了自己心中的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我希望中国的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能进入一个正规的轨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变成一套好的社会评价体系。这样就不用谁一做公益大家就一惊一乍的，还搞表彰。”

做公益慈善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社会机制，而不要仅仅把它当成好人好事。“你要求每个人都去做好人好事，而且标准还非常高，每年还评比，像富豪捐钱还有个榜，捐第一的就很光彩，捐第三的也是几十个亿却没人知道了。”崔永元说话一向耿直爽朗、一针见血。

好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是让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你做公益慈善就跟你吃饭穿衣一样，没有人去过多地关注。同时，你做公益慈善就跟你吃饭穿衣一样，是你生活中必须有的事儿，你没有这样的事儿不行。

近几年，崔永元以个人名义做公益慈善时，非常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和报道。他认为这样会偏离他的想法，他希望大家熟视无睹并认为他做公益慈善很正常。“如果一个公众人物经常参加志愿者服务做公益慈善，却没有人在意这个事情，就说明这个社会非常正常了。我们最大的初衷就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正常起来。”

《公益时报》：目前崔永元基金是否有专职工作人员，他们的待遇怎样？

崔永元：已经有两人专职工作于崔永元基金，总负责和助手。里里外外的事都由他们来管，年薪六位数以上。我的想法是，你看我们创造了两个就业岗位，但这个不够，如果有更多基金都这样运作起来的话，然后我们能创造一百万个一千万个这样的就业岗位，成为就业岗位中可以选择的一种，天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拿到体面的工资。

但是关键是，如果这样就有要求了。好人好事是这种，我扶老大娘过马路，今天没事扶一下，明天忙就算了、就不扶了。但当你成为职业志愿者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扶了，你扶不好还扣你钱呢，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跟上海正在做一个工作手册，这个工作手册是专门针对乡村教师培训的，乡村教师培训的志愿者工作手册，内容会非常细致，你怎么说话，怎么跟对方交流，遇到问题怎么解决，都有技术要求。

《公益时报》：崔永元基金打算创造多少这样的就业岗位？

崔永元：我们这个基金只能算是个试验田，你指着我们这个基金能够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并不现实。但是我觉得我们想把它做成个试验田，为什么叫试验田？一个是我们提供，第二公众还认可。公众给你捐了钱你发了工资了，拿工资的人都干嘛了？所以，得公众认可，这些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

《公益时报》：媒体都在问“钱怎么花”这样的问题，那么崔永元基金怎么回答？

崔永元：比如我们这次乡村教师培训，我们花的每一笔钱，后边有对应的捐钱人的名字，大宗的我们都已经征求了他的意见，小额的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他现在可以反悔，哪怕只有一块钱都可以反悔，说我不想把钱花在这方面，就可以把钱退回去。这个反悔不是说把钱就拿回捐赠者那里，而是不捐给这个项目了。我们乡村教师培训里有很多项目，比如老师吃饭，需要花钱，制作横幅也

要花钱。我用你的钱制作横幅了，你说你不愿意，好，我不用你的钱制作横幅，我用同意的人的钱制作，谁同意，我用他的钱来制作。这样可能我们会麻烦，操作过程麻烦了，但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把这个理念理清的过程，就是要让公众知道。

《公益时报》：会不会因此而提高成本、降低效率？

崔永元：要民主要公正，你就不要在意那么高的效率。有时候效率就是要丧失民主和公平。我们确实很费劲，公示之前，三级审查，审查到分，当我们公示的时候我们觉得连分都没问题了才公示。就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人质疑，那我们要回答每一个质疑。

《公益时报》：这些工作都由这两个工作人员完成？

崔永元：不，他们两个是专职的，志愿者多了。

《公益时报》：你对10%的管理费怎么看？

崔永元：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中华儿慈会有个项目叫“给孩子加个菜”，就是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加菜。那么我们要建食堂请大师傅，买肉买蛋，每天做成菜给孩子吃，这个就有管理费。管理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捐一块钱我都要给你开发票，这发票不是钱吗？需要钱的。而且我要装进信封给你寄过去，这不需要钱吗？我们现在是志愿者一天一天在那儿开发票，开不完，一本一本地开，特别多，然后每个都寄过去。第二就是我们志愿者自己开着车去山上监督检查工程质量，一个学校去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加油费住宿费餐费，这都是钱，这些就是管理费。

这个管理费我算过，连10%都不够，还要多。但是当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公众对我们还不够信任，还不够了解，所以我们不花管理费。怎么解决，我们自己出，我们几个发起人出了这个管理费。但我把我们志愿者干的每件事都在网上公示了，说他今天又去了学校，他翻了几座山，他车在路上坏了，他怎么修什么的……然后就有网友说：谁给他们付钱？凭什么他们白干？然后我说，你看，来了吧。这种信息来了，当这种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这就叫管理费。

我认为这是一个倒逼机制，水到渠成。虽然是我们出的钱，但都有账目，所有的票据都在留着。等有一天大家恨不得为这事都要游行的时候，我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你看，已经几年了，都在这呢，你们觉得应该花吗这个钱，应该花！赶紧报销把这钱还给我们，这是我们的钱。现在你们不理解，不理解那就我们先来出。

我觉得做公益慈善就得有智慧，还得有耐心，你自己心理不阴暗，不想从中捞取钱捞取利益，你一定有办法把它做好。其实拿管理费是国际惯例，而且基本没有低于20%的，但当我们现在整个大的公益慈善形势不好，频频出事，你跟公众说这个，我觉得有点多余。

《公益时报》：公益时报曾做过调查，九成以上网友不赞成收取管理费，甚至公益人才的专业化、职业化、高薪都得不到认可。

崔永元：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公益慈善现在的环境，我们做的这个状态，就只配让公众这样反应。

《公益时报》：可是这样的情况下，也能有好的项目是么？

崔永元：好的项目非常多，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着急，既然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我们做得很高兴，就别天天吊着脸，说自己有多少痛苦。没事，我们慢慢把它理顺，不着急。很多事情都需要一点一点做。你说高考制度不扯淡吗？择校不扯淡吗？分成名校和一般学校不扯淡吗？外籍户口在当地不能参加高考不扯淡吗？这扯淡的事情多了，但都得一点一点做。作为我们一个公民这么一个个体，我们能牵头改变一点的就改变一点。所以不着急，其实在我脑袋里，到底一个科学的文明的一个公益慈善概念是什么样，我相信我自己已经理清楚了，但想把它告诉公众让大家支持还早着呢，可能还需要好多年呢，我们一点一点做。

《公益时报》：你的本职工作与做公益慈善时间分配上有什么规划吗？

崔永元：我们公益慈善有专职的人，志愿者也非常多，基本不牵扯我的精力，我就是转微博就行了。其实在公益慈善上最费我精力的就是想，新的理念怎么实施，这可能是最费我精力的。比如我想让它成为一个体面的就业岗位，这个大家会支持吗？如果我真一年给他发五十万，大家会不会造反啊？我怎么让大家认为这是对的呢？我希望我把这个想明白。2013 年开始我就要去调研，我要把它调查得非常清楚，拿出完整的数据来跟大家说话。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news.foundationcenter.org.cn/html/2013-02/62452.html>

[【返回目录】](#)

程玉：如何解读可持续发展与创新

原文标题：基金会对话一线 NGO——如何解读可持续发展与创新

编者按：这是两封关于一个话题的往来邮件，缘起于南都基金会理事会社区走访并与一线 NGO 工作人员的交流。我作 NGO 一线的项目执行人参加了这次交流，就一个在交流中没有机会展开讨论的话题，会后，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程玉老师给我写邮件认真阐述了她的一些思考和观点。我觉得从程玉老师的邮件中很受益，就征得程玉老师的同意，把邮件公开刊发到烛光通讯上，以资大家借鉴思考。

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 程玉老师的邮件：

王老师，好！

我是南都基金会的程玉，上次在访问农民之子以及在灵动珊瑚的座谈中遇到您，您在讨论中提出了两个极好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恰好都有一些想法，但是因为那天参与的人较多，特别是很多草根组织的同仁们，我更想听大家的发言，所以不愿意占用会上的时间，回来以后，通过庆委得到了您的邮箱，希望就您的这两个问题和您进一步交流。这些想法仅代表我个人，并不成熟，希望我们一起来探讨。

您的第一个问题的大意是，基金会一般都很关注草根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不是所有的草根都要设法去建立自我造血机制？（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对于这个问题，下面是我的一些想法：

一、不仅是基金会，直接服务的公益机构自身也同样要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就等于机构越办越好，谁人不想越做越好呢？！

二、公益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并不一定需要靠自我造血，确切地说，很少有具有自我造血能力或条件的公益机构（眼下能够赚钱的事情早就有人蜂拥而上了）。服务型公益机构通常是靠开发公益或慈善性的服务，并把自己的服务“销售”给基金会、企业、政府或有公益心、爱心的个人。说白了，直接服务的公益组织的正常收入来源就是捐助或购买服务。

三、公益机构通过获得资助来持续发展比商家通过销售来持续发展要复杂的多，因为公益机构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兼顾两个群体的需求，既需要公益或慈善性服务的群体，和愿意以购买服务来实现公益或慈善诉求的群体。打个比方，在市场上，服务提供方是把服务卖给需要服务的人，如：李四是做快递服务的，张三需要快递，张三自己向李四购买快递服务。做公益不是这样的，如果张三需要的服务是由李四提供的，埋单的却是王五，李四既要搞清楚张三的需求并做好针对张三的服务，同时还要说服王五，满足张三的需求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且自己的服务是满足张三需求的好办法等等，王五不认识也不了解张三，也没有时间精力亲力亲为，所以，才要通过李四来帮助张三，但又不是那么放心，李四的办法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好吗？……正因为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不是靠接受服务方用自己的钱包以优胜劣汰的方式选出来的，公益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也因而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促其提升或予以保障，在这种情形下，基金会（相当于王五）必须想方设法证实直接服务的公益组织的理念、方法、运作能力、效果与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对于项目要左谈右谈、一审再审，还有合同、报告、实地观察等等形式的监督与问责。其中，服务型组织能否可持续发展也是基金会鉴别组织、项目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他们假设，好的服务一定会受到张三的欢迎，同时有更多的王五愿意请李四继续做下去。

四、对于资助方的项目人员而言，他们的价值之一就是发现和支持好的项目，他们要不断的有

“新故事”来使基金会的领导、理事会、出资人、关注基金会的媒体、大众等等感到兴奋。一成不变地盯着一个项目做，那么基金会项目人员的价值又如何体现呢？所以即便是项目不变、执行团队不变，项目还是要有新意。

这就联系到了您的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基金会总是要求执行机构“创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基金会也面对问责（来自理事会、出租人、社会等等），也需要用“新故事”、“创新点”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再讨论一下您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总是要求服务型组织或项目“创新”？

我个人对盲目地追求创新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就好像奥巴马当时的竞选口号是“改变”(change)，我就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民如此弱智地以为很好，“改变”本身是中性的，可以“改变”的更好，也可以“改变”得更坏，为什么“改变”就一定好呢？同理，“新”可以好，也可以坏，这是我不能苟同“新”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我以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是一驾车的话，靠的是两个轮子，一个轮子叫“创新”，另一个轮子叫“传承”。“传承”与“创新”同等重要，如果没有传承，每一代都要从钻木取火开始，那我们比原始人过的也好不到哪儿去，人类要花生命中的很多时间接受教育，现在甚至还提倡终身学习，学习是什么，学习主要就是“传承”。基于这些想法，我希望南都基金会自身对于“创新”的追求不盲目、不偏颇，不流于一种空洞的陈词滥调。

另一方面，我也在想，什么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创新”？古智者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什么？我的理解是，人一方面靠积累经验，以及学习别人的经验，从而有效地应对各种生存挑战。但是，这些“经验”也会成为我们理解、认知世界的障碍，如果我们仅仅靠“经验”，而不是运用自己的感官和认知能力来直接面对世界，那我们就成了封闭在过往或他人“经验”中的“套中人”，我们的感觉将不再灵敏，我们的认知也将不再鲜活，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将是不真实的。所以，古代的智者叫我们“日新又新”。作为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我们也需要这种“日新又新”的智慧，才能不断鲜活地触摸到社会对于我们服务的需要所在，从而创造出好的服务，并且不断完善这种服务，做到“止于至善”。这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创新”。

很抱歉，这封信写了这么长时间，中间因为一些事情而被搁置，被搁置的事情往往拾不起来。我知道这些看法也很不全面，只是作为一种分享，或许能解决一点您的疑惑，或引起更多的思考和讨论，总之希望是有益的。

顺致：秋安！

程玉

农民之子王春华回复程玉老师邮件：

程玉老师您好：

看到您的邮件真心很感动！“南都基金会”之所以能在我们草根 NGO 心里受到良好的评价，应该是与有像您一样的理事会团队分不开的。上周末看到您的邮件，心里特别重视，这一周来也不断的思考并和同事、同行们做一些讨论。

敬佩的话就不说了，以往基金会的理事会对于我们一线工作人员来讲就是一堆名字符号，彼此声音是隔阂的，他们的项目要求也许有道理，但是，总感觉离我们实际的东西远，不能做到相互很好的理解。没想到，这次南都基金会的理事会团队直接深入到社区里来，没想到我当时几句本来不想说出来的话，能引起您的关注。

对于我们提出的，不认同基金会在考察立项的时候经常会问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基金会不再资助这个项目你们怎么办？”我想您的思考和回答直接解除了我的疑问。以往在接受项目立项答辩的时候，我通常会纠结于这个问题，脑子里就一味地转着，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由于合作的意愿不敢贸然又出基金会的思路去回答问题。这个误解很普遍，不光光是我一个人，上次参加民间组织论坛，分组设计项目，各组在可持续发展这，大都提到并刻意设计了可自身造血，虽然很别扭，但大家还是都积极的想象如何能从服务群体那里收点费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误解的产生一方面是沟通不畅，另一方面，对于有些基金会来说，促进 NGO 思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等于不断的追问“几年以后，我们不资助你，你的项目怎么办？”同时，NGO 本身要明白，做出一个值得资助和购买的好项目才是核心竞争力。

您关于创新的思考是站在公众的立场的，即考虑到了基金会的工作，也考虑到了其他各方的需求，同时，也思考了创新的社会使命和历史意义。特别是您关于创新的理解，给我很大的启发，非常认同。“服务型 NGO”要创造出好的服务，并且不断完善这种服务，做到“止于至善”。同时，创新不是盲目的赶超，盲目的求新求变，而是个性化的东西。并不矛盾的是创新要有且要适当，不可强求。很多好的东西还是要多秉承，任何的事物都有生命周期，人类在求新求变中疯狂前行，所带来的一系列人文和环境问题势必加速人类社会的消亡。比如现在的电子产品，创新的速度太快了，沦为资本的奴隶，不创新就没法在价格上赶超，就不能引领欲望的烈焰的苗头。如果一个公益项目不新不变就难以吸引到资金的好奇，头脑和力量都用在了新和变上，扎扎实实做好最为基础的服务反而引不起重视，人文思想的快餐时代也是需要引起反思的。我们常提的创新和可复制最理想的状态是不冲突的，既不盲目的追新求变又能不断完善我们的服务，这确实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智慧。

您的分享和引发的思考对我非常有价值。明确了心里一些不够清晰的东西。我想请求把您的邮件登载在农民之子的《烛光通讯》上，以飨读者。

感谢那次社区相逢！祝好！

农民之子 王春华

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地址：<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html/2013-01/15871.html>

[【返回目录】](#)

程玉：改造世界与改善自身——在银杏伙伴 2013 昆明聚会上的发言

各位伙伴，有一个我非常想对你们讲、但一直没有机会讲的，就是我非常地羡慕/钦佩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人生比较早的阶段就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刚才你们大家已经说了，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你们要面对的是一种强大的生活惯性；还有那些好像毋庸置疑的世俗价值观；你们还往往不得不辜负那些最爱自己的人们——父母师长、亲朋好友的期望；面对自身，你们也有会欲望、虚荣，对于生活中的不确定，你们也会感觉到害怕，等等，要战胜所有这些，是需要道德力量和勇气的，所以我非常羡慕你们做到了，你们行使了一个叫“自由意志”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上天给予我们人类的，唯一人类具有的天赋，我觉得，只有行使了自由意志的人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我想恭喜你们，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就“改造世界”和“改善自身”这两件事情的关系？我想分享我的一些思考和心得。

我想先讲一个《论语》里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反复被讲过了，但是我觉得特别精彩，我每次看到的时候都好像有一些新的领悟，今天就试着活跃一下，给大家演绎一下。

这个故事是说有一天孔子和他的几个学生坐在一起侃山，孔子说，你们看，我已经一把年纪了，如果想要发达自己的话已经没什么戏了，而你们却年富力强，又经常说自己好像怀才不遇的样子，那你们到底有什么大的抱负呢？今天都说来听听吧。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像拼命三郎一样的学生，叫子路的就出来了，他说，我希望给我一个不大不小的中等国家干干，这个国家一定是夹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中间，内忧外患，这样才具有挑战性，我要三年之内令这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振作，我们可以一起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

说完了以后，孔子就冷笑了一下：吹牛不上税，接着来，冉有你说说看。

冉有就比较谦虚，他说我也想治理，但是我希望有一个小一点的地方给我，我希望经过我的努力，可以造福一方，让这儿的老百姓尽快地全面小康。但是这个之后就要建立精神文明了，这个事

情要交给更贤达的人来做，我就退居二线了。

然后接下来孔子就问他第三个学生公西华，华比较接近于一个专业人才，说，我其实就是喜欢搞大型活动，相当于我们现在公关公司或者是外交官什么的，我就是要把各种活动搞得风风火火的，孔子就都点点头，没说话。

然后孔子又说，曾皙你也来说说吧，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现在在场其实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在干嘛呢？他在弹琴，曾皙就把他的乐曲用一个铿锵的声音结束了，站起来向老师和师兄弟们说，但是我的想法跟大家都不太一样啊，可以说吗？孔子说，但说无妨。曾皙就说，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想在阳春三月的时候，和几个好友带着一帮小孩儿一起去踏青，我们把冬天穿的笨重的棉袄什么的都换下来，穿上春天的衣服，一起到河里去洗澡，把一年的脏东西都洗掉，然后我们就到岸上唱歌跳舞直到傍晚，在落日余辉当中，我们唱着歌回家。他讲完了以后，孔子特别高兴，说，哎，我跟曾点是一样的啊！

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孔子，某种意义上都有点儿像老庄了——率性而返璞归真，同时又非常地温情。你想，是和一些好朋友和孩子们一起去春游，然后把自己融化到自然当中去，体验人 and 人，人和自然的和谐之美，在这里面有对生命、对自然那样的一种欣赏、赞美和热爱。

那我就在想了，我们都知道儒家是以入世著称的，所谓君子之道是要“修齐治平”，我们会以为儒家的终极关怀是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改造世界。可是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发觉原来不是的，“平天下”并非是孔子心目中的终极关怀（他对子路、冉“治”“平”，的理想不置可否，却唯独对曾点的“春游”抒发了他的认同！）。我们治国平天下完了之后又怎么样呢？或说我们为什么要治国平天下呢？难道不正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有尊严，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可以去寻找自己生命实现的方式和觉悟的方式吗？

故事其实还没有完，后面还有点儿小精彩，谈完了理想之后，前面几个师兄弟们就都散了，曾皙留心眼了，他想问问明白，就没走，留下来问孔子说，老师你今天没有对我们每个人的理想做评价，你为什么不说呢？

孔子先跟他打哈哈，说，人各有志嘛。这也反映了孔子是很包容的，你想做专业人才、你想做一个小地方官、你想管一个国家，这个都是可以的。曾点却不满足，就继续问，那为什么子路说的的时候，你就嘲笑他了呢？孔子就说，那是因为治国是要靠“礼”的（或说好的德行），可是你看他的表现，那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好大喜功的样子，这个和君子的行为是不符的。你们看，孔子并不是批判子路有一个治国的理想，我们都可以有一个理想，但是，你怎么去实现这个理想？理想和你的行为、修为之间有没有矛盾的地方？他是从这个意义上批评子路的。

话说到回我们这里，我们有的伙伴是胸怀天下，想做天下大事的，可是假如说在这个当中，因

为你想做这个大事，你就升起来一种傲慢，你瞧不起那些（你认为是）做“小事”的人，那其实就像孔子对子路一样，也会令人不以为然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总是迟到，让大家等，表面上是一些小节的问题，但透着你对大家的不尊重，你觉得这个事儿小吗？

有关“做人”与“做事”之间的关系，一千年多后，又有一个叫王阳明的，又把这两者的关系诠释出了一番新意。

有一次，有个学生，向王阳明请教经世济民的大道理，王阳明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顺手拿了一本书——《战国策》，翻开书把第一张撕了下来，这是一张战国地图，他把地图撕成好多片，然后交给这个学生让他把地图再拼回来，学员不熟悉这个地图，拼了半天也拼不出来，王阳明说，算了你别拼了，旁边有个童子，王阳明让童子把这张纸给拼回来，小童子一会儿就把这个图给拼出来了，为什么呢？原来在这个地图的背后是《战国策》的编著者刘向的头像，拼头像就容易多了（因为我们都熟悉人脸各部位的相对位置），头像拼好了，背后这个地图自然也就出来了。这个学生一下子就明白老师是在用这种方式回答了他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想知道如何经世济民，就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但世间的事物纷纷杂杂，很难搞清楚，（如同战国的地图，很难拼出来）。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要做一个好人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应该是诚信的、仁爱的等等，这些东西没有差，全世界都一样，几百年、几千年，有人类以来都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做人”入手，从我们自己入手，从我们怎么对待家人、怎么对同事、怎么对同伴入手。有趣的是，“做人”做好了，好比头像拼好了，地图——好世界也就拼出来了。

我想我们这个银杏计划在选题的时候，其实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在今天我好像觉得这个项目的意义又变得更加深刻了。就是说，我们是从人开始，是通过发展“人”来推动行业的变化，这些人可以成为骨干、种子，然后推动民间社会的发展或社会的变革，（等于是说以关注“人的发展”为手段，以建设“民间社会”为目的）。但是真的吗？它（如：“民间社会”）到底是目的还是途径？我们为什么要一个民间社会？还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民间社会（做为“途径”）来使所有的人都怀有希望？！（“目的”回归到“人”的发展和价值实现！）南都基金会的愿景就是使人人怀有希望，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希望的载体，都像你们（这些银杏伙伴）一样，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作出自在的、自由的选择，（真正“活”出自己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终极的追求！这是我今天想说的。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南都基金会的银杏计划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项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本主义（理想），是真正回归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生命层次自我实现的人本主义。也许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看出去，眼里有很多的伙伴，不一定是银杏伙伴，我们的身边也会有很多的老师，不一定是高僧大德、千古圣贤。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谢谢。

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地址：<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html/2013-02/15965.html>

[【返回目录】](#)

程刚：中国基金会：2012 “正能量”

如果说 2011 年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多事之秋，那么 2012 年则可称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稳健发展的一年。在 2012 年，中国的基金会快速发展的态势有所减缓，基金会的数量增加了 336 家，增幅约 15%，较前两年的 20% 相比有所放缓；总资产、捐赠收入、公益支出等关键财务指标保持稳定发展趋势；但是从整体的基本面来看，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还是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发展放缓带来的影响。

2012 年，中国基金会领域发生了许多大的事件，可以用眼花缭乱、耳目一新来形容。笔者认为这一年中国基金会发展是健康的、向上的，从多个方面都传递出了正能量。如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样，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正处于难得的历史发展时期，当然，基金会也不例外。

基金会走向规范化

2012 年是公益基金会发展规范化的一年。6 月份，民政部发布消息称已经重启中止多年的“慈善法”立法进程，并已经将“慈善法”的初步草稿上报国务院。这是我国慈善行业又一重大立法事件，是继 2011 年郭美美事件以后，民政部在慈善立法方面的第二次大动作。慈善法是指导和促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上位法规，毫无疑问，将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7 月底，民政部出台了《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在“基金会接受和使用公益捐赠”、“基金会的交易、合作及保值增值”和“基金会的信息公开”等方面作了更为可操作性的指导。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项目人员的工资福利应计入“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这将导致基金会管理成本增加而突破 10% 的限定，可能会加快基金会由运作型向资助型转变。这或许是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也可能是误打误撞，但无论如何，对推动基金会转型打造良性公益产业链是有利的。

2012 年基金会行业内的大型活动异彩纷呈。7 月份，首个国家级综合性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召开。这次深圳慈展会可谓盛况空前，全国共有 544 个公益机构、项目和企业参会，在三天的展会上共有 41 场公益沙龙、18 场公众体验举行。各路公益领域资深人士、专家学者云集，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益慈善界快速发展的丰硕成果，也展示出了公益慈善

人勇于创新的精神。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这么重大的盛会结束后，似乎少了些后续的动作，缺少些深度挖掘。由此，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本应该由民间组织主导的事情其根本价值与意义所在，在歌舞升平之后，是否又走回到了“一地鸡毛”的老路之上？

8月底，一年一度的基金会中心网透明度大会召开。基金会中心网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中基透明指数 FTI 平台的上线开通，试图以数字量化的方式推动中国基金会的透明。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布拉德先生在书面致辞中说，中基透明指数的上线意味着基金会中心网正在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基金会行业

设定新的道德标准。人们常为中国基金会行业的高速发展而感到惊叹，而今天中国政府在基金会信息披露上设定的高标准和基金会行业自身推出的更加严格而公开的指数更完全出乎全球领袖们的想象。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中国公益慈善界的领军人物徐永光先生讲道：中基透明指数最重要的价值是给公众一把打开基金会透明的钥匙，然后用脚投票，用公众的力量推动中国基金会的透明。

11月下旬，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广州召开。这届年会的主题为“财尽其用，追求卓越”，年会由15家非公募基金会共同主办，参会代表超过600人，为历届之最，同时也成为今年国内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行业盛会。来自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NGO组织、学界、政府的代表就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筹资、资助、投资增值、媒体传播以及与草根NGO合作等情况开展了深入的研讨。在会议结束时公益慈善界著名人物何道峰先生甚至感慨地倡议应在2013年举办中国公募基金会改革与发展论坛。

人才培养之年

2012年，公益慈善专业人才培养成为年度的一个热点，堪称“人才培养年”。多家机构纷纷推出公益慈善专业人才培养项目，似乎侧面印证着公益慈善业正在走向朝阳产业。

9月，全国首个全日制的慈善学方向专业教育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开课，将为中国的基金会领域培养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学科建设引进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师资队伍邀请了美国、中国著名的学者和具有一定经验的基金会领域人士，所授课程、教学方式采用和学习美国大学的方式，既有专业性很强的公益慈善理论课程，也有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同时还有来自业界的沙龙交流等方式，努力打造懂得慈善理论、了解慈善实际操作的实用型专业人才。

将公益人才的培养教育纳入到全日制教育体系中，是2012年公益慈善领域的一个大事件，也是高等教育培养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创新的有力实践，昭示着我国公益慈善专业人才培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将为的公益组织源源不断的输送经过专业培养的，有专业思维和技能的公益新人，将会对中国未来数十年间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开设了基金会管理方向的MPA，用于开展高端人才的

培养。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 MPA 还同美国圣母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毕业生可以同时获得这两所大学的 MPA 证书，旨在为大量涌现的非公募基金会培养专门的高级管理人。

2012 年，基金会中心网启动了在职人才培养项目。与美国“赠与亚洲”等机构合作，自行开发培训教材和课程、培养讲师队伍，最终将以市场机制培训和培养基金会所需的各级专业人才，将是 2013 年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的又一个亮点。

2012 年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正在走向成熟，其在业界的影响力十分了得。众多具有发展前景的草根机构领导人、创始人，甚至一些新兴基金会年轻领导人都走进到银杏伙伴计划中，使其已经成为 2012 最具影响力的公益慈善人才培养项目。项目实施方秉承南都公益基金会关注民间公益的使命，

凭借其得天独厚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先进的项目管理理念和模式，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11 月，“公益星火计划”闯入人们的视野。这个项目由香港理工大学、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三方联合举办。“公益星火计划”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化、专业化、跨界培养高端公益领袖人才的项目。其中，该计划中有一项内容是“中国慈善公益人才高级研修班”，学员主要来自于有一定基础的 NPO、基金会、媒体、社会企业、企业 CSR 部门等。该项目以“民非组织+院校”合办培养形式，培养具有实操性、国际化的复合型公益领袖人才队伍。

12 月，由民政部指导，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安利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十余家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参与的“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在京正式启动。该项目由安利公益基金会出资 1000 万元，计划在三年间，每年从申报者中选拔出 50 名“最具潜力的公益慈善领军人物”，再由民政部领导、知名基金会负责人、业内著名教授学者等组成的人才培养专家团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同时，该项目还借鉴了商业孵化的模式，因此也被称为公益慈善行业的“创新工厂”。

在追求透明中前进

正如中国公益慈善界的领军人物徐永光先生讲的，2012 确实是有喜有忧的一年。

透明度和公信力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基金会中心网的年底收官之作仍以透明为题，12 月 26 日首次发布了中基透明指数 2012 排行榜和基金会透明报告，公布了中国 2012 年度 50 家最透明基金会和 30 家最不透明的基金会名单，通过发布的透明报告可以看出，超过 6 成的基金会没有达到合规分值，行业整体透明不及格。有 17 家基金会并列排在最透明基金会榜单的第一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也名列其中，引起了部分网友的吐槽。由此可以看出，公众对郭美美事件仍然关注，尽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透明方度上花了大力气，已经有了极大改善，但公众却似乎并没有买账。这说明透明度后的公信力建设既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

同时还需要一个过程。

透明是一把双刃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儿慈会）在成立的短短 3 年里，秉承民间公益的发展理念，实现了快速发展，所取得的业绩可圈可点。中华儿慈会对透明度工作十分重视，通过自己的官网和基金会中心网披露了大量信息。也正是这个原因，网友从其披露的信息中发现了错误，一个低级看似可怕的错误，闹出了“洗钱 48 亿元”犯罪嫌疑的大新闻，尽管后来的审计报告表明了账目错误“属于会计报表编制差错”，律师也排除了其“洗钱”的行为，银行也证明了其清白，但这一事件确实使儿慈会受到了伤害。我们可以看出，透明是有代价的，透明需要专业化的能力和管理水平，透明需要良好的治理与健康的公益文化，透明同时需要回馈公众的质疑及有效地应对。

充满期待的 2013

在 2012 年，有一位重要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自从进入到慈善领域以来，他始终持低调、务实、踏实做事的风格，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逐步进入到基金会人的视角中。他将“资本精神”与慈善思想的结合做了很好地诠释。他的家族慈善理念正在引领和影响中国的富人慈善，而卢德之博士的百亿基金会承诺更是对中国现行相关政策的极大挑战！徐永光在出席华民慈善基金会成立四周年大会时讲道：“德之投入巨资创立华民慈善基金会，加上他的实践和思想，已经让他成为了中国民间慈善行业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在中国，有许多为慈善出钱的人，有许多为慈善出力的人，也有一些为慈善出思想的人。德之是一位既出钱，又出力，还出思想的人，而且是出大钱——100 亿，出大力——亲力亲为，出大思想——德之的‘资本精神’理论，可以说是创建了现代新财富观，是对于市场精神、道德、伦理的理论创新。所以，我说卢德之是中国企业界、企业家走向现代职业慈善家第一人，是中国在世界范围拿得出手的真正的慈善家，是能够对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导者。”

2012 年，社会企业、社会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社会影响力投资成为了年度公益慈善领域新的热门词汇。可能人们还无法理解这些词汇的真实含义，但确实感到了扑面而来的阵势，也许是人们期待创新，用来寻求和探索中国特色的慈善发展道路。当然，中国基金会不乏探索和创新之举，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在寻求专业化发展便有所行动，逐步走向联合劝募机制，逐步形成专业化发展的战略，为中国大型公募基金会的改革与发展做了有效探索。

2013 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中共十八大选出的新一届领导人已经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强调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用社会的力量办好社会的事情，是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期望在这一年里，基金会的税收政策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有所突破；在建设健康良性公益文化方面有所改善，基金会行业的专业化水平逐步提升，现代慈善理念不断普及，政府管理不断创新，

基金会行业能够步入理性健康发展轨道，用慈善事业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加速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

总之，2012 年故事很多，相信 2013 年故事同样很多也很精彩。总结 2012，展望 2013，相信基金会行业的明天会更好。

来源：社会创业家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dcef4b0101f16r.html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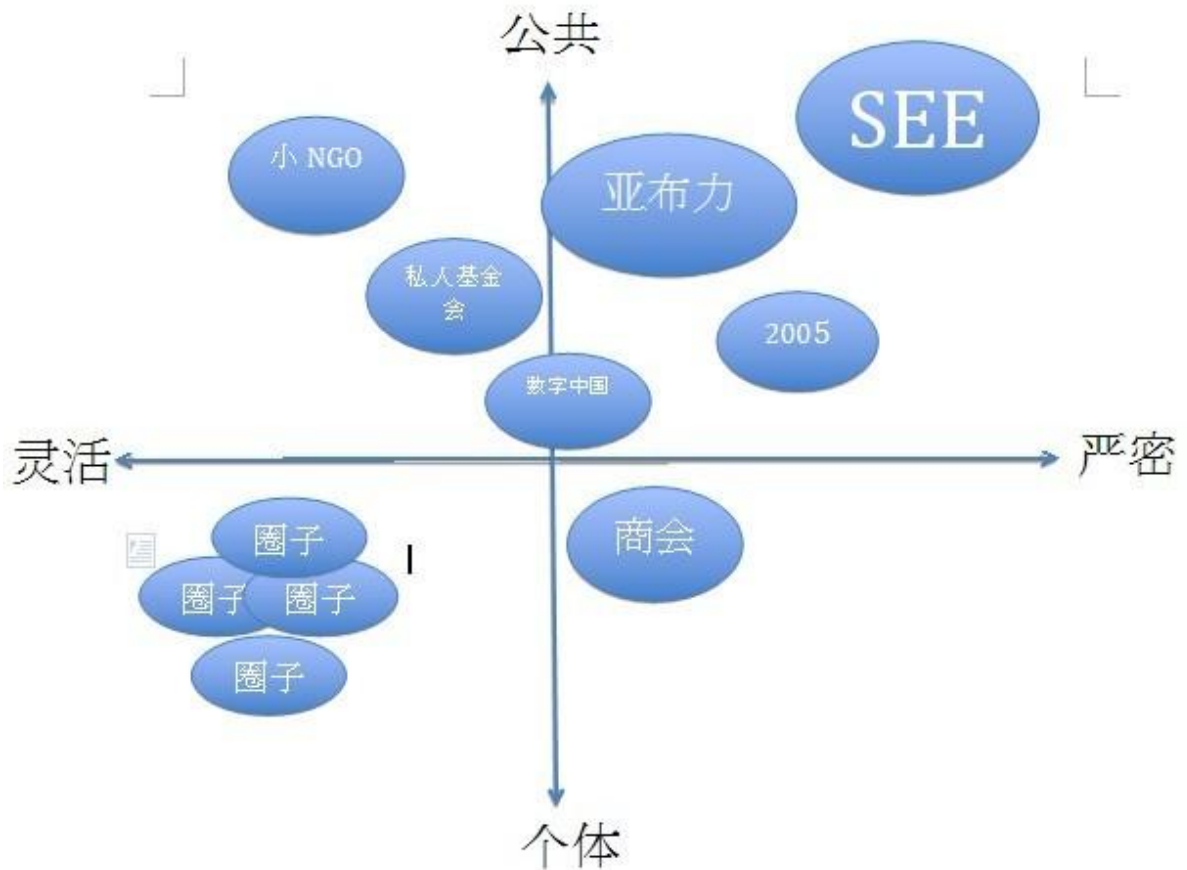
王维嘉：自保、自治、自律——企业家 NGO 的公共诉求

作者王维嘉系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论坛）创始终身理事；欧美同学会 2005 委员会共同创始人，第三任理事长；数字中国联合会共同创始人，常务理事；阿拉善 SEE 协会创始会员，第一任章程委员会主席，第三任副会长。

在过去十年中我不经意地深度介入了四个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组织。在亚布力论坛中我是除了陈东升理事长之外唯一一个连续十三年参加年会的理事。在其他的三个组织——阿拉善企业家生态协会（SEE），欧美同学会 2005 委员会和数字中国，我都是创始人或创始会员之一，也成了干活较多的人。

企业家办的 NGO 无非是按地域、行业、经历或者是社会议题划分。我们亚布力论坛，既不是按行业也不是按经历也不是按社会议题划分的，更多是按价值观划分。

分析企业家 NGO 的形态可以有这么两个主要维度。一个是利益诉求的方向，从个体，到企业，到行业，到社会（注意，这里没有价值判断）。第二个维度是治理结构，一类属于比较松散或者是灵活型的，另外一类属于治理比较严密的。通常由少数个人主导的组织，它的治理结构相对来说会采取比较灵活的结构，或者说少数熟人在一起，就会用灵活的结构。因为不需要太多烦琐的章程。但是当一群生人在一起，人数又比较多的时候，只能采取比较严密的结构。



企业家 NGO 的利益诉求和治理结构

我们可以用上图把企业家 NGO 都标注出来。横轴是治理结构，纵轴是利益诉求。凡是有明文章程的都在纵轴的右侧，如果没有明文章程而是靠大家默契的在左侧。凡是公共利益的都在横轴之上，小于行业诉求的都在横轴之下。

阿拉善 SEE 是 2004 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企业家环保组织，有近 200 名会员。SEE 的利益诉求是完全公共的，不仅和我们会员企业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跟行业利益都没关系，纯粹为了环保。SEE 的治理结构是中国企业家 NGO 里面最严密的，对章程的执行也最严谨的。亚布力论坛是成立于 2000 年的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一个企业家组织，有近百名理事。它的诉求也是非常公共的，但是毕竟关心民营企业还算是一种自利的需求。因为亚布力论坛创始理事是一帮朋友，所以治理上比较灵活。

数字中国囊括了中国高科技行业 and 风险投资行业的上百名著名企业家。它是一个行业的利益诉求。也是因为由几个比较熟的朋友创建，因而采用比较灵活的治理结构。

欧美同学会 2005 委员会由 200 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海归组成，理事们有企业家，大企业主要负责人，著名学者，律师，媒体人和艺术家。它的主要使命是联谊海归精英，汇聚全球智慧，和推

动社会进步。2005 有比较明确的章程和较严谨的治理结构。

各地的商会更多是关心自己企业的利益，通常商会都有明文章程，但各商会对章程的执行程度不同。目前中国还有许多私人基金会，基金会的利益诉求通常是公共的，如果捐助人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运作基本按照捐助人的意愿进行的，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没有严密的治理结构。SEE 资助很多中国的草根环保组织。我在担任 SEE 副会长时负责 SEE 基金会。发现很多小的 NGO，他们是公共的诉求，但是没有严密的治理结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圈子，如红酒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那就纯粹是个人的诉求和非严密的治理结构。

企业家 NGO 特别是公共组织的诉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在生存这个层面，我们要自保。

第二是在获得社会的认可这个层面，我们要自治。

第三是在对社会负起责任这个层面，我们要自律。

自保就是争取最基本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生命权和财产权，以及由财产权衍生出来的创业权是欧美普通民众在 18 世纪已经取得的天赋权利。我们要争取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与这个社会所有其他群体，譬如白领和农民是完全相同的。

过去几年发生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给全中国的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撼。重庆事件告诉我们，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是没有保障的，生命是可以比渣滓洞更残忍的手段摧残的；财产是可以任意没收的。去年 9.18 各地的在民族主义口号下的打砸烧告诉我们一个普通市民的财产是可以随时被烧掉的，头是可以被砸破的。这两件事的发生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绝非偶然。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打击黑社会都是正常的。最支持打黑的其实是企业家，特别是没有特权的民营企业，因为黑社会的特点就是暴力垄断市场，进而使守法的企业无法经营。企业家中当然有犯罪的也必须接受法律制裁。但大量事实已经证明重庆发生的是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假证假供，编造纪录，严重践踏法治的人身迫害。

虽然这只是在个城市，一段时间内大面积出现的情况，但如果不是那件极为偶然的公安局长夜奔美领馆事件，谁能保证重庆模式不会在中国大面积复制？值得我们警醒的是，重庆大面积迫害企业家并不是孤立的，是过去十年来大的政治气候积累的爆发，重庆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的。看到一篇文章说，重庆打黑是有宪法背景的。为理解这句话，我特地查了 2004 年最新修订的宪法。以下是宪法中的相关条文：

我们的国家体制：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查遍了所有词典，发现“专政”只有一个英文翻译：“dictatorship”。

而”dictatorship“更常用的中文翻译是“独裁”。全世界在宪法中明确表明自己是专政国体的只有两个国家。

阶级斗争还要搞吗？

宪法里说，“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所有制的不同待遇：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财产的不同待遇：

“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任何一部宪法中保护的财产当然是合法财产，为什么私有财产前面要特意加“合法”二字呢？为什么私有财产不可以和公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呢“？当法律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宽泛时，当指认财产“不合法”非常方便时，公民的私有财产就很容易被侵犯。 这正是在重庆发生的。

除了宪法外，还有大量的刑法和各类法律法规的规定，比如劳教制度等都严重地威胁着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著名律师陈有西在微博上说：“中国刑法八个修正案，市场秩序方面罪名已发育到112个。罗织很方便。抓起企业家，随便可弄到五个罪以上。不移民就是进去。中国刑法分则不简化合并，这类吓走富人的现象会愈演愈烈。”

看看其他省市不时出现的非法迫害企业家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只要这个国家还是一个专政国家，只要宪法内的歧视性条款还在，只要可以被滥用的刑法和法规不修改，类似重庆这样大面积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事件将不会是最后一次，重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地方。只要侵犯生命权财产权的理念堂而皇之地存在，侵犯到每个人自己头上就只是时间问题。在西方18世纪就解决了保护生命权，财产权，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19世纪解决了取得以普遍选举权为首的政治权利；20世纪解决了男女平等，种族平等社会权利。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争取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企业家第二个层面的诉求是自治。为什么要自治？因为只有自治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是有自治传统的国家，唐朝的时候大概有三万的官员管理九千万的老百姓，官民比例是1：3000；清朝是二十万的官员，四亿的百姓，官民比例1：2000；民国是五十万官员，五亿百姓，官民比例

1: 1000。今天由纳税人养活的各种公务员非公务员大约有七千万，官民比例 1: 19。虽然这个数据可能有误差，但数量级是不会错的。

在过去中国传统社会，这么少的官员是如何管理这么多百姓的？民国时，贵州一个县总共只有 12 个官员，怎么管理大概 20 万的老百姓呢？秘诀在于依靠几百个志愿者，这几百个志愿者就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乡绅，他们出钱出力出时间来修路修桥办教育办慈善，解决乡里纠纷。1949 年以后，中国学习苏联把社会变成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这样的统治就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由政府把所有的事，所有的人统统管起来。这种统治需要把社会的所有自然联系全部打散，因为任何一种人群中的自然联系都可能不利于这种统治。这样管理的成本必然大幅度增加。而且当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社会一定会乱。

过去十几年中国财政收入每年是以高于 GDP 增长的速度在增长。但维稳费用增长比财政收入要快得多，根据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2009 年的财政收入为 68447 亿，增幅 11.7%，而维稳费用为 5140 亿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7.5%，年增幅达 47.5%。如果以 2009 为基数，按这个速度增长下去，到 2019 年把全部财政收入作维稳都不够。当然维稳费用不可能每年都以 47.5% 速度增长，但只要显著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一定不可持续。

社会自治的最大好处就是由民间自愿地负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成本。当志愿者（如乡绅）出于自愿在管理社会时，他们花钱花时间花得高兴，因为这种为社会的服务给他们带来了尊严和荣誉。但传统的自治和现代的自治有什么区别呢？下图给出了比较：

	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
组织形式	熟人：宗族，地域	生人：基于契约的 NGO
中间力量	士绅阶层	企业家
价值观	孔孟之道	普世价值

传统自治和现代自治的区别

传统的自治主要基于熟人的自治，依赖于宗族或者是地域；自治的中间力量要是士绅阶层；他们信仰的价值观和皇权官府是一致的，就是孔孟之道。今天由于社会的流动性，社会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基于生人的，生人只能基于契约。今天社会自治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是企业家。和过去乡绅类似，由于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他们必须要为社会作贡献。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为了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和世界上受尊敬和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需要信奉人类的普世价值。

NGO 的内部治理为什么重要？因为 NGO 的内部治理是我们自治的基本的资格。如果你连你自己

的小组织都管不好，你凭什么说你有能力负更大的社会责任。这种内部治理同时也是一个实践。今天在中国，70岁以下的人从小都没有自治的训练和实践，包括大部分的海归，都要从头学习。

阿拉善SEE一直很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媒体对我们的环保工作的兴趣不大，一报道就是我们的治理结构，选举和章程。成立SEE真不是为了去搞民主。阿拉善成立大会那一天，有60多个生人在一起，我当时并不认识SEE的发起人刘晓光。但我去的时候，我也交了十万块钱并且承诺每年捐十万连续捐10年。当刘晓光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我建议这些人做常务理事，我就得问凭什么。当时如果是一个熟人的圈子，大家给晓光面子就过去了，或者大家没有什么承诺，不用交钱，捧一个场就过去了。因为第一有承诺，第二当时开会六十多个人，已经超出熟人圈子，所以炒成一锅粥，所以最后只能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常务理事。

媒体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因为这样的学习和实践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

有了内部治理的学习和实践，企业家才能更好地参与公共事物。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探索出一条透明的博弈机制。在中国今天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建立透明博弈机制势在必行。企业家有的时候会抱怨政府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我们自己究竟做了多少该做的？我花了一点时间了解了《劳动法》的立法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企业或者企业家的组织几乎没有实质性地参与，其实政府是希望企业能来参与这样重要的法律法规制订过程的。这样一个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基本上在没有企业参与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一旦形成了以后，企业第一反应是如何规避。像跟所有的员工重签协议。这是中国企业家一个基本行为模式。制订法律的过程我不关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参与。制订完了以后，我看看如何去躲避，或者我搞定哪个官员让这个法律对我不实行。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行为模式，理性积极地跟政府沟通，参与到立法立规的过程中来。政府其实也希望订出一个合理的法律法规，因为谁也不希望定出一个法律以后，所有的舆论都骂，最后他的领导会说，你怎么这么不会办事。

由于有这样的一个体认，两年前的专业环保团队支持下，阿拉善通过协会会员中的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垃圾分类的提案。当提案提出后，大家发现其实和政府有很多沟通的空间，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是能够对环保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未来中国社会应该走的路——建立起一个理性的、透明的、有规则的博弈模式。

如果精英不能先自治，就不会有全民的自治。没有全民的自治，就很难建设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

企业家第三个层面的追求是自律。自律不仅仅是遵纪守法，而是尽超出个人权利的义务。以纳税为例，权利和义务相匹配时应该是：“无代表，不纳税”。但是今天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整个社会就会乱。所以即使今天没有代表，我们也应该纳税。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纳

税。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同意这样一个状况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先纳税，然后再去争取知情权，逐渐再争得代表权。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把它叫做“先尽义务，再争权利”。这才是真正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人类的自然情感和自然联系是保证这个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基础。NGO 正是基于这种自然情感，自然联系形成的组织，所以它一定是正能量组织。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社会可以由基于各种兴趣，各种利益，各种方式组成大大小小的 NGO 的话，就相当于在这个社会中织了很多很多网，任何一个个人都可能被织到某个网里，这时社会的稳定性就大增。基于科学上的大数定律，一个组织的人数越多，这个组织的观念一定越温和、理性。一个社会组织越多，利益越多元化，就越不容易走极端。所以一个社会自治程度化越高，就越稳定，并且越不依赖于外力，人的尊严程度越高。

企业家和学者的分工是什么？我想学者主要是研究理论启蒙思想。而企业家则是探索理性的博弈规则。

中国过去 30 年从计划经济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并因此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今后 30 年能否顺利转型成为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要素有哪些。

第一，政府从默许到认可到今天鼓励市场经济。过去差点把傻子瓜子抓起来。但是邓小平说我们要看一看，那时候是默许。从共产党一次次的代表大会报告都能看出对于民营经济，政府都是越来越支持。

第二，大家常说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第三，从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来，和后来大批的管理学院和成功的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的管理人才。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

未来三十年转型有哪些成功要素？我觉得可以类比：

第一，政府从默许到认可到鼓励公民社会。今天我觉得已经从默许到认可，从过去 NGO 组织要挂靠单位到现在改成备案制。

第二，出现一批社会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他们发扬企业家的精神，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去探索去冒险。

第三，企业也好，成熟的 NGO 也好，要对新创和草根 NGO 做培训，支持。

第四，要参与国际事务，与世界一流的社会组织交流合作。

中国企业家在过去三十年当中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最具有契约意识和训练的一批人。今天的中国不缺理念，缺的是实践；不缺对不合理制度的愤怒，缺的是对合理制度的探索；不缺对民主法治的向往，缺的是民主的训练和法治的实施。作为最具有契约意

识和实践的企业家阶层有责任在社会转型的重大关口一寸一寸地铺设一条理性和规则的大路。这是作为中国过去 30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军的企业家阶层在今后 30 年中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来源：共识网

地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3022777894.html

[【返回目录】](#)

冯仑：民营企业和个人已成为公益慈善主体

2013 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24 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

上图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冯仑：

2013 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24 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

以下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在“围炉漫谈 F：企业家与公益”部分发言实录。

冯仑：大家早上好！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公益方面的基本的情况，大家可以了解到，刚才主持人讲话的一个背景。一是目前国内作为整个的公益，私人 的这部分和民间的这部分，占到了每年公益捐款占到了 65%，这是在全国。全中国一年收到 100 块钱的慈善公益捐款，有 65 块钱来自于私人 和民间，包括民营企业还有一些自然人，个人，大大小小的加起来一共是这些。但是中国民间占有的资源的情况是这样的民营企业提供了大概 80% 的就业机会，60% 的 GDP，50% 的税收，同时只占用了 30% 左右的信贷资源。在这个背景下，提供了 65% 的捐款，也就是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主体，实际上是在座所有的民间和私人企业，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况。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在前年开始逆转，前年的时候，私人部门的捐款，第一次超过公有部门，到最近两年已经是上升到 65%。这是一个现实，在中国大家说来说去，不管是差距大也好，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在公益慈善方面，中国的民间和民营目前是一个主体。

第二，从公益基金的构成情况看，目前为止，我们的公益基金，慈善基金分成两类，一类是公募的，一类是私募的。公募就是可以向在座的每一个自然人去募款，这个是公募，有点像上市公司一样，到处可以发股票。私募就是没上市公司，不能到处发股票，就是自己指定对象去募款。私募基金的发展速度，远远大于公募，也就是说目前增长最快的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目前现在有 1400 多家，2000 多家，非公募基金有 2000 家，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最近 5 年成立的。而这个非公募将近 2000 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几乎全都是私人企业的企业家以及一些私人建立起来的，绝大部分是

这样的。而公募的基金，是一些传统的在机关、部委和协会下面，挂靠的这些公募基金，是比较传统的，历史比较长，但是增长比较慢的，所以目前公募基金有 1000 多家，将近 2000 家。现在非公募的超过了公募基金，非公募的基金主要是以民间的企业和私人为主。而公募的相反是以过去的机构和公部门的机构为主。因为当时这些牌照发放有一定的倾斜，不发放给私人，所以从 6 年前开始第一个关于公益基金的法规出台之后，就刺激了所有国内的，民间和私人企业参与到公募基金当中，这就是非公募基金，发展最快的。

第一个国内新的私募的基金，也就是非公募基金的发展，就是现在做得非常好的有华夏资产基金，当年由(王兵)包括我，还有李东升，还有汇源果汁的朱新礼我们 4 个人发起的，剩下的大部分的非募资金大部分在 3、5 年的历史。所以说目前非公募基金的成长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是公募基金当中超过了一半以上。这部分公募基金的主体就是我们的企业家，还有一些私人。比如说大家现在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企业包括来开会所有的企业家，差不多他们的公司都有一些私募的公益基金。比如说泰康，阿里巴巴[微博]，万科，万通，每家企业都有，最大的就是福耀玻璃(8.42,-0.14,-1.64%)曹德旺，他把股票捐到非公募基金里面，这是目前最大的，应该是 30 多亿。所以说私募公益基金，一是由企业家做的，另外一个现在通过现金、资产，特别是股票的形式，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之后，规模增长得非常快。这样的情况，带动了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判断，在公益慈善方面：第一，民营企业，所有的私人部门，包括所有的自然人，个人，大家做的毫不逊色，我们跟过去几年来比，我们进步很大，很快，已经成为主体，而且发展速度很快。

第二，从民间企业家对公益的意识方面来看，自觉也大大超出了原来预期的时间。刚才讲的牛根生，或者是曹德旺，自己几乎所有的资产都捐给了公益慈善。这方面的做法，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跟美国当年比，我们比他们做得还好。因为他们都是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做这个事，第一代赚钱，第二代才琢磨捐钱，第三代、第四代才开始做公益基金。当然，现在的美国第一代也有这样的。但是在中国目前所有民营企业的历史都不到 20 年，大部分不到 20 年，但是他们同时都是赚钱，捐钱，而且在目前发展速度也是非常之快，包括王健林他们都有表态，还有红军还有很多的企业家表态，他们在未来会把所有的财产捐出去，我想讲基本的情况，是要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信息，中国在当下，公益慈善方面，发展的速度很快，而且进步非常之大，民间是一个主体，未来我们个的经济发展还会更进一步的刺激和引导我们的民营企业来参与到公益慈善当中去。

这样一个背景，实际上我觉得有 3 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开放社会下，所有的全球化格局下企业治理，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全球对这个背景下看，对于企业的治理，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这部分的要求在最近 10 年，在全球范围内都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要求。也就是说，一个好

的企业的治理，除了过去传统讲的董 事会，股东大会的治理，更重要的强调企业跟社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怎么样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和平衡的关系。也就是说你除了要照顾到股东的利益，还要施惠于周边 所有跟你相关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企业持久、均衡的增长。这是全球在公司治理当中特别强大的一个趋势，而这个趋势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实践，包括 MBA 课程都直接影响到国内的很多民营企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加速了民营企业的进步和提升以及在公益慈善方面的关注。

第二个原因，我们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民营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大家还记得早几年，媒体舆论非常多的谈这个话题，赚了钱以后不捐钱，捐钱少，等等会 讲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职责私人企业。这也是一个良性的压力，这种良性的，善意的公众的压力和媒体带来的民意的期待，使所有的民营企业企业家意识到，在中国要持 续的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要照顾到广大的在经济转型期间所有的跟自己利益相关者他们直接的诉求和关切。

第三个原因，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大家看到陈发树他们讲的故事，我们似曾相识。从小时候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然后 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当他自己事业有成就之后，就回报乡里，修路架桥，资助教育。这些事情在过去，有一些东西在文革的时候歪曲了很多，比如说你到大义，看到 刘文彩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中国传统上，历史上很多人都有这样好的传统。这个文化基金，实际上也深刻的影响到目前的民营企业，他们会在自己发展事业当中，对 自己的乡里乡亲，和直接周边有关的一些人，给予尽可能的关照和照顾。这样一个文化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种道德诉求，一种情感诉求，以及自己特殊的经 历，都会加快民营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步伐。

以上这三个原因，我相信是最近几年民营企业不断来提升他们公益意识和改进公益慈善方面的作为。而且，能够尽快的，以尽快的速度超过公部门的一个原因。

嘉宾：问题提给冯总，因为企业家做慈善，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中国历史上稍微富有一点的人都可以。那我想现代社会，在今天中国特定的社会状况下，企业家 进入社会公益和传统的做慈善的思路和手法，应该更多的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怎么思考的，怎么体现的？

冯仑：我感觉有几个方面，现在跟传统的慈善差异非常大：第一个，动因是非常不同的。传统的慈善更多的情感诉求和伦理诉求，也就是说我做这件事，小时候在这 遇到一个很苦难的经历，现在我有能力了，现在回来反哺，报答，感恩，感激，这个是传统的慈善；第二个是伦理，我们说做一个好人，人，道德，这方面要求，自 然而然的就变成了你有能力之后要照顾乡里，要关照周围的乡亲，这是一个基本的动因。

现代我们讲的公益，我们在做的时候，刻意把公益跟慈善分开，因为公益是对所有人的，不分穷人，富人。而慈善在中国传统的中文语境里，似乎是强者对弱者，有 钱人对没钱人，拥有者和对

物产者这样一个概念。你会发现，很多企业家更多的是强调公益，在他们注册的基金会里，他们是把他们分开的。有的一般也叫慈善，在西方慈善和公益大体上是差不多，在英文里面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中文里面，是两件事情，我们现在是把它分开的。我们做的是公益，公益的动因是来自于理性，来自于目标，服务所有的人群。也就是说，介于政府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政府做不了，社会又需要，而个人又有能力组织起来去做，大概是这样一个地带。所以我们又不是政府，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又不是提供公共产品，我们是提供准公共的一个产品，这些都是学术上的研究，首先，起因是不一样的。

第二，治理方式非常不一样。传统的公益组织，我相信他们不谈什么治理了，有钱就捐了，捐完了以后，特别强调经验，另外也用的是一个传统的方法。像陈光标直接就捐给受益人；公益组织捐有两种，也有捐给直接和需要的人，但是也有像我们跟吕芝教授一样，我们是资助给另外专业的NGO公益组织，由他们再去实施项目。所以说治理方式非常不同。传统的慈善更多的是靠个人和亲戚朋友，靠经验；而现代的公益，更多的是用一种专业人才，加上透明的治理完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传统的慈善，比如说邻居有困难了，周边发灾，你就捐钱，这件事一次性过了，不连续，也不考核，就算了。但是对于公益组织的基金会，有严格的考核，而且每年在国内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基金会中心，他们每年都在做排名。包括国外的福布斯，也来给排名。所以每年在透明度方面，资金监管方面，运用方面，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治理和要求，这是不同的。

带来另外一个不同，确实效率完全不一样。现代公益组织，由于治理比较透明，有效，它可以大规模的复制，跟企业一样。另外，能够运用使用更多的专业人才。虽然我们大面积上来说，专业人才的确很缺，而且数量也减少，但是在我们国内治理得比较好的一些公益组织，这些人才水准已经很高了，因为阿拉善的秘书长，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毕业的，我们万通的基金也是哈佛毕业的，另外还有杨棚资深的专业人士。这些才能够带动公益组织能够很有效运行。现在国内公益组织的效率，很有意思，国内最大的儿童心脏病的基金，也是全球最大的基金是企业家做的，是王兵领导的华夏IEO公益基金，这个基金在7年前我们参与创办的时候，400万开始的，今天每一年收到的捐款和支出都超过了1亿人民币，累计做了22000个手术，他们就像流水线一样，这就是企业家和治理带来的结果，效率非常之高把公益做成了平台模式，我们像商业模式一样，也研究这个公益的平台模式。比如说募款的效率非常之高，一晚上可以募几千万。这是最大的儿童的心脏病的基金捐助。

国内最大的救灾的基金，杨棚领导的壹基金，它是救灾的基金，它的定位是救灾，所以哪有灾，第一个冲到前面的是壹基金，这是国内最大的救灾基金。大家也知道，国内最大的环保公益基金，有将近220位企业家组成的阿拉善的公益基金，也是由企业家组成的，这是非常困难的，有几百个企业家在一起。但是正因为企业家有组织的能力，治理的能力，才能够把这样的公益组织提高它的

效率。另外国内最大规模的私募基金也是请企业家他们来管理的。我刚才讲现代性和差异就是，由于治理的不同带来了效力的不同，传统的经验，做传统的慈善，个人有钱，捐完了就完了。我们现在讲公益的效率，也讲我捐一块钱出去可以带动几块钱。比如说我捐一块钱，带动五块钱，创造十块钱公益的效果，这是我们企业家思维。

传统的好人，道德先生的思维，反正看人，给了就完了，事后这个钱是不是喝酒了，买肉了也不管了，反正我当时道德上，心理上得到安慰就可以了，这是不同。

最后一个更大的不同，企业家参与的公益组织，他们承担着一个很强大的使命感，对于公平社会的建设，对传统中国封闭的社会组织进入到开放的，自制的，自我管理的社会系统，他们承担着一个很大的使命感，这也是企业家做公益和传统的慈善不同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我们最近发现国内排名很有意思，公益组织排名很有意思。在福布斯的排名来说，治理得最好的都是这些民营企业家领导的公益组织，我们官方还有国内的一些排名，都把政府排到前面。从排名可以看出来，大家在这个方面都比较计较，也就是说公益组织是一种现代的组织，要用现代组织和治理方式，来完成它的使命。所以说企业家参与，像梁先生这样，一个真正有理性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来引导的民间组织，启蒙阶段非常多，非常必要，但是它跟企业家不同的就是资源有限，另外组织能力，治理能力也不如企业家，所以它发展更多是在道德层面，知识启蒙层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光芒，让我们知道，点燃了企业家的思维和未来的心灵方向，这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从治理的效力来看，后来出现的以企业家为主的公益基金，是未来中国公益慈善方面，最主要的群体，也是最大的推动者，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中国未来慈善和公益发展的一个方式。

嘉宾：我从企业家成立公益基金受益者的角度说说我的看法。我们都知道，环境的领域通常在慈善里面是一个特别边缘的份额，杨宏我们昨天聊了这个世界也说了，美国也是一样，全世界都一样的。公益基金里面，美国的份额从来没有超过5%过，3%，4%的样子。中国现在也是差不多这样，2%多。针对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巨大的环境问题，昨天的倡议书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实际上也对公民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的需求非常非常大。现在在全国公益机构里面，做环境的里面，也能看到，对做环境保护的公益机构可能跟一般做慈善，做救灾还有点不同，它确实有专业要求的背景。比如说工资太低，还说到治理的问题，其实治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自己做这么多年，我做了一个观察，你治理的起点太低了，因为人才来的时候，没有做过治理的背景，当然可以学，但是学习毕竟是慢，时间很长。所以我自己深感到工资的困境，低工资吸引不来，或者是不能让好的人才，年轻人有理想来做，但是结婚了，生孩子买房子有各种压力以后，我们自己就经过很多轮，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最后去了华能，我们当时是跟华能打架的打架以后去了华能。气候变化的领域，技术性很强，梅总都知道我们几个年轻人去了华能，华电这样的机构，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包括很多

基金会，仍然对工资份额有很大的限制的，不能超过多少，因为基金会自己受机构条例限制的要求，整个社会对公益机构也是非常的戒备，说你们是不是来拿钱来了，不干事，光拿钱。我感觉应该有机制来解决绩效的问题，就是刚才张总也提到公益机构绩效的问题，这两点是分开的，没有好的人，绩效也拿不出来，也拿不到好的绩效。所以人才的问题，确实是公益机构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业间政策改变了，政策开放了，鼓励大家广泛的成立公益机构，人才缺乏是一个最大的瓶颈。怎么样吸引好的人才到公益机构来，我感觉对资助方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冯仑：你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现在从一般的情况看，救灾类的，扶贫类的，这类的一般人的薪酬和管理费用相对比较低。像全球最大的救灾组织，慈济，他们的费用大概是在 4%，在整个慈善基金支出的 4%，应该是全球最低的；另外还有宗教组织，宗教组织的人，全部是道德驱使和信仰驱使，管理的费用非常之低；另外像吕教授讲的，环保和专业性的公益慈善基金，人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那么，我们万通公益基金做生态社区的，做了将近 60 个，我们用人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和竞争领域，和盈利事业，但是他们经常打交道，他们的薪酬我们都是按照盈利事业的标准给的。但是他们放在基金会里面，整体上会超过 10%。现在我了解到，很多企业对公益基金采取的方法，都是把他们的工资，都放到企业其他的支出里做帐，然后在公益这部分，成本才能下来，同时这样能用到很专业的人才。现在一般来说在公益基金用到很好的人才，他们都是跟盈利事业做一个机会成本的比较。比如说来你这了，3 年，5 年确实是买不起房，什么都弄不了，确实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也有很多海外留学回来的，做 1、2 年都走掉了，这个问题确实是很严重。我们能留住的骨干，也是采取了一些其他变通的方法，才能够让他们享受比较好的待遇，同时，又能够在这个领域长期做下去。

这个问题，实际上只要有一个口放开，就可以了。我们民政部门不要管 10%，我们愿意多少，私募公益基金吗？你要看结果。私募公益基金，不需要卡成这样，最后是捐款人审核捐款使用的效果，最后是捐款人监督，愿意多少是多少，比如说捐款人感觉是 20%，那就 20%。如果说捐款人认为花多了，降低薪酬，最后通过理事会那就降低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管的私募公益基金，这部分卡得有点过紧了。另外，还有一个监督方式，我也很赞成。现在的管理有点像当年管企业，所有每年的考核，干什么，都是政府在考核的，逐步转到市场还考核，相当于有穆迪这样的机构来评级，是市场化的，中介性的，甚至是一些竞争性的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也是 NGO，他们来用科学的方法评定、考核，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公益组织自然就能够非常努力的去做。因为政府每年的考核标准，根据文件，实际上最终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在里面都有变通的，但是每年都走这么一道。应该发展民间的机构，来考核、评定公益组织的效率，信用等级，比如说评 A+，3A，或者是 2A 这样评定。国内目前有一点雏形，就叫基金会中心，北京有一个基金会中心，它专门的来

做每年的评定。

冯仑：现在中国企业家办的公益，发展和办起的公益组织，非常努力，而且是按最高标准治理的。非常努力，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交流，不断的在寻找各种可以支持我们的资源，来改善治理，这是努力。另外，最高标准，我是讲在国内的最高标准。比如说壹基金发起成立的时候，成立会的时候，包括三马，马魏华，马化腾，马云[微博]，还有牛根生，李连杰，王石和我，还有其他人 and 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就定了一个规律，我们不拿一分钱，连盒饭都不在这吃，我们要吃，自己花钱在别的地方吃。这样每次开会，都可以有记者参加，都是有透明度的。我们做的是国内最高标准的，国际上是不是能做到比我们还好，我们要学习，但是国内做到这样了。

每次开壹基金的理事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旁听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公募基金，我们保证它的透明度是最大程度的，另外财报每年也是透明的，在中国目前由企业家治理的公益组织都是这样的，包括刚才讲的华夏 IEO，全球最大的心脏病的基金，一共才做了 7 年时间，能够做到全球最大的规模。在治理上花了非常的心思，做了平台模式，钱进钱出，最后怎么样完成每一个手术。比如说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例手术大概是 3 万块钱，基金会出 1 万，医院出 1 万，当地政府和自己家筹 1 万，数据库能够做到捐款的人准确的知道这个小孩的情况，或者他是谁，你愿意跟这个小孩联系就可以联系。都可以通过即时的短信和手机都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像 IEO，它的管理的行政费用，捐款人捐一块就用一块，几乎是百分之百，比 85%还要高。行政费用怎么解决呢？由理事另外捐一笔钱，放在一个信托帐号里，作为行政费用。你作为理事要捐两笔钱，除了做项目的钱，还要捐行政费用，这些行政费用，通过信托，帐号来管理。这样的话，其他的捐款人捐一块钱，就有一块钱用在项目上，这些过程是透明的。

目前我用两句话来说：企业家治理的公益基金，是最努力的进行的一个工作，同时也是按照目前国内治理的标准，我们按照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这是一点。至于能不能做到永续的生存，整个公益基金，10 年，20 年，100 年以后还在不在，我感觉只要是治理结构是好的，同时人才是专业的，中国经济是发展的，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100 年以后见，完全是有可能的，只要你还活着。

冯仑：治理的逻辑，企业家来做是对的，比政府更积极。比如说很简单，他都捐钱了，还占你便宜干吗。他都捐了几百万，几千万，上亿，他还跑这来吃一个鲍鱼，逻辑上就不对了，他不捐钱不就完了吗？所以说企业家来做治理，首先没有动机了；第二，刚才杨总讲的，他在这方面做错事的风险巨大，道德风险巨大。比如说

都捐款了，你在这把帐目又搞乱了，中间又浑水摸鱼，拿着钱自己买汽车了，道德风险巨大。股票一掉下来，少赚多少钱。所以你发现没有？治理一方面是我们讲的方法，更重要的治理有逻辑

在里面。相反，比如说红十字会，郭美美，逻辑不对，首先他是拿别人的钱来做，他自己没有捐钱。包括他们多吃一个饭，用这个钱弄出来，解决自己其他的问题，有动机的，有可能性在里面。另外被发现了，公家在暗箱操作，风险很小，没有人关注它，郭美美如果不是干爹的事，风险也不是很大，所以说秀干爹风险很大。所以说他们的治理就不大可能做到你讲的持续下去。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家公益组织，包括醒生来讲，大家都是有道德标准的，非常紧张的，我现在参与 6 个公益基金的发起，也管理一部分，还有在新加坡的公益基金，我每天这些事情都特别的小心。因为从治理上来说，道德标准要求最高的是公募的公益基金，公募的公益基金，道德标准如果是 100 分的话，这就是最高标准；其次是私募的公益基金，这可能是 95 分；再其次是公开发行的股票、债券，可能是 90 分；再下来可能是非公开上市的发行股票的这些公众公司，可能是 90 分；再下边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再下边是私人公司；再下边是你自己跟老婆管的钱。这个钱的信用等级和道德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跟媳妇两人的钱，今天谁多了，谁少了，两个人不存在信用问题，只要你们在一个炕上，这个钱总说得清楚，哪怕是离婚，最后有律师和法院来判断。但是你要拿到公募的公益基金，像杨鹏管的这个钱，差一分都不行，很多小额捐款，你差一点，最后一捅，爆料说壹基金如何黑幕，那所有的这些理事也好，管理人也好，不把他给杀了，公益基金治理的逻辑要对。

还有一个逻辑，包括自然之友，包括吕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理性者，很理性的公益的实践领导人，他们自己有道德要求，这些道德要求也非常高，她自律就很强。就像敬了神，信了教，不会贪污油灯钱，那贪污什么呢？你都给观音跪下了，还贪污？只要你有很高的道德诉求，有很好的信仰，你手往哪伸方向性就会清楚了；凡是盗贼和小偷，就没有这个信仰，没有敬仰，所以手是乱伸的，就伸到派出所去了。

来源：新浪财经

地址：<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mspl/20130224/110714628829.shtml>

[【返回目录】](#)

刘选国：从国际红十字组织建设看中国公益组织建设优劣

2013 年 1 月底，中国红基会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之后启动了“组织能力评估与认证(OCAC)”这一为打造强大国家红十字会而设立的国际评估程序。虽然该评估体系很多标准不太适宜于基金会这种组织形式，但是通过参与评估，学习和了解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价值取向，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红十字组织乃至中国公益组织的诸多优势和不足，更加明晰了中国公益组织改革前行的方向。

按照国际红十字组织“组织能力评估与认证(OCAC)”要求,中国红基会的评估小组由理事、业界专家、社会监督员、专项基金和红基会员工及志愿者代表共24人组成。评估小组按照五个方面、81个标准(剔除了部分不适宜于基金会标准)逐项比对,找出中国红基会在每个标准中分属于ABCDE五个等级中的哪一个等级,举手投票以多数通过确认,最后结果中国红基会的自评得分87分。对照OCAC标准,评估组认为中国红基会在执行、发展、财务、监督、内部沟通与决策等方面表现优秀,得分均在C级以上,但在安全文化、志愿者政策、与捐赠人沟通、员工报酬、项目评估等方面处于A、B等级,属于不及格水平,还需进一步努力。

OCAC是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在对全球180多个国家红会的调研与意见征集基础上制订的诊断式的评估工具,为评定“强大国家红会”提供了具体的国际衡量标准。该标准把红十字会的核心能力分解为五个方面、89个具体特征,每个特征分为ABCDE五个等级,共计495个指标,AB级属于不及格的较低水准,E级为最高卓越水准。其评估过程包括三个阶段:自我评估——同业评估——国际联合会认证。自去年5月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采用试点方式推开以来,目前已有21个国家红十字会完成了自我评估,取得良好效果。

通过参与评估的自评过程,学习了解OCAC评估体系标准,学到了许多知识,掌握了一些国际公益组织建设的理念,比对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标准,能发现中国公益组织的优势和不足。

风险机制待完善

第一,从存在能力方面评估标准看,中国公益组织的规制建设基本完备,但治理结构、领导人的任用机制、风险防控体系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从OCAC评估体系考核的组织立法、章程和战略规划制订、组织使命的陈述和传播、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及时修订这些评估项看,中国红十字会及中国红基会均能获得高得分。中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章程及各项规制建设均已颁布并能及时修订完善,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目标的制订和考核均能形成制度,这些确保组织具有合法性和较强的生存能力。

但在领导层选择的自主权、强有力治理的评估项,只能达到B级水平,社会组织的自治性特点不够突出。领导人的产生目前的模式是从政府(党组织部门)提供的名单中挑选其领导层成员,达不到自行选举然后再提交政府审批或更高层次的完全自行选举产生的状态;理事会的治理也仅能达到理事会成员参加理事会、理事会产生建设性意见的水准,达不到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审批工作计划和预算、获取可获得的所有信息的水准,理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责权边界也没有彻底厘清,中国公益组织理事会的权威性普遍不足。在风险防控的评估指标里,尽管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经历了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后,声誉风险防控机制有了提升,但也仅能达到C级的及格水准,即制订了危机管理策略,有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定期与媒体沟通并审视社会化媒体环境,但与公众的互动不够。

志愿者参与度不足

第二,从组织能力评估标准看,中国红十字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基础设施条件、物流管理、财务管理、行政管理、法务管理等方面均能获得较高评价,但储备资金实力、员工报酬评价偏低,志愿者参与决策不够。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纳入了政府系列的参公管理单位,因此人员经费、办公场地都有了基本保障,财务管理、外部审计、合同的法务审核等方面都能做到比较规范;中国有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这些方面也能获得较高评价。但在报酬公平合理、工作环境的安全等方面只得到B级评价,属不及格水准;在非定向收入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方面只能达到C级水平,达不到非定向收入未来五年可合理预测或开展投资使非定向收入有新的来源的更高水平。从中国大多数公益组织看,基础设施、办公条件大多达不到自有或长期租赁或占有的等级。从内部沟通和决策的评估标准看,志愿者参与各层级的规划及决策只能达到B级水准,还缺少必须征求志愿者意见的机制;领导层对管理层、高级管理层对中级管理层的管理责任委派也只能达到及格水准,达不到权责明晰、沟通反馈畅通、绩效评估体系完备的境界。

缺乏投资收益

第三,从与利益相关方关系及资源动员能力看,中国红十字会及中国红基会均有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机制,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在紧急状况下充当领导者角色,但对利益相关方满意程度的关注度不够,组织的储备资金总额较少,非定向资金来源不足,投资收益更不足。近几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都注重维护和管理外部关系,与政府及主要利益相关方保持主动沟通,积极开展品牌传播活动,通过项目结案报告、年鉴等媒介与重要捐赠人进行定期联系,成为中国弱势人群的最主要的代言人。能组织大量志愿者开展救灾抢险、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但是捐赠资金以定向资金为主,由于中国人对捐赠资金用于行政管理费用的不认可,获取的非定向资金较少,达不到OCAC评估体系C级及格标准:非定向资金总额占核心预算(主要是人工费用)76%—100%的水平,因此,影响组织在突发灾害情况下的组织资源能力。

缺少项目评估机制

第四,从执行能力和发展能力看,中国公益组织开展公益服务、制定项目规划、进行项目描述的能力较强,但是缺少项目需求评估、项目监督和结果评估机制。OCAC评估体系追求的卓越标准是:及时、高效、高质、持续性地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能力。我们目前能做到每个公益活动或项目有明确的定义和计划,且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但是,我们开展项目的流程,前期做不到所有项目均进行需求评估,尤其是做不到包含性别、年龄、族群、残疾群体细化定量的需求分析;项目的督导,虽然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基会都成立了监督委、聘请了社会监督巡视员开展督导工作,但主要还是依靠自设部门督导项目,做不到系统性的监督全部项目。项目评估工作开展只能达到B

级水准，只有少量项目聘请了社会第三方机构进行过评估，如彩票公益金项目、汶川地震公开招标项目，也没有出台评估政策，更没有设立专门的评估部门，工作人员也只有部分熟悉评估工作，熟练掌握评估技能、撰写评估报告的人员更少。

国际红十字组织拟定的标准，虽然称不上是普适价值，但包含国际大多数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中国红十字组织和中国公益组织按此标准比对，有中国的优势和特色，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但是，也要从中找到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不符的地方，认清中国公益组织提升能力、改革前行的正确方向。

（本文作者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302/147137.aspx>

[【返回目录】](#)

焦兴旭：也说公益领域的社区之争

大学时期参与过乐施会在甘肃康县的救灾活动。灾害评估入户调研，见到好几家荒废着沼气池。一问才知是一家国际 NGO 的沼气项目，只不过项目评估一过项目人员拍拍屁股走人，再也无人问津沼气池是否能用了。肯定的是项目评估报告里，必然不会再说后续进展。那康县扶贫办的人倒是热情，问还有没有什么好项目能引过来。毕竟能争取到外部资源，也算是一种成绩。这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甭管什么头顶光环的组织，到底还是得落到实事求是上来才算靠谱。

自己真正进入 NGO 行业中后，不靠谱的事情见得更多。例如常常听到“落地社区”这么这个词。原来 NGO 按照种种社区发展、赋权理论设计项目申请了资金，却不知道钱往哪花的情况。接了地气才发现社区里面各种体育、文艺队伍已然成了体系，民政教育卫生条线落到社区各自都有一摊事情，自己很难插足。让不让这些外来者进入社区，成了社区主任挺头疼的一事。虽然是好事，但一来这些人不熟悉情况处处要帮忙徒增工作，基层工作已经千针一线；再来谁知他们是不是和基层锻炼的挂职干部一样点个火自己先撤了，留下事情没人管。这边一犹豫，那边社区的官民之争就变成了 NGO 沙龙聚会的经常议题。似乎认为居民福祉如何增进不是问题，民望何处归属才是问题。

民望归属要在民间的背后，潜意识是这个行业的圈子意识：体制内为官，体制外为民。而对于民间来讲，体制内通常是颞颥无能，体制外的民间才是真心为居民分忧。体制内的各种社区服务，肯定是形式化的东西表演给领导看的。那些既有社区工作就是行政吸纳社会的体现，只有民间才能焕发社区本初的动力。那因体制内外形成的两种刻板印象，像贺兰山边的石头顽固的呆在很多人心

中。

体制内是有问题，不然顶层不会天天讲改革开放，低层天天讲社会创新。但说诸多问题的时候，一定仔细探索体制的问题与情况：社区到底有哪些力量，有哪些资源，小条块上之间相互有什么期待和矛盾，有哪些分歧又有哪些共识？民气如何各方民望又如何？NGO 自身是不是适合介入，要如何介入，介入之后除了服务还要做什么，是不是最终要离开，怎么离开？误解如何消除，问题怎么解决，福祉如何增进？如果只是从资源渠道的角度看着体制内力量进行社会服务了而我没有，对方做大做强而民间依然十分弱小。这样谈公益领域国进民退未免太过意气。

真要谈现在 NGO 背后的第三部门的发展，得回头看看我们的基本盘。我们国家注册 NGO 数量四十多万，每万人社会组织数量不到三个。往外看法国 110 个，日本 97 个、美国 57 个、新加坡 14.5 个，整体数量首先就不足。加之相互之间交流互动很少，缺乏基本共识。整合行业还处在一个襁褓期。要说发展，现在的行业该是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壮大自身，争取体制内的优秀官员、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有操守的媒体人士、有原则的学界老师，共同推动第三部门发展。而非固守体制内外官民之分，让圈子门户大过社会福祉，组织利益超过使命达成。

我认为 NGO 目前应该有的共识之一，是共同推动社会资本积累，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如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说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与合作性制度”。这其中当然包括体制内的各种力量。他们本来也该成为建设社会的一份子。“对于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经济进步，社会资本或许甚至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来源：公益慈善周刊博客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a7753e400101axmq.html

[【返回目录】](#)

◎行业动态

第五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揭晓 2012 年十大公益新闻事件

2013 年 2 月 28 日，第五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暨中国传媒领袖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会上揭晓了 2012 年十大公益新闻事件。本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将在以往的基础上创新形式，在发布年度十大公益新闻，颁发传媒公益推动力奖项的基础上，更多的提供经验分享和观点展示的平台。其中，NGO 于年初再度狙击归真堂上市入选。

以下为其实录：

主持人：下面有请顾勇华书记为我们揭晓 2012 年十大公益新闻事件。

顾勇华：2012 年度十大公益新闻事件为：

- 1、党的十八大对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为社会组织发展带来新机遇
- 2、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7 月份在深圳开幕，填补行业空白
- 3、《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于 1 月发布，强调公益组织能力和专业人才培养建设
- 4、艾滋病防治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
- 5、中国红十字会 12 月份启动转型改革，引入社会监督机制
- 6、中华儿慈会系列事件引发社会对基金会专业化关注
- 7、年初“小益益事件”折射家虐儿童救助困境
- 8、“7-21”特大暴雨中的爱心救援彰显社会正能量
- 9、红基会“5-12”灾后重建项目评估报告出炉，社会组织在灾后发挥的作用得到详细评估
- 10、NGO 于年初再度狙击归真堂上市，突显民间力量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来源：和讯网

地址：<http://news.hexun.com/2013-02-28/151576679.html>

[【返回目录】](#)

首届全国高校公益论坛暨公益未来项目启动

“首届全国高校公益论坛暨公益未来项目启动仪式”于 2 月 27 日上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中国公益研究院、公益时报共同主办，腾讯公益、雅虎公益、百度基金会、网易公益、新鲜传媒、凹凸人网、国际职业大学生发展联盟、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等机构支持。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江绍高副会长、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院长、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原教育部全国资助中心副主任马文华等领导、嘉宾及 120 多所高校公益社团负责人出席会议，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胜春受邀主持了整个活动。

高校公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势

王振耀院长主题演讲中说：“年轻的学生在相当程度上必然引领中国未来，这是由自然定律所决定的！高校公益如果能够将社会服务的使命与知识学习方式的调整较为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

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90 后的思想与理念与老一辈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虽然社会上不乏对

90后的批评，但90后的社会价值也渐渐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江绍高副会长在讲述为什么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关注高校大学生公益时说：“高校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朋友们有公益参与、组织的热情和经历，甚至有些同学将投身公益事业作为人生道路上的重要选择，他们认同公益精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组织参加公益活动，乐于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才学、技能、智慧和爱心。4年后，大学生步入工作岗位；10年后，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崭露头角；20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坚力量；30年后，他们中有的成为企业家、媒体精英、公益组织领袖亦或是普通的一份子，他们将主宰中国公益的未来”。

首个全方位支持大学生公益的平台建立

“公益未来”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倡导型公益项目，希望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支持高校公益社团发展，带动大学生参与公益，从而促进青年大学生了解公益慈善，培育现代公益理念，推动中国公益未来的发展。并通过校园社团公益活动的开展，培育出一批有理想、有爱心、有能力的栋梁之才。公益未来项目包括社团管理信息系统及交流展示平台、社团领袖培训班、高校公益论坛、社团公益基金、全国性项目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计划在五年的时间里支持全国1000个高校公益社团的发展，带动500万人次的大学生参与公益，培训2000名学生公益社袖。

一位参加活动的社团负责人表示：“公益社团是大学生参与公益的重要平台，每个大学生在校期间都会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但是我们学生公益社团缺乏专业的指导，对现代公益的理解不够，设计的公益项目都是简单的好人好事。即使有创造性的公益项目的想法，也因为缺少资金、资源的支持而作罢。有了公益未来项目的全方位支持，我们会做的更好”。

信息化平台支持公益社团高效、规范运行

公益未来项目建立了全国性的社团管理信息系统及交流展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高校公益社团的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社员管理、社团新闻都能实现信息化，强有力的支撑了社团的高效、规范运行，也为公益社团的交流以及外界了解高校公益社团建立了窗口。如果了解全国高校公益社团详细信息，可以登录网站<http://shetuan.fupin.org.cn>。

公益社团负责人集训营培育社团公益领袖

作为“公益未来”项目重要的内容，2月22日-27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公益未来—大学生公益社团领袖集训营”在京成功举办，全国120多所高校近130名精英学子参加活动。本次集训营邀请到了公益网校、公益时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WWF、新浪微公益、南都公益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等机构负责人和国际义工代表与营员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也开展了“如何做好一个社长”、“如何经营好一个社团”、“如何办好一个会议”、“领导力和团队培训”等专题培训。营员们还前往全国5A级公益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知名企业联想、腾讯、ABB公司以及创新工

场参观学习并交流。

社团公益基金支持“校园草根 NGO”

中国扶贫基金会从 2004 年开始向自强社提供公益基金的支持，截止 2012 年，累计资助公益社团 400 所次，公益项目 1293 个。公益未来项目启动后，社团公益基金将用于支持全国高校公益社团开展公益倡导、公益创新、助老儿童、环保、志愿服务、法律援助、扶贫、支教支农等公益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介绍：“公益社团希望拿到公益基金的支持，将通过项目申请、项目评审、项目实施、项目评估、项目总结等一系列流程，这个过程提高了公益社团的项目管理能力与水平，我们不仅要解决他们项目资金缺乏的问题，更看重能力的培养”。

全国性项目助力高校公益、社会公益

为了支持全国高校更好的开展公益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不断探索，开发组织了爱心宿舍、善行 100 等全国性高校公益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形成了一定社会影响力。中国扶贫基金会陈红涛副秘书长介绍说：“全国性公益项目将更具专业性，更有挑战性，规模化的行动可以整合社会各方的资源，也可以集中力量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或创新一些公益模式”。

首届高校公益论坛举行，呼吁社会支持大学生公益

会议同时举办了主题为“携手公益、共创未来”的论坛，来自企业、基金会、高校、研究机构的代表分享和探讨了高校公益的发展与合作。联想集团高级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傅琳分享了“联想青年公益创投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公众捐赠部副主任颜志涛分享了“善行 100 大学生志愿者筹款活动”、腾讯公益基金会高级经理孙懿分享了“腾讯公益——筑力计划·微爱项目”。人人公益理事会理事长黄辉、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安利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匡冀南与 3 名高校师生就高校公益困境、解决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来源：中国扶贫基金会

地址：

<http://www.cfpa.org.cn/newDetail.action?articleId=8c0bccd3e8074591a23d49d8374d42ff&p=1c626f8195104222b17f2d4505982ba5>

[【返回目录】](#)

中国慈善捐赠进入百亿级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发布的《2012 中国捐赠百杰榜》称，2012 年榜单入榜人员总计捐赠 649 亿元，同比增长 4 倍以上。其中，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和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文彪分别以 500 亿元、100 亿元的承诺捐赠位列榜单第一、第二名。

捐赠总额出现巨量增长，巨额捐赠成主要推动力。2012 年中国捐赠百杰榜入榜人员的捐赠总额增长到了 649 亿元，是 2011 年捐赠总额 121 亿元的 5 倍以上。2012 年与 2011 年捐赠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百亿元的巨额捐赠上。两笔百亿元捐赠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国内大额捐赠的整体情况。

2012 年，数位大慈善家表态要在未来捐出数以百亿计的财产，中国慈善捐赠进入百亿时代。2012 年 6 月，王文彪在“里约 20”会议上宣布将在未来 10 年向亿利公益基金会投入 100 亿元；7 月，黄怒波承诺未来 10 年将向北京大学捐赠 500 亿元。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百亿元以上的捐赠承诺。

榜首黄怒波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家大额捐赠渐成常态，凝聚“财富向善”的正能量，将引领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慈善资本时代，推动中国慈善接轨金融、法治、国际体系，推进现代慈善体系的构筑和体量的壮大，为中国慈善注入变革的力量。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慈善在中国并没有因为个人原因陷入低谷，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百亿元以上的捐赠承诺，实现了中国大额捐赠从 10 亿元以上到百亿元以上的质的飞跃，意味着中国慈善迎来了重大阶段性转型，将对中国现代慈善体系形成和社会转型进程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他说，透过百杰看到中国慈善界的重大转型已经到来了，中国的慈善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创业。

据了解，在 2012 年的大额捐赠中，教育依旧是最为主要的投入领域。以兴办学校、改善校舍条件、设立奖学金等为目的的捐赠超过了 520 亿元，占总额的 80% 左右；以改善环境、保护生态为目的的环保领域捐赠达到 100 亿元，占 15%。其中，高校接收的捐赠额度为 514 亿元，成为大额捐赠主要接收方。

榜单显示，广东与北京分居捐赠人数与捐赠总额首位。2012 年，广东涌现了全国最多的大额捐赠者，以 31 位入榜者位居省级行政区入榜人数第一。而在捐赠额度方面，北京贡献超过 503 亿元善款，超过了 2011 年全国大额捐赠总和。房地产为捐赠金额和入榜人数贡献率最高行业。在上榜的捐赠者中，房地产行业个人及企业捐赠者人数为 31 人，捐赠额度 515 亿元，位居所有行业第一，贡献人数接近 1/3。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地址：<http://news.eastday.com/gd2008/f/2013/0226/635717548.html>

[【返回目录】](#)

中国红十字会酝酿财务制度改革

中国红十字会正在酝酿财务制度和信息披露系统改革。前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京举行研讨班，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红十字会社监委委员刘姝威为中国红会内部人士做了辅导报告。刘姝威建议，中国红会使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并发挥网银募捐作用及时告知捐赠人“善款”的到账和使用情况。

财务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红会计划于 2013 年全面启动的综合改革重要内容之一。今年，中国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公开阐述 2013 年工作任务时表示，打造公开透明的社会捐赠信息平台，还需匹配红十字会内部财务制度的改革。

红会目前使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刘姝威认为，中国红十字会要想做到公开透明，必须改革财务制度。第一步，是使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以确保在财务报表上反映捐赠款项接受和使用的基本情况。

然而，在调研中发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部分地方红会一直使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无法满足捐赠人起码的要求，更不可能披露每笔捐赠款项明细。

由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是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红总会及其下属机构使用哪种会计制度必须由财政部决定。刘姝威建议，财政部应批准中国红十字会使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网银捐款后可及时获知善款流向

从募捐渠道上，刘姝威则指出，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大部分捐赠人都能够使用网上银行。如果网上银行成为捐赠善款的主要渠道，“捐赠人会比较容易知晓和监督善款到账情况”。

目前，网银捐款仅占红会接受社会捐赠总收入的 20% 左右。刘姝威认为，还有很大拓展空间，“如果改革措施得当，网银捐款的比例可以达到 80% 左右。”应该让网上银行成为主要捐款渠道，短信和电子邮件成为及时告知捐赠人捐赠款项收支的主要工具。

刘姝威同时坦言，进行制度改革绝非红十字会一家能够完成的，至少财政部、银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政府部门协调配合才能完成。

来源：新京报

地址：<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3/02/24/249509.html>

[【返回目录】](#)

乐施会“品牌背后”全球倡导活动在中国启动

乐施会“品牌背后”全球倡导活动在中国启动发布《品牌背后：粮食公正与十大食品与饮料公司》报告 2013年2月26日，国际发展与救援机构乐施会在全球发起“品牌背后”倡导活动，中国启动仪式同步在北京举行，发布题为《品牌背后：粮食公正与十大食品与饮料公司》的报告。在启动仪式上，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中国代表 Percy W. Misika 到场致辞，来自河南省开封市兰考胡寨合作社社长的农民王继伟，社会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吴晨，专栏作家娜斯和“田树的厨房”创始人田树在发布会现场开展对话，挖掘品牌背后的故事。

为了更贴近消费者，发布会在北京凤凰汇购物中心举行。乐施会政策倡导部总监孙学兵在致辞中说：“我们有充足的资源和技术生产出地球人足够食用的粮食，但是现实是世界上每八个人当中就在挨饿，而且大多数人正是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为什么这样，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人来思考。是不是说我们粮食生产体系出现问题还是在其他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呢？乐施会希望通过努力，希望通过跟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携手推进这种改变。”

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代表 Percy W. Misika 先生表示：“今天，乐施会发起了这一全新的活动，关注全球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公司的实践。在启动仪式后，我们希望能在全球和中国看到行动，来推动大食品公司保护为他们生产食物的人们的权利。”

启动仪式上设置了从超市，供应链到农田的互动场景，来自农村的王继伟，研究供应链的吴晨和经常与食物接触的田树，以及熟悉中西消费文化的娜斯，分别代表食物体系中的农业，供应链和消费环节进行了以“品牌背后的故事”为主题的对谈。

田树经营着自家的私家厨房，还经常作为嘉宾出现在电视的美食节目上，他也常常在地头田间亲自采购食材，他说：“我觉得农民对食材卖给我不仅是一种商品，而是当做孩子一样，他们很热情，我去买的时候，如果他家当季的生产不好，他会告诉你谁家种的比我的更好。我觉得农民对食材相对来讲会非常愿意去负责，但是恰恰有一些原料的或者供应商压低价格导致最好的食材到不了我们手里。”

作为主厨，他说：“用心种出来的，少加化肥，健康有机的就是最好的食物。”

王继伟平日种植苦瓜和黄瓜，他说：“其实农民也不愿意喷农药，是消费者喜欢光鲜，个头大，没有虫眼的蔬菜，我们农民根据这个需求才喷农药，才去用化肥。跟咱们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吴晨对农业供应链有着多年的研究，她介绍说：“也许我们消费者会觉得我们食品价格，从每天在超市里面买到薯片，或者从农贸市场买生鲜蔬菜价格，都一直在上涨。但是在我们的调研当中发现，

大的食品企业会向中国农民直接采购，比如说采购你的番茄做蕃茄酱，这个价格非常低，可能十几年或者几年都保持同样的水平。大家可以想象价格非常低的时候，农民能够得到什么，也许什么也得不到。”

娜斯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也非常了解西方国家的消费文化，提及中国消费文化的发展，她评价说：“更负责任的消费文化，我觉得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公益组织来做一些事，帮助消费者和农户相互了解。二是媒体要宣传这些理念，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要到一个特别高档的超市买东西，才是更好的产品。”

娜斯说：“作为消费者，从自己的需求，就是想吃到更健康的食品。如果能让他意识到，其实真正生产这个产品的人，挣的特别少，就是很重要的信息。比如，美国有一个冰激淋品牌，他说我挣多少钱，百分之多少回馈给什么，你这种东西让消费者知道，同样两个产品付一样价钱，这个给生产者，劳动者更高的利益，而这个是极低的压榨来的，我相信多数人会选择给生产者多的那个产品。”

乐施会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最新报告《品牌背后：粮食公正与十大食品与饮料公司》指出，全球十大食品巨头的社会和环境政策已然不合时宜，需要做出重大变革。

该报告对全球十大食品公司在妇女、小农户、农场工人、水、土地、气候变化及透明度七大领域公开发布的公司政策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有些公司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对其业务的重要性，并做出了值得称赞的重大承诺。但十大食品巨头中没有一家迅速行动起来改变这个拥有100年历史的产业，这一产业依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大规模生产拥有高额利润的产品，其社会和环境代价之高让人无法接受。所有公司的总分都差强人意。总体而言，十大公司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这十大食品公司分别是：英国联合食品、可口可乐、达能、通用磨坊、家乐氏、玛氏食品、Mondelēz(前称卡夫食品)、雀巢、百事及联合利华。

乐施会希望与全球消费者携起手来，通过改变十大食品公司行为，推动整个食品产业良性发展，从而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和消费者最终受益，同时推动企业、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启动仪式最后，一位小小消费者代表，5岁的高麓涵举着一个印有“食品大牌听我的”字样的绿色喇叭，说出了她的心愿：“我最喜欢吃巧克力豆，我希望生产巧克力豆的公司对农民伯伯好一些。”

孙学兵说：“没有哪个品牌大到不愿意听取消费者意见的程度。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敦促食品巨头做正确的事，它们除了听从没有其它选择。”

活动现场，乐施会公布了“品牌背后”网络平台：<http://behindthebrands.org/zh-cn>，消费者可以通过登陆这个平台了解这些公司的相关信息。乐施会同时鼓励消费者主动向食物销售者、食品公司和零售商询问，了解食物由谁、在哪里以及怎样生产的，是否照顾到了供应链末端生产粮食的农民的利益，是否做到了真正的粮食公正。

“品牌背后”活动同时在17个以上的国家启动，包括中国、美国、墨西哥、巴西及一些欧洲国家。“品牌背后”倡导活动是乐施会“GROW 粮食公正倡导活动”的一部分，后者旨在推动一个公平合理的食物体系，能够在每天给每个人，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足够的粮食。

关于乐施会

乐施会是独立的国际发展及人道救援机构，致力于消除贫穷及导致贫穷的不公平状况。乐施会在世界各地以多元方法解决贫穷问题，包括推行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人道救援及灾害防治工作、本土及国际政策倡导等。香港乐施会于1976年成立以来，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工作。香港乐施会是乐施会国际联会的创会成员，乐施会国际联会的17个成员机构在全球94个国家开展工作。

来源：乐施会

地址：<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86311>

[【返回目录】](#)

广州部分非营利社会组织免税困难 地税局回应申请有三注意

本报曾报道部分非营利社会组织面临申请免税困难的情况。昨日，广州市地税局为非营利组织顺利申请免税资格明晰了三个注意点。市级、区级非营利组织如想申请免税资格认定，应按规定时间提出申请，其中未取得免税资格又想继续申请的，应在次年1月1日~2月28日向受理机关提出申请；免税资格5年期满的，应在期满前3个月内向受理机关提出复审申请。

注意点一：

免税资格由三部门共同认定

市地税介绍，目前市内有部分非营利组织对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了解，对申请的流程也不熟悉，常常误认为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相关证照就可以享受免税资格。而实际上，企业只有通过了财政、国税、地税三部门的认定，才具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注意点二：

免税条件须同时满足

市地税还指出，在实际操作中需要符合《财税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全部条件才可顺利获得免税资格申请。而部分民办非企业的认定申请未被通过，大多是因为忽略了这个因素。

注意点三：

符合条件的收入才可免税

一些在成功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在年终结算时突然被税务机关要求补缴相关税款，便对此不解：不是已经是免税资格了吗，为何还要交税？

市地税表示，并不是获得免税资格就能所有收入都免税。因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只有符合文中规定的捐赠、政府补助、会费、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等 5 项收入才免税，其他收入仍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即使企业通过了免税资格认定，也只有符合条件的那部分收入才可免税。因此，已获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仍应依法办理企业所得税申报手续，分别列明免税收入和应纳税收入等信息。

来源：广州日报

地址：<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372&fromuid=1> [【返回目录】](#)

桃源居移交逾亿元社区公益资产——开创国内政、企、社顺利对接社区治理新模式

楼盘与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共同开创国内社区治理全新模式。昨日下午，在深圳第七届社区邻里节暨桃源居社区第十一届文化艺术节上，桃源居开发商将经审计达 1.05 亿元的社区公益资产全部移交给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世平，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市委副书记戴北方，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思平等人出席了活动。

据悉，桃源居社区公益中心将接受政府委托代管运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公益发展模式。这是国内首例政府、企业、社区实现顺利对接的社区治理模式。

2008 年，桃源居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捐资 1 亿元设立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简称“桃基金会”），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专责培育社区公益组织的企业型非公募基金会。此后，桃源居在国内第一个通过转让股权给社区公益中心，把私有的物管公司改制为社会型企业。目前，桃源居已建成体育俱乐部、居家养老中心等十大公益组织，形成针对社区需求、多位一体的公益集团。

在公益组织创设过程中，历经各种风波，开发商与合作方、业主与物管、业主之间纠纷磨合，

各层级政府先后下发 57 份文件，桃源居的社区公益集团才得以成型。

在移交之后，如何让公益资产实现可持续发展？据社区综合党委书记、工作站站长杨贤辉介绍，计划尽快将社区教育中心提升为社区教育学院，社区教育基金会的资本将从现在 1000 万元争取在 5 年内达到 5000 万元；在条件具备时率先在全国成立社区银行，以实现同富裕工程；在现在社区已有的居家养老的基础上，建立日间老人照料中心，并建设老年公寓，健全社区养老机制。

来源：深圳特区报

地址：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3-02/26/content_2386049.htm

[【返回目录】](#)

深圳民管局设专案组调查深圳狮子会菩提服务队

“深圳狮子会菩提服务队被指以公益名义传销吸金”经南都报道之后引起各界关注。深圳市菩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菩提传播公司）又有学员爆料揭露善款流向存在问题。对此，该公司创始人、首席导师裴玉明表态说要改正，但仍认为活动初衷、效果就是在做公益，至于手段是否合法正当，是自己没意识。

昨日，深圳狮子会主管单位深圳市残联表示要严查，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成立专案组调查。深圳狮子会表示，如查实菩提服务队队长裴玉明恶意利用深圳狮子会，将取消该服务队并除名参与的会员。昨晚 8 时 30 分，南都记者发现菩提传播公司网站（<http://www.ptmj.cn/>）关闭。

善款要求转进公司账户

昨日，裴玉明说没有用过善款一分钱。对此，该服务队内部人士张凡（化名）说很可笑：“别的不说，做活动时裴玉明不会跟我们一起坐大巴，他和总教练赵伟华坐飞机，机票钱都是我们筹集的善款中出。”

对此，裴玉明说自己是开车去广西，又说坐飞机出行是“对方请的”。在善款流向问题上，始终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凭证。

Ta016 团队三阶学员昨日联系南都记者爆料称，裴玉明要求把感召的善款，除花费外全部转到菩提传播公司账户里。“到广西做活动花了 9 万多元，裴玉明的意思是想办法再凑齐 15 万元，再去一次广西，所以要求把剩下 5 万多元转到菩提传播公司账户。”1 月 20 日感恩答谢会上，裴玉明说广西之行“圆满结束”，前天改口说广西活动没结束，要再去一次。

对于将剩下善款打到自己名下公司的指责，裴玉明回应没有要求过，“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还

要做活动，钱不够，我可以想办法出一点。”

“我们知道媒体介入了，讨论后决定不给菩提传播公司，这些钱将会按当初活动狮子会复函内容买东西给学校，就是再买10台电脑，价值2万多元书籍。”由于不信任菩提传播公司，T a016团队拒绝裴玉明的转账要求。

裴玉明辩称没从中获利

“现在我变成受害者。”昨日下午，裴玉明现身诉苦说，自己好心做好事，没有获得肯定，受了委屈，“我免费做公益，让他人懂得感恩、团结和有人生目标，没有从中获利。我是穷孩子出身，经历打工、创业取得一定成绩，发现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上进心，所以决定把自己的经历、感悟分享出来，让人少走弯路。”

“以感召手法施压收费站免费通行，跪拜、集体哭泣等仪式性很强的情景出现在公益活动现场是否存在问题？”

“我去广西讲课不是商业行为，没收他们钱，还要自己出。让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学会感恩，他们觉得有用，还有很多感谢信。”裴玉明说，初衷、效果都是好的。跪拜、集体哭泣等仪式是为了他们学会感恩。仪式性很强的活动常运用在商业培训，因此公益活动中也能运用。感召收费站免费通行是第一次。但内部人士表示，感召收费站免费通行是心连心活动的“例牌菜”。

据了解，2004年公布执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件》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政府部门以10%作为红线标准监督公益机构，公益机构以10%作为成本上线来约束自己。菩提服务队在广西做公益活动成本远高于10%，不足7%的善款用来资助，其他经费不知去向。对此，裴玉明表示，不知道公益活动对善款运用要求，“我们改正，不合适做法不会出现，甚至不能再提。”

回应

如查实菩提服务队违纪将取消服务队除名会员

1

市残联：详细调查严肃处理

昨日，深圳狮子会主管单位深圳市残联表示将详细调查，若菩提服务队的活动违法违纪，将严肃处理。“市残联、市民政局一起召集深圳狮子会汇报情况，要求狮子会尽快调查清楚，必须书面上报主管部门。”昨日下午，市残联副理事长黄纯斌表示，支持媒体监督，待调查结果出来立即公布，给公众一个交待。

2

民管局：已对事件初步调查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表示，已经成立专案组调查，根据结果依法严肃处理，及时向社会通报，同时加强公益组织制度建设和信息公开。

该局局长马宏介绍，专案组昨日与深圳狮子会业务主管单位市残联一起约谈狮子会总监、第一副总监、秘书长、纠察长等，对事件进行初步调查，“将配合市残联查实报道所反映的问题，查明狮子会其他服务队有无类似情况。”

3

狮子会：若违反章程将除名

“如果查实裴玉明恶意用深圳狮子会名义违反章程的事，取消菩提服务队，除名参与其中的会员。”深圳狮子会纠察长张红象说，“我们严格管理，就连对外名称都有规范，像‘国际狮子会深圳菩提狮子分会’的提法是不允许存在，发现一个处置一个。”

深圳狮子会第13分区主席刘明介绍，昨日早上在会里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调查了解情况，下午与主管单位、民政部门汇报，问题比较严重，造成不良影响，承诺一周内要把事实调查清楚，“希望媒体继续跟进，查个水落石出。”

“菩提服务队做公益活动透视着对公益环境的破坏，裴玉明对公益有误读、亵渎，深圳狮子会对会员没有教育、培训过程吗？”

“我们在管理上下了大功夫，下重资成立讲师团，还有一个五年以上狮友（狮子会成员相互间的称呼）或优秀狮友组成的导师团，对成员有全面教育、培训，裴玉明狮龄（加入狮子会年数）也长，接受过相应教育。”刘明说，他不认为裴玉明不理解什么是公益。

说法

要给捐款人一个交待

“不出问题的组织，是没有活力的。”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表示，菩提服务队以感召手段吸收人员、筹集资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销手法，从企业出来的人也喜欢用类似感召方法动员他人做事，慈善公益机构有爱心传递的传统，出现问题要及时改正，服务队有问题，并不意味着狮子会也有问题，“没有没收你身份证，没有压迫你不能退出，还没有坏到（传销）那种程度。”

朱健刚对狮子会有专门研究，认为狮子会作为全球最大服务组织，有着比较健全的制度、有效的监控机制，为确保善款全部投入受益对象，狮子会成员做活动均要求自理费用，每年统一财务审核对外公布，“国际狮子会公信力在全球是最高的，但不能保证每个服务队做到非常透明，一个组织也是凡人，不能以圣人标准要求公益组织，也不能因为个别服务队的问题否定狮子会。”

“现在要追问钱哪里去了，要给捐款人一个交待。”朱健刚说，自己关心善款的去向，以公益

名义筹的善款应该用到实处。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 http://epaper.oeeee.com/H/html/2013-03/01/content_1812656.htm

[【返回目录】](#)

民间收养“收编”之惑

“发生事故后，害怕承担责任，把孩子简单送回福利院，不考虑家庭寄养、收养的国际惯例，也不管福利院是否有能力提供救助，这是继兰考悲剧中政府责任缺失后的又一种扭曲。”

——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2月24日，中国的元宵节。作为山东一家民间孤残病儿救助组织的负责人，王新玮赶到河北燕郊的分支机构和孩子们一起做团契、吃元宵。第二天，她再回到北京的美国使馆去给机构被领养的孩子办签证。

萦绕在她心头挥之不去的担忧最终还是来了——机构的30多个孩子，要被送回他们原来的福利院，他们大多来自河南。“元宵节过完，就要开始送孩子了。”

她最担心还不满3岁的明明的未来。这个孩子患有脑瘫、癫痫，除了眼睛看不见，还有肠道出血。从被路人捡来送进这家机构之后，他每个月要进一次ICU病房，每次要花去两万到三万的医药费，机构至今已为他花去了至少10万。

“这么脆弱的小生命，能否经受得起路上的颠簸？回到福利院，政府是否愿意花费这么多钱去救治？”王新玮所在的机构并非孤案，在河南兰考袁厉害事件之后，席卷孤残弃儿民间救助的大风正在袭来。

待遣送的孩子

1月6日，兰考悲剧后两天，民政部就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全国大排查，要求“坚决消除这类机构的安全隐患，对不具备养育条件和安全保障的，抓紧将孤儿接收并集中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对于符合收养条件且有收养意愿的个人，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手续；对于借收留孤儿募捐牟利或操纵孤儿从事违法活动的，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内蒙古某福利院寄养在北京家庭里的六七个孩子被强制收回，其中有些孩子已经在寄养家庭生活了近两年。一个寄养家庭的母亲和孩子分别时，两边都痛哭失声、伤心欲绝。

在民间组织西安海星寄养之家，30多个残疾儿童正待被遣送回各地的福利院。这家有国际背景的救助机构随之陷入困境。

1月8日，山东省民政厅同时还下发了《关于对各类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开展安全管理大检查的紧急通知》。其中，“对未经民政部门批准、个人或社会组织自行举办的孤儿收养机构，要坚决依法予以取缔，并将孤儿妥善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

总部位于山东莒南县的民间组织觅非播舍之家，在青岛、临沂、河南汝州和河北燕郊各有救助站，从2009年以来与各地福利院合作救助了大量重症孤残病儿童。莒南县民政局1月的排查认为，该组织不符合注册条件，孩子应送回外省福利院，本地的则由当地福利院接收。“过去不给我们注册，这次又说我们不符合注册条件，但排查又说没问题，民政局并没有给出理由。”王新玮说，这30多个孩子寄养在山东不同地方的救助站，都是患脑瘫、癫痫、失明、先天性心脏病、肌无力等重度残疾的孩子，“必须找到可以安置他们的地方，我们才会陆续送回”。

在北京昌平区的天使之家孤儿寄养点，负责人邓志新也陷入了两难境地。寄养了40多名外地福利院孤残病儿的这家“合法机构”此时正待搬迁，“兰考大火发生后，顺义区的新房东告诉我，区、镇政府要求他和我们解除合约，旧合同又不知还能否续约”，邓志新说，“我们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

不愿回去的福利院

在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来自外地某福利院的马非、马动、国宴、武腾已经和机构负责人孟维娜组成的“家”一起生活了两年。这4名有脑瘫等中度或轻度病患的孤儿都已经20岁以上，在北京和天津慧灵接受过基本的技能培训。

2008年，某福利院寄养在天津慧灵的12岁孩子融融，被外出买菜的“家庭妈妈”独自锁在家里，玩弄打火机引发火灾后窒息死亡。当时也在天津慧灵的马非等孤儿全部被福利院接回。直到2011年，马非等4人才得以回到北京慧灵的社区。

“我反对让孩子们从民间机构和寄养家庭里回到福利院！”马非回想起自己因为一场大火而回到福利院的3年生活，“不能出大门，每天重复单调的生活，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比起福利院的‘圈养’，慧灵更为人着想，我在社区里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属于人的生活”。

26岁的国宴回忆，“智力或身体残疾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是不能外出的，也无法接受正规教育。14岁以上的会送入政府办的社会福利院，那里的条件很差，工作人员的素质也很不好，整天上班手里都会拿个棍棒，犯了一点错的养员就会被使用暴力”！相对这些“为了赚钱而‘奉献爱心’的职员，慧灵给予的爱，是可以超越金钱的”。

2009年马非见到了当时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我想对他说，全中国的孤儿都应该从小领养寄养到人家去，建立亲密的家人关系，有正常人的生活方式，不要再建

福利院了，也不要再建孤儿村了！”

北京天使之家的邓志新走访过全国各地很多家福利院，“民间组织把孤儿接出来了，除了找到收养家庭一般很少送回去，因为大多数福利院的条件都很差。而从全国来看，硬件和服务上各地福利院的差异也很大”。

她走访的呼和浩特、济南、西安、天津等省立城市福利院“条件都较好”，山西、安徽、四川的“硬件不好，但工作人员理念和服务好”，“比较差的是河南”。

2011 年她走访河南某市福利院，一个屋子 20 多张小床，一个屋子站一个保育员，“棉被很新，看上去很舒服，但一打开被子就一股恶臭，手一摸婴儿睡的褥子都湿透了，尿不湿都不换的，小婴儿们就睡在冰冷的褥子上，手脚冰凉”。“问保育员这些孩子都是什么病？什么时候来的？保育员都答不上来。”

当时邓志新发现了几个急需手术的孩子，想签协议带回北京，福利院没有同意。到郑州请河南省民政厅出面协调，福利院才同意，“但赶回当地时，一个肛门闭锁的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送到当地医院都没有抢救回来”。

倒退的民间救助

近 5 年来，弃婴现象大为减少，而弃婴中残疾孩子的比例持续上升，“现在各地福利院里收养的孩子，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残疾孩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透露。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陆续出现的个人和民间救助机构，像石头缝里挣扎的苗儿一样，形成一个民间救济的松散网络，也开始推动各地福利院给孤残病儿提供更专业的救助，这些个人和机构大多无法获得合法身份，也带有一定国际组织或宗教人士的背景。

1 月，河南平顶山“爱之家”孤儿寄养点的两名出生刚 10 天和两个月的弃婴被送到北京，天使之家的工作人员到北京西站接回婴儿后，商丘福利院快递孤儿证明过来，天使之家将医疗救助协议快递过去，五六个月后可以给这两名唇腭裂和小耳畸形的弃婴安排医院手术。

从 2007 年起，身为医院护士的“爱之家”负责人朱智红推动平顶山、驻马店、南阳等周边县市条件差的福利院主动合作，孩子们被“爱之家”送到北京和上海对接不同病种的权威医院和支持的民间组织。“治愈的孩子可以进入福利院的收养程序，减轻福利院负担，所以恶性肿瘤、痴呆傻、重度脑残之类没有多少家庭愿意收养的孩子往往很难得到这种专业救助。”朱智红说。

在北京天使之家，现有的 42 个病残孩子都来自外地的福利院，其中 60%来自河南。“我们帮这些福利院推荐涉外收养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们主动和我们合作。”邓志新说。来自河南鹤壁的 3 岁的鹤鹤，在天使之家的救助下做完了先天性膀胱外翻的手术，康复一年多之后即将进入美国的收养家庭。

兰考事故之后的排查，多少都对山东觅非播舍、河南“爱之家”和北京天使之家等民间组织的救助工作带来影响。“发生事故后，害怕承担责任，把孩子简单送回福利院，不考虑家庭寄养、收养的国际惯例，也不管福利院是否有能力提供救助，这是继兰考悲剧中政府责任缺失后的又一种扭曲。”2010年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赴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的王振耀对此不无忧虑。

他感叹，北京、上海、广州都有14岁之后继续集中到第二福利院的孩子，现在各地福利院又把残疾孩子收回集中养育，退出家庭寄养，“会造成什么景象？”

尴尬的家庭寄养

在山西原平市楼板寨乡西庄，陈天文和郭改然夫妇的寄养家庭，1月15日，当地民政局副局长周靖芳和两个下属在排查后带走了几个孩子。周靖芳透露，原平目前共有66名弃婴，因为当地没有福利院，他们分布在45户家庭寄养，户口统一挂靠在当地的一家敬老院。

而据报道，22年间，陈天文代养的40个孩子中有22个已经死亡，其中最大的有13岁，最小的才1个月。郭改然说，有些孩子一送来就病得很严重，当时条件有限，孩子只能等死。“孩子死后，我们就给民政局打个电话说一声。”

2004年民政部推出的《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家庭寄养服务机构，分儿童福利机构和专门从事家庭寄养服务机构两类，它们可以通过与国(境)内外社会组织合作、通过接受社会捐赠获得资助”。

“这是国际组织在中国推动家庭寄养的成果，民间组织参与救助有了一定的依据，而在此之前，家庭寄养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试点。”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执行主任张雯说。

1994年北京市民政部门开始试点将孤残儿童大量寄养在大兴和延庆的农村家庭，政府给予一定补助。到2000年民政部向全国推广这个“北京模式”。2006年经历了1300多名福利院的孩子寄养在大兴和延庆的高峰之后，2011年称将新建两所儿童福利院，并陆续将800多名寄养在农村家庭的孤残儿童收回。

“北京模式”难以推广，“主要还在于农村家庭寄养生活环境、教育和医疗条件都较差，缺乏评估和监管，此外孩子病残状况较重，寄养难以转为收养也是原因”。媒体报道称。

北京一位民间组织负责人透露，自2006年从中央到地方投入60亿资金的“蓝天计划”(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在大中城市新建、改建和扩建一批儿童福利机构)启动后，北京的福利院就不再提家庭寄养了。各地民政部门也开始转入申请“蓝天计划”资金投入福利院建设的轨道，家庭寄养模式被冷落。

而针对此次兰考大火事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再次表示，十二五

期间，民政部和发改委将在全国 50 万人口以上的 500 多个县统一建立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

夹缝中的民间收养

相对于那些进入福利院系统的孩子，没能进入这个系统的孩子则沦为不被承认的、没有监护人的孩子，和袁厉害“非法收养”的孩子一样。

在河北邢台宁晋县，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边村乡天主教会的门前共收留过 500 多名弃婴，修女王清芬创办“黎明之家”专司救助之后，随着残疾弃婴的增多，2006 年又成立了康复中心。

目前教会集体户口上留下来的 140 多个孩子，有一半重症孩子留在“黎明之家”，一半病患较轻的送到教会寄养家庭，其中有 40 多个寄养家庭希望能够收养孩子。自 1997-1998 年民政局、宗教局给“黎明之家”的孩子办了一批收养证之后，“两局更换了领导，其余孩子的收养证就再没办下来”。到 2007-2008 年，王清芬彻底死心了。

她最后一次带着一对 50 多岁、无子的夫妇去县民政局询问收养程序，县民政局答复要请示市民政局，并称她“不具备送养人资格”。

这个“送养人资格”，指的是公安部门出具的弃婴“捡拾证明”，它需要在弃婴被发现报案后出具，送养人也相应由接收弃婴的福利院和民政部门来承担。“这么多年来民政部门对我们的孩子不管不问，我们收到弃婴打 110，他们既不出警也不给我们开捡拾证明。”王清芬说。

这些一开始既没有收养证也上不了户口的孩子，没有低保、医保，无法上学，也无法向基金会提交孤儿证明以申请手术资金，“河北四五家民间机构都是这样”，王清芬质问，“这些孩子的救护，到底是谁的责任？”

曾经主政儿童福利的王振耀明白这个领域政策的荒诞，“不扔，政府不救；扔还要扔在福利院的门口；扔在袁厉害的门口，政府也可以不救”，他反问，“这不就变成一个鼓励扔孩子的政策了吗？而那些扔在袁厉害家门口的孩子，政府的责任又哪去了？”

而对那些进入福利院的弃婴，他们进入国内收养家庭的道路也并不通畅。“国内家庭收养的大门没有真正打开过”，儿童希望的负责人张雯指出，“这是个执行团队缺失、收养法多年来难以施行的领域”。想要收养孩子的家庭，常常通过找关系、花钱办各种证件的办法来打通关节。

儿童希望曾有一名志愿者希望收养机构救助的一名下肢瘫痪的孤儿，她已经有一个亲生孩子，去北京市西城区一街道办开“婚姻与子女状况证明”，第一步就被挡在门外。虽然《收养法》明确规定，“从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但实际操作中远非如此。

“北京市民政局就有个规定，夫妇无子，可以领养全国福利院的一个孩子；有一个孩子的，只能领养北京市福利院的一个孩子”，邓志新说，“这意味着北京市居民的领养不能占用计划生育外的

户口。”

2000年开始，王清芬每到年节就县、乡、村一趟趟地跑政府，要孤儿的慰问金，“不为那点钱，就为让他们明白这其实是政府责任”！最开始她去县里，县领导会指责她，“你养了一群社会的垃圾”；甚至乡领导也说她“是在给政府惹麻烦、背包袱”。直到2003年县里给机构剩下的孩子上了集体户口，2008年奥运会之后又办理了低保和合作医疗，年节时也会主动到“黎明之家”送粮油了。

但孩子们的收养证和“黎明之家”的注册仍遥遥无期。2003年到2009年，王清芬多次提交注册申请未果。和福利院有密切合作的河南平顶山“爱之家”的命运也一样，民政部门不给予注册的理由是，“国家不允许民间办孤儿院，担心贩卖孩子和器官”。这类民间机构因此一直生长在“非法筹款和救助”的夹缝里。

儿童福利制度是关键

1992年《收养法》颁布之后，中国的福利院开始出现涉外收养，“到2000年达到一年近一万人”的顶峰，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残疾孩子，一半上都送去了美国”，曾经在美国做国际领养社工的张雯介绍说。

领养协议中规定领养家庭应该给福利院一笔捐赠资金，一个孩子的支付金额大概相当于该家庭一个月的工资，“如果是涉外家庭，2000年左右是3000美金；到2005年左右提高到3.5万元人民币”。张雯说，“这大大刺激了民政部到地方福利院的涉外收养倾向”。“国内家庭大多不愿收养残疾孩子，收养之后各种退回孩子的情况，也加重了这种倾向的形成。”邓志新说。

2008年王振耀组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上任司长，一进入儿童福利的领域竟然发现“中央财政对这个部分一直没有任何投入，只有各省投入一部分资金把福利院的孩子纳入低保”，他当时就火了，把标准提高，提请中央财政把儿童福利津贴纳入预算。到2010年他卸任之后，社会散居孤儿和失去父母、主要照料者缺失的儿童，才得到了大约每月1000元的儿童福利津贴。

“对涉外收养的推崇，获取捐赠资金弥补财政投入不足，也成为2010年以前儿童福利领域体制扭曲的一个部分。”王振耀说。张雯透露，近几年来，涉外收养人数已开始直线下降，源于福利院的弃婴少了，健康的就更少，送到国外去的孩子一年3000例都不到。

而从2010年底，民政部中国收养中心召开了《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修订座谈会，专题研究《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条例(草案)》和《中国公民收养子女家庭评估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会上着重讨论了“依法安置弃婴、根除私自收养”和“建立收养家庭评估制度及收养后跟踪回访制度”等问题。去年底，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透出消息称，民政部正积极推动制定《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条例》。

“现在这种指望通过收养法来解决孤残儿童问题的思路，本身就是错的，延续下去问题只会越

来越严重。”王振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快进入儿童福利法和配套行政系统的讨论里去，孤残儿童不能谁愿意收养就收养，要在儿童福利法中明确政府责任，收养家庭给予补贴。”

在美国等建立了现代儿童观的西方发达国家，把儿童视为拥有独立权利的群体，国家在其失依时提供托底监护早已成为全民共识。“这个系统有完善的儿童福利法和儿童与家庭事务部等行政机构来支撑。”童小军说。

而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孤儿院里的侵害、虐待案例就层出不穷，并通过“依恋学”的实验得出“家庭化养育”的科学结论，由此启动去机构化的进程，到五六十年代，美国就从孤儿院等机构养育全面转为家庭寄养和收养。

张雯介绍，当美国家庭的虐待、忽视儿童的状况发生时，老师、医生、社工等与孩子接触密切的人群有一个强制通报的制度，儿童与家庭服务部的社工与警察介入，将孩子送入经过专业培训的寄养家庭，如果法院最终裁定剥夺原生家庭的监护权，孩子就通过领养组织进入领养家庭。孩子在寄养家庭里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两年。

上世纪70年代，国际领养界的专业人士曾共同达成了一项“海牙公约”，在防止儿童被遗弃上，从原生社区和文化归属出发做了一个保护措施的优先排序，最好的是孩子留在亲生父母身边，其次是家族、亲属收养，再次是国内家庭收养，然后是跨国家庭收养，最后是家庭寄养。

“在中国，当务之急是倡导家庭化和国内收养，应尽早走出机构收养和涉外收养为主的误区，推动民间进入孤残病儿救助。”张雯说。王振耀则期待着两套体制的真正转型，“没有福利就不可能收养”。倘若缺失了“国家责任”这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只囿于公民收养制度的修补，而不突破儿童福利制度这个关键布局，孤残弃儿的收养最终只能是一盘死棋。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2/27/content_1810826.htm

[【返回目录】](#)

◎公益人

银杏伙伴成长之路

编者按：2012年10月，南都公益基金会第三期“银杏伙伴成长计划”评审落下帷幕，16位来自教育、助残、社区发展、劳工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益组织负责人成为新一批银杏伙伴。自2010年该计划推出以来，已有三批共37人入选，获选后的3年内，她/他们将获得每人每年10万元的个人成长资金以及相关的海外考察、伙伴协作、专家资源支持。继2010年访谈四位首期银杏伙伴后，本期《中国发展简报》再度访谈四位2011年、2012年度的入选者，以深入追踪她/他们在公益领域的成长之路及银杏伙伴计划对入选伙伴的支持路径。

作为在业内奋斗近十年的资深公益人，这四位伙伴的个人成长经历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她/他们也有过迷惘、彷徨、甚至退却，值得一提的是，银杏计划对每位受访者经历的不同层面的成长困境都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与很多公益伙伴相比，她/他们的成长中或许有更多的个人坚持与适时反思，但更不可忽视的是长期在她/他们背后提供支持的机构，以及太多的同事、伙伴、志愿者和领域内前辈的支持与贡献。

银杏计划自实施以来，通过对机构领导人的直接支持，间接助力草根机构的发展，很多机构因此获得更多公众影响、伙伴支持网络、专家与资助方资源，甚至实现了机构的战略转型。但是，对不少草根机构来说，银杏计划仅仅支持机构负责人，如何将领导人的个人飞速成长与机构一线员工的经验和需求相对接，实现公益机构人才发展的整体飞跃，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中国发展简报》在本期另一篇文章，也同时关注一线公益人才的发展问题。与中国公益领域的整体人才需求相比，当前基金会对人才发展的投入和项目实施还远远不够。

齐丽霞：一位农村女性 NGOer 的社会流动样本

人物档案：生于河南，曾做过乡村教师、报社采编、乡镇企业会计、工厂女工，后供职于广东公益团体女工关怀，2009年创办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致力于创建打工姐妹社会支持网络，提高打工姐妹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文艺让世界听到打工姐妹的声音，2012年获选银杏伙伴。

农村女性向上流动

年少的时候，齐丽霞有过两个人生梦想，或成为口若悬河主持正义的律师，或成为路见不平以笔为刀的记者。

高考时，丽霞把第一志愿定为河南省高等司法学校，分数失之毫厘，于是后来的人生路相异千里。调剂到高等师范学校，又是不喜欢的历史系，本想复读，但念及教师是铁饭碗，学费全免又包分配，还是去读完了大专。毕业后分回初中母校，也曾想踏踏实实教书干出一番成就，却发现乡

村的教师群体，一个有进取心的人很容易就成了异类。两三年后，丽霞辞职闯世界。

离开体制的庇护，丽霞在开封郑州一带饱尝流离之苦，做过小生意、卖过各种书，也进过些小公司，还有半年时间，她成了一名“记者”。拿到采访证时，丽霞欣喜万分，以为实现了年少时的抱负之一，后来才知道，那是挂着某报的名头，实际被私人承包的一个部门，所谓记者就是到处拉一些客户，再为他们写天花乱坠的软文广告。做了半年，丽霞对报社的幻想彻底幻灭。这时候，她也逐渐发现，虽然大专期间努力自修了法律的学位，但若想进入法律系统，没有关系，简直是痴人说梦。

晃了几年后，丽霞嫁到南阳。南阳产玉，闻名远近，夫家也做玉石小生意，有韩国老板来投资设厂，丽霞去厂里帮忙，后来老板招会计，这个位置相当重要，很多人都紧紧盯着。年轻的韩国老板和报名的人们挨个面谈，轮到丽霞的时候，从产业发展到工厂管理，她侃侃而谈。老板颇为意外，在他印象中，南阳是个偏僻的内地城市，工厂里多是思想守旧的农民，丽霞的见识和大专学历让老板扭转印象，任命她为会计。此举让许多本地家族不满，人们觉得，这种关键的职位应该让一个男人、也就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来做，而非丽霞这样从外乡嫁过来的、刚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丽霞顶着压力，做了一年多会计。2003年，由于一些矛盾利益纷争，工厂散了，见过世面的她不再满足当家庭妇女，南下广东打工。

被规训的“机器”

南阳玉石厂脱颖而出的经历，让初到广东的丽霞对自己自信十足。如小说一般，她应聘时收起大专和高中的学历证明，只拿着初中毕业证，去了中山的一家台资箱包工厂。当时的规划是，做几个月普工，竞聘成为基层管理人员，再往中层走。

她很快适应了工厂的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听到起床号时甚至觉得干劲十足。厂里规定7点吃饭，7点半上班，她6点就起，看些古诗散文，晚上七八点下班后回来还要写日记。但两三个月后，工时越来越长，从起初的12个小时，拉长到14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再下了班，她只想闭上眼睛睡觉，再不会想着写东西。人成了机器。但那时候，她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工厂时常组织生产竞赛，宣传拼命工作的才是英雄、稍微落后的就成了狗熊。随处可见的英雄狗熊宣传成了挥舞在工人身后的无形之鞭，鞭打着疲累不堪的工人们像机器一样无休止的运转，累到倒下的工人们甚至不会认为自己被压榨的太厉害，反而心生惭愧，以为自己能力不足、拖累班组。

这期间，丽霞也想竞聘一些基层管理岗位，但都没结果。后来才发现，工厂的基层管理只要够厉害，能让工人干活。那里的基层管理者没有女人，因为所谓的管理方式，即是对敢于反抗的工人，比如女工，就斥骂、加工作量，如果是男工，就叫上几个要好的老乡，拉到厕所连打带踹，服帖为止。至于选拔机制，更无从说起。厂里以河南、江西、广东三省员工为主，人员的上下都和三个省

的上层权力斗争有关系，哪一派得了势，这一派的亲信就都成为管理人员。

丽霞很快明白，血汗工厂需要的只是听话的“机器”，这里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为了扣住规训出来的“机器”，工厂一般不批准辞职，除非自己走人，但工人又都被压着一个半月的工资，虽然苦虽然累，但因为舍不得那些工资，很多人这样一年年熬下去。偶尔有能辞工的人，要走关系，还要写一些编出来的理由，比如回老家结婚、父母生病。

丽霞很倔强，辞工书上直接写：我要辞工，因为这里不适合我。组长看到后，为难地说：“这个理由我批不了，就算批了，上头也不会批。”丽霞一遍遍和他磨，保证说：“只要你批了，上头的事你不要管，我自己去找。”缠了很多天，组长批了，说：“我批就为了看你怎么叫上头批。”丽霞拿到组长的批文后，如法炮制，缠完主任缠科长，一层层往上，缠了很久，终于辞了职，当然也拿到了应得的工资。

随后，丽霞跳槽到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并在这里结识一家为劳工权益服务的南方公益组织。

开启 NGO 之门

对于丽霞这样出身乡村家庭、也未通过高考独木桥进入城市干部体制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的打工女性来说，在南阳那样更多保留选贤任能传统的小生产单位中，也许还有凭借能力实现向上流动的路径，但她在广东的打工境遇，充分展现资本全球化之下的跨国工厂对劳动力的压榨以及劳工流动渠道的进一步窄化。然而，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如何与资本的力量抗衡并实现工人的自我成长与向上流动？丽霞加入 NGO 的经历不仅是她个人命运中的重大转折，也可为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那时候，南方一家公益组织的“妇健快车”项目每天开车到厂区做法律、健康知识宣传。刚开始，丽霞经过时只是看一眼，看到写着“免费服务”，她就想，骗人吧，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后来见多了，心里想：要不去试试吧，我也不笨，就算是骗局，也看看他们怎么骗的。上车后，正好赶上文学小组活动，顿时觉得投缘，聊到结束还恋恋不舍，当然也确实没收钱。慢慢的，丽霞开始去做文学小组的义工，再往后，她给项目投稿，还在工厂里向姐妹们宣传。

虽然丽霞以前曾学过法律，但那些法律法规和现实完全不搭界。直到走进 NGO，丽霞才接触到劳动法，也才明白工厂里那么多违背法律的事情，应当在姐妹中宣传组织，大家共同抗争。用丽霞的话说，她从此从个人的际遇，看到了群体的问题。

眼界打开，丽霞不再满足于工厂里简单重复的劳动，她开始打听怎么加入公益组织。为此，丽霞积极参加相关的培训和学习，当时工作的厂子距离培训地点有一个多小时路程，为了协调出学习时间，她还换了家工厂。

几个月过去，丽霞成功入职“妇健快车”项目的活动干事。义工做久了，新工作其实没什么挑战，只有一个，她晕车很厉害，而项目大部分时间都在宣传车上。丽霞坚持试试，第一个月上车时

天天吐，好在那时候年轻，吐完了，漱漱口就缓过来马上投入工作。一个月后，不吐了，她晕车的老问题竟也就此好了。

丽霞深深喜爱这份得来不易的公益工作，非常投入，她兼职负责的热线电话有规定的工作时间，但她24小时都开机，任何时候接到求助都热心帮助姐妹们。就这样，丽霞在这家公益组织做了近四年。

这期间，丽霞对当地政策环境感同身受。她曾经去东莞跑项目，以商业书店的形式，为女工提供一个活动的空间。一是能实现些收益，负担部分活动开支，此外商业书店的形式也许会更有空间。但是，在东莞折腾了大半年，机构的注册手续还是没有批下来。区里没问题，但到东莞市一级，就卡住了，批文始终下不来。一趟趟跑了很多次之后，好心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不要再来了，你这个批不下来，原因不明。

另起炉灶艰难创业

2009年，丽霞离开深圳，应同心实验学校之邀来北京散心。她很快感觉到，对劳工组织来说，北京更有发展空间和机会。当然，吸引她的原因还有同心学校可以让女儿在身边读书了。南下五年多，女儿一直在老家让公公婆婆带，长到七八岁，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回乡时看到孩子陌生的神情，做母亲的歉疚难以释怀。就这样，丽霞来到北京。

女儿念书的事情落定，丽霞和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办一家机构。北京现有为外来女性服务的组织中，已经有为家政工服务的打工妹之家，为家庭妇女服务的同心希望家园，因此新机构定位为其他行业的外来女工群体服务。

机构选址大有学问。考察之后，定在当时外来人口集中的昌平东三旗，那里离地铁五号线终点站只有几站地，不管是活动参与者还是志愿者都能相对方便地到达，更关键的是房租相对低廉。至于机构名称，她们希望读起来朗朗上口，又能一望便知是为打工女性服务。丽霞和伙伴们想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打工姐妹们背井离乡，为个人、为家庭在大都市中寻找向上的生活，这是一种木兰精神；木兰又是一种美丽的花，二者结合刚柔并济，因此定名为木兰花开。

计议已定，丽霞和三个朋友凑了几万块钱，够了房租，同心希望学校又捐了些闲置的办公设备，桌椅板凳什么的，就办了起来。那是2009年的冬天，机构起步时，先对社区妇女是什么年龄段、打工女性有什么样的需求，进行了基础调研。为了吸引女性们，寒假前后还做了些儿童活动。

过完2010年春节，丽霞开始筹备后来走上《中国梦想秀》舞台的木兰文艺队，也为社区组织兴趣课堂，很快申请到乐施会的项目资助。开局顺利，丽霞更加自信。但没想到，半年后项目结束，乐施会资助范围收窄，机构顿时陷入困境。丽霞和她的伙伴们只得多方筹措，硬是在没有项目资助的情况下，撑过了一年多。她们一是向亲戚朋友告急，募一点小额资助；二是减缩开支，机构从东

三旗搬到更远的东小口镇，房租便宜了些，且租到的房子是临街的铺位，这为下一步开源打下基础；第三步，木兰花开和多家高校联系，开办社区二手店，在高校、后来又扩展到很多公司，募集二手衣物，售卖给社区的外来工群体。那时候二手店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有两千来块，勉强能支付房租。为了继续机构的运转，她们将一间铺位一分为三，前面一部分用作二手衣物售卖，后面一部分布置成图书室作为义卖点，中间小小的一块作为活动场地，开展社区活动，也让木兰文艺队继续排练唱歌、舞蹈、小品、戏剧……机构发不出工资，大家自己做饭吃，饭菜只有咸菜馒头，来了客人也是如此，木兰的馒头大餐渐渐在圈子里声名远扬。

从2010年乐施会项目结束，整个2011年，除一些零散的小额资助外，木兰花开始没有稳定的项目资助，直到2012年，丽霞才和新公民计划、打工子弟爱心会等资助方谈定了未来几年的合作计划。

回想这段特别艰难的日子，丽霞没觉得太难就过来了，原因也在于在木兰文艺队中释放出的梦想。这个由打工妹组成的文艺队两年多以来，在社区、工地、高校乃至联合国妇女大会的中国论坛，都留下了歌声与舞蹈，还在2012年4月走上了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让无数观众关注到草根边缘女性向上的力量与对梦想的渴望。

木兰花开遍地香

丽霞参选银杏计划，缘于首届银杏伙伴孙恒向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推荐。从提交申请表，到专家前来考察，再到参评培训，以及最后的评选，丽霞印象最深刻的是参评培训中南都请往届银杏伙伴为候选人进行的一对一指导。和丽霞配对的是2011年银杏伙伴，雷励中国创始人陆丰，他非常擅长演讲，在丽霞试讲后，陆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指导，让丽霞觉得受益匪浅。其他往年银杏伙伴也毫不吝啬意见建议，如2011年另一位伙伴沈旭，建议丽霞和评委们交流时演唱木兰文艺队的经典曲目《木兰花开》，这首歌从歌词到曲调都非常动人。

笔者拜访丽霞的时候，是一个初冬的下午，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外来流动群体也被拆迁和高房租不断挤压外移，木兰花开更因此三迁到了北京北郊的东沙各庄。这个已近六环的村庄在迅速聚集数万外来人口之后，很快发展为热闹的集镇。红日西斜，妇女们在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上用大锅炒着饭菜，四处飘逸的香味和她们脸上的笑容，似乎寓示只要留出缝隙，生活就能延展开来，就像《木兰花开》的歌词中所写：“远离家乡的木兰花满天飘，飘落在哪就在那生根发芽。”木兰花开遍地香，中国的底层，只要有空间，也会生长起来。

韩红梅：站在边缘拓展空间

人物档案：曾用名韩祺，先后服务于绿网和中国世贸网，从事发展教育、贸易与边缘人群权利、公民影像、社区戏剧等工作。2006年参与筹建北京第一个民众戏剧小组——糖葫芦剧团；2011年完

成家政工社区影像作品《我们》；同年七月合作发起致力于公民社会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的一元公社；九月筹建雷民影像工作室，以影像为行动者和边缘社群赋权；2012年获选银杏伙伴。

一入公益深似海

韩红梅大学毕业的时候，原本可以选择回到家乡做一个一辈子一眼望到头的体制内小爬虫，但为了逃开熟人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网，毅然决定留在北京独自闯。然而找来找去，公司都要有经验的熟手，她只得想法子积攒经验，有天看到志愿者联盟“贵州人”在招信息简报编辑志愿者，便盘算着当志愿者“混”一段经验，这样误打误撞进了公益圈。

这么一撞，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天和朋友们谈公益、谈理想，转眼半年，又看到另一家机构——绿网，正在招募发展教育项目的简报编辑，全职有薪水，工作也近似，红梅便跳槽去了绿网。

绿网是老资格的 NGO，最早是一些关心环保的人形成的网络论坛，现任阿拉善 SEE 基金会副秘书长的高天是公认的创立者，还有一帮铁杆志愿者。2005 年到 2007 年，红梅在绿网呆了两年多，从制作发展教育简报，很快拓展到项目参与。

发展教育那时还刚刚进入内地，正是做活动热火朝天的时候，红梅和她的伙伴们给大学生演讲、培训、做戏剧工作坊、议题讨论会，月月都往高校跑，后来一算，一年里她一口气做了 14 个培训，现在回想都觉得不可思议，20 多岁的年轻姑娘居然就这么大胆的培训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大学生。

问题很快浮现。发展教育作为一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教育体系，有成熟的理论框架，清晰的发展脉络。但作为培训者，年轻的红梅对这些不甚了了。她接受的 TOT (Training of Trainer) 培训，主要由戏剧培训师主导进行分散的议题讨论，这让红梅难以形成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概念。她记得那时候总是讲要反思，要批判性思考，但从没想过什么是批判性思考，为什么要进行批判性思考，社会问题到底是什么，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和年轻人的关系是什么？

现在想来，那时候做发展教育的这批人，和这一新舶来的理念一样年轻，一样有很多要思考的问题，而发展教育的培训者应当是有一定社会阅历和经验的人，否则，培训者们接受的东西没有经过消化和思考就原封不动、甚至是有遗漏的传递给了参与培训的人们。比如说，接受培训后，她明确要传递给大学生们社会要公平的意识，就跟大学生说，我们要公平，但如何实现公平？实现的路径是什么？大家的脑子其实都是一片浆糊。

那么个人如何成长？红梅认为，是要年轻人看到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并进行连接。可以强调个人的成长和完美多么重要，但更要强调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联系，不是坐在屋子里进行心灵成长，就能发展完善，也不是坐在屋里谈社会公义，就能真正发生改变。

如何实现年轻人和社会的连接？红梅负责运营的一元公社现在还在实践，组织讲座、沙龙、讨论，让更多年轻人关心社会，建立批判性的反思社会的视角；此外，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参与到社会行动之中去，因为社会的改变只能来自于行动。为此，红梅在绿网时期就开始了进入边缘的行动。

用影像连接边缘

2006年，红梅设计了一个名为“让我走近你”社区影像活动，组织年轻人走进边缘群体拍摄纪录片。她认为，影像是一种霸权，你要去拍边缘群体，他们为什么让你拍？为什么要让你了解他们的生活？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和边缘者建立联系和互动的过程。

红梅从绿网申请到五千元的经费，这很拮据，场地费往往都要一两千。然而坐着发愁，不如起而行动，她四处寻找不要钱的资源，后来五千块都没花完。先找的是当时在天下溪工作的周宇，经后者介绍进入拍客云集的DV江湖，寻找专业或业余的摄影发烧友当志愿者；再跑咖啡馆，游说免费租借场地，她特别感激当时大力赞助的盒子咖啡馆，不但免费提供场地，还送了一批T恤作为志愿者礼物；拍摄需要机器，就找朋友们借，6个小组借了三台摄像机，有一台还是通过志愿者偷偷从某环保机构借的昂贵机器，价值十几万，她当时拿着都胆战心惊，因为月薪只有一两千，要出了点岔子砸锅卖铁也赔不起。

几个月过去，各个小组都出了片子，主角有修车行的小弟，还有那时候在地下通道卖唱的王旭，他后来大红大紫，成立个组合叫旭日阳刚。片子完成后去国贸放映，王旭大冬天的跑到现场支持，项目没有钱给交通费，红梅自己掏了一百块给他，后来王旭一直记着这事，成名后还打电话给红梅回忆往事。拍摄的内容还包括那一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人们去金五星市场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采访，探讨流动儿童的出路，身为打工者的父母们的愿望。片子原本有机会在电视台放映，但因为技术质量不适合电视台播放要求而作罢，不过却引来公民杂志《民间》的采访，为此在2006年的《民间》刊发了一篇文章。

这个项目对红梅意义深远，她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年轻人如何参与社会发展的行动。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特别有正义感、热情和行动力，会因为社会问题聚在一起，展现出自己的力量。但那时候，发展教育遇到许多困难，外界争议很大，很多人都说，发展教育做成了戏剧工作坊。红梅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和实践，但是她还太年轻，想的也不够清楚，也就没有做出更多的争取。

扩大的视野

发展教育项目遇到挫折的时候，红梅也有挫败感，她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有信心的做发展教育的人，但是却做不下去了。那时候，她也曾尝试向资助方继续申请项目。项目官员说，你来解释，我为什么要把资助款给你？说服了我，才可能给你。红梅更觉得受挫，她觉得，资助方应当是在和合作伙伴做一件共同认可的事情，双方平等的坐下来谈，寻找共识，而不是合作伙伴有一个

想法，再想法设法照着资助方的思路，去说服对方。这其中有权力平等的问题，也有双方的认识是否处于同一出发点的问题。

2007 年底，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议题的 NGO 网络——中国世贸网招人，红梅跳槽过去成为协调人。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 2012 年年中，对她有多方面的影响，部分解决了红梅在发展教育项目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也为后来成立拓展公共空间的一元公社打下多方面的基础。作为一家旨在为入世之后的内地 NGO 提供全球化背景中贸易公平视角和意识、能力提升的 NGO 网络，世贸网的工作视野厘清了红梅从事发展教育工作时的困惑，让她得以学会看到社会问题发生背后的结构性逻辑。举个例子来说，知识产权有时候是对创新的保护，有时候背后却隐藏着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涉及到传统文化的时候，很多时候中草药方剂的专利化，实际是将传统社区无数人历经多少辈积累的经验据为己有，之后对社区缺乏反哺，甚至对社区带来害处，如中草药专利化后的昂贵价格反而让社区的人难以承受。

但是，世贸网也有局限，由于发起人的国际背景和高端视野，跟进、讨论的议题往往来自国际层面，而非从本土的社区中自下而上的产生，加之贸易议题的包罗万象，单凭红梅一己之力，很难做深做精，因此有些议题很难在内地的社区层面得到呼应。

世贸网的几年，红梅也在业余时间继续社区戏剧的演出、社区影像的尝试，她总觉得，自己内在的情感还是和社区联系在一起，到了 2010 年前后，她再度谋求转变。

边缘群体的力量

2010 年底，由于旭日阳刚的走红，红梅和一些劳工组织联系增多，在打工妹之家的支持下，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家政工影像项目。

起初，红梅的设想还和做发展教育时一样，请年轻人来拍摄边缘群体，以促使他们发生改变。但是 2011 年初，红梅在一次培训上看到台湾劳工组织南洋姐妹会拍摄的纪录片——《姐妹卖冬瓜》，顿时明白了影像发声的真正脉络是什么：工作者要做的是介入社区群体本身，促使她们发现自己的力量，让她们自己为自己发声。

红梅改进了项目策略，她把机器给了家政工姐妹们，让她们自己拍。这起初很艰难，她发现，虽然有些姐妹在一个社区里，平时见了面也认识，但没人会为了拍摄去联系另一个人。两周后小组再集合的时候，大家什么都没拍。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是需要不断培力的。在破冰阶段，必须要有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红梅没学过社工，但是她意识到问题后，自学社工。之后尝试小组活动，让姐妹们先为了一个好玩的事情如唱歌跳舞聚起来，彼此看见，再在相处的过程发现共同的需求，如工资、保障的需求，还有家庭暴力、子女相处、与雇主相处时的种种问题。发现问题之后，再将社区戏剧融进去，让姐妹们讲述自己与这个问题之间的故事，并找出大家问题中的共性，从而演化成

一个集体的故事，成就为一出社区戏剧。最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每个人有什么特殊的策略，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生存技巧。

从这个角度上说，社区影像并非诉说悲情的故事，而是发现边缘者的力量、边缘者的价值。经过六个月的培育，姐妹们真的成立了合同小组、维权小组，并开始解决问题。红梅觉得，如果只是为姐妹们提供法律培训，由上而下，无法对接家政工自身的经验，而从社区得出的朴素经验，往往比法律上规定的条文更适应她们的生存。

从边缘拓展出的公共空间

家政工影像项目转变方向的时候，红梅希望给每个小组找一个督导，联系到社工专家曲平和性别专家吕频。但项目没有督导的预算，找来后，红梅说：“我这里只有一百块，你俩分了当路费呢，还是大家一起吃顿饭？”不出红梅所料，大家凑一起吃了顿饭，就是这顿饭，三人敲定了合作发起一元公社的计划。

建公社的想法起源于为家政工姐妹提供周末活动空间的愿望。当时，红梅的世贸网和吕频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正好都在寻找办公室，两家预算凑一凑，能合起来租套不大的办公室，会议室空出来，就可以当作活动场地。很快，她们在城铁柳芳站附近找到合适的办公室，房租超出预算，她们又向一些朋友募捐，凑到第一年的房租，2011年7月，一元公社开张了。

开张之后，姐妹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她们只有周末有空的时候才会来。NGO没有浪费的习惯，红梅、吕频们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从关注权利和社会发展议题的彩色放映室、发展悦月谈、女行论坛、倡导沙龙，到关注青年人发展与培养的青年社会性别读书会与重视人文关怀的小泥屋青年读书会，以及为NGO提供能力建设的培训、为缺乏资源的NGO提供免费活动场地……一年多下来，一元公社发展出许多在公民社会的多个领域中小有名气甚至形成品牌的公共活动。这些活动让不同阶层和领域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彼此看见，不仅提升了公众对社会议题和公益组织的了解，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发展思想的辩论与传播，也促进NGO之间的交流，促进对社会议题的反思。

一元公社开张一年多，常常组织关于权利和倡导的讲座、沙龙，很多人会觉得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公共空间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红梅却认为，在从集体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丧失的很多东西之中，就有进行公共生活的空间。当前的我们处在一个极度缺乏公共空间的时代，很多人丧失了作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公共空间鼓励更多的人有意识地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让更多人不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且更多关心社会问题和边缘人群的生活，然后再去做公益。公共空间对于当前这个缺乏弹性与润滑剂的社会来说，不是反对派集结的场所，而是寻求社会向更美好的方向转变的途径。

误解起于隔膜，一元公社进行活动的时候，也曾遇到过误解者，但和误解者坐下来坦诚以待，

双方都会发现这只是一种相互了解的过程。做事如此，申请资金也是如此，有时候国内基金会的开放度也会超出倡导类 NGO 原有的预计，比如红梅这次银杏伙伴的申请。

身为倡导者的银杏伙伴

2012年8月份的一天，一个小伙子在活动结束后上来问红梅：“你这里缺钱不？”几个活动间忙的团团转的红梅说：“我们不缺钱，缺人。”小伙子很意外，和红梅聊了起来，最后下结论，你这里还是缺钱。他亮出自己的名片，南都公益基金会传播部的李玉生，建议红梅申请银杏伙伴计划。红梅确实缺钱，之后的一个多月，她寻找推荐人、写申请材料，做了认真的准备。对她来说，这是个难得的反思机会，沉淀下来完整梳理了一遍从贵州人以来的公益发展轨迹。

由于往届银杏伙伴绝大多数都是服务型机构的领导人，红梅原本以为自己机会不大，认真走完申请流程后也就慢慢淡忘了，因此获选后，她相当意外。现在想来，一些国内基金会应当是超出很多人原本估计的开放，红梅曾经听徐永光谈及维权组织的作用，指出维权组织的另一种功能是维稳，这当然是一种辩证的说法，在红梅看来，这也反映出徐永光是个有胸怀的公益领袖，并且有足够高的眼光，有策略的将国内基金会资源与维权类草根组织的需求相对接。

获选银杏伙伴之后，红梅可能会听从评委的建议，去读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课程，也会继续参与一元公社的管理运营，但随着中国世贸网的结束，一元公社的租金已有半年只靠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租金预算独立支撑，原本就有的预算缺口越来越大。随着北京的房租猛涨，租金更难筹集，她们甚至萌生过关张的念头。但一念及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它的意义和价值绝不限定在那小小的几十平米，在那里碰撞过的边缘观点和草根智慧，激荡过的社会批判和行业反思，在主流观点近乎占据所有讨论空间的当前社会是如此珍贵，而它的存在和延续，也让更多人看到，这样一个场所也有生存和生长的空间，因此，她们依靠着朋友们的捐款，支撑至今。为此，红梅还在努力为新成立的机构——“雷民影像工作室”筹款，从而继续以机构租金合作的方式，让这一空间继续生存拓展。

沈旭：做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结合的教育

人物档案：2004年起担任绿网总协调人，先后统筹乐施会与社区伙伴支持的多个能力建设项目，为国内发展教育网络创始人之一；2007年11月与伙伴共同筹备北京灵动珊瑚·发展教育工作室，并将发展教育与华德福教育相结合，在城市社区和流动人口社区实践儿童、青少年教育及家长课堂，于2011年当选为银杏伙伴。

与教育结缘

1999年的一次出差中，沈旭像往常一样在飞机上依然忙于工作，不同以往的是，下飞机时，旁边的外国老人送给她一本英文小册子，是本华德福教育的书。在她看来，这次偶然是和华德福命中注定的结缘。

两三年后，沈旭去河南、贵州的一些山村进行短期支教，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沈旭从小在城市长大，家境小康，工作稳定，从没经历过苦难，但见到山里的孩子之后，常常会触碰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一个她至今难以忘记的画面是，夜晚在乡间操场讲故事的时候，很多孩子会捧着萤火虫，围坐一圈，似乎要留住这得来不易的一点光。此外，尽管食物匮乏，有些孩子也会把一周唯一的一个水果或者他们认为好吃的，送给外来的老师，在送完这“珍贵的礼物”之后，迅速的跑掉。面对这种带着些许羞怯的质朴情感，沈旭觉得无法辜负孩子们的期待。

支教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做游戏，一片欢闹中，有内向的孩子孤单的站立一旁，她让这些孩子闭着眼睛摸大树，让树的眼睛和自己比比身高，认识一个新朋友。一年后，有孩子来信说：“因为有了树的朋友，现在有更多同学愿意和我做朋友了。”她发现，即使你只做了一点点，但在孩子的世界里，你可能改变她们很多，甚至会改变她的整个世界。

因为这些原因，沈旭萌生做教育、进入 NGO 工作的想法。2003 年非典期间，她结识了更多环保圈的朋友们，时常在一起聚会、讨论问题、参加活动，得知环保志愿者们结成的联盟——“绿网”需要一位全职来做事时，决定去试试。就这样，沈旭成为绿网的协调人。

绿网时期：从水土不服到柳暗花明

从企业乍到 NGO，沈旭很不适应。首先让她头大的是，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自己来。当时的绿网除沈旭外，只有志愿者组成的协调小组，要发展下去，必须先筹款、申请项目；跑了半年后，沈旭筹到草根 NGO 网络建设、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教育三个项目，80 多万的经费。钱来了，下一步要招人。2004、2005 年的 NGO，招来的都是新人，沈旭自己也没有经验，面对各种繁杂的事务，顿时觉得压力如山大。此外，她还觉得 NGO 的工作不专业，做项目都是一个活动一个活动的赶场，不扎实，但又不知如何改进……总之，离原本理想中的教育工作很远。

尽管如此，绿网的三年经历，为沈旭后来从更多元的视角和更广泛的视野切入教育打下了基础。

沈旭最初进绿网，部分原因是受到和社区伙伴（PCD）合作的生态农业项目吸引。在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框架下，她们去村子里找种植有机作物的农民，比如安金磊，订购有机农作物，收获后农民按协议将有机蔬菜送给绿网，由其代为销售。目前这种 CSA 的概念在国内十分流行，但那时候还非常新颖，因此，到了最后一个环节——销售，很难做下去。PCD 认为，除了环保热心人士外，项目还应该让城市社区的居民更多的参与，但 2005 年的时候，网络不发达，绿网人手少工作忙，平日里能接触的只有办公室周边的平房回迁社区，不可能让那些为了一分钱两分钱菜价而斤斤计较的大爷大妈们去购买一斤八毛钱的有机白菜，因此买来的有机产品只能在绿网的工作人员和以环保工作者为主的志愿者圈子中自我消化。

然而，CSA 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为沈旭开启了另一种视角。2006 年，项目结束后还有些余款，

沈旭向 PCD 申请为安金磊拍一个纪录片，她拉着寇延丁一起去安金磊的农场，看着自己亲手种下去的棉籽，在几个月内逐渐长大。片子从春天一直拍到秋天，收获的时候，看着那些棉花，她忽然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在孕育、长成，你怎么给它提供土壤，让它健康的长大，让它成为自己……每一朵棉花都是不一样的，而这跟教育密切相关。当天晚上，沈旭给成都华德福的徐添打了个电话，询问华德福小学培训是否还有名额，徐说，你来就有。她很快飞到成都，为另一段人生的开启拉开序幕。

不过，一段新人生得以开启的因素显然不仅仅限于收棉花时的顿悟，更与绿网另一个关键项目——发展教育密切相关，由于后者和她的教育从业理想最相关，沈旭跟进得更多更深入。

2004 年，乐施会开始在国内推行发展教育，沈旭参加了 4 月进行的第二次培训，讲师包括很多有名的戏剧培训师，如欧怡雯、陈玉兰等，让参与者通过戏剧的方法，不止看到自己的问题，更看到自己和整个世界发展之间的联系。沈旭觉得这种教育很有必要——即使在 NGO 中，很多人也只是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而没有把自己的事和整个行业乃至整个世界相联系。她对发展教育产生了兴趣，向乐施会申请，并于 2005 年初开始推行发展教育项目。

然而，喜欢归喜欢，与 CSA 一样，发展教育在国内也是一个全新的舶来品，后来反思，她们那时候并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做。经常在工作坊结束的时候，沈旭看着很多人的眼睛就知道，他们没有听进去，而且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她知道没有触动到参与者。主办方希望在工作坊中建立起多元性，让人们包容多元的价值观，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很多人的视野已经那么窄，已经有固定的价值观，很难改变。而那时，作为主办方的她们也都缺乏实践，拥有的只有理论。何况，在近十年前推行发展教育的价值观，也有些水土不服。发展教育兴起于西方，西方国家的人们已经有这样的视野，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大多数人还没有这样的视野，推行中肯定会出现适应不了、消化不良的情况。

沈旭认为，每个人看待事情的方式都和他们成长的背景密不可分。反思之后，她希望在发展教育的设计中更重视个人成长的部分。但是，那时候她还分不清这是一种治疗还是一种个人和社会的连接，虽然她隐隐约约觉得这不单单是心理治疗。在困惑中探索了一段时间后，沈旭进入到灵动珊瑚的发展教育时期。

灵动珊瑚：以个人成长推动社会发展

沈旭离开绿网后，另一位伙伴李媛独自将发展教育项目坚持了下来。一段时间的华德福小学培训之后，沈旭和李媛开始商议另建机构专心做发展教育。此时的沈旭，以参加华德福小学培训的视角，再来看发展教育，视野不再相同。华德福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有很大区别，幼儿园注重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唱儿歌、做手工、讲故事等，但小学除了这些之外，更重视人心灵的发展成

熟，以及孩子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她想把华德福教育的理念融入到发展教育的成人培训之中。

新成立的机构叫做灵动珊瑚·发展教育工作室。和很多 NGO 的名称一样，灵动珊瑚也寄寓着三位创始伙伴沈旭、李媛、刘欣琰对所从事的发展教育事业的期待：“灵”代表“心灵”、“动”代表“行动”，“珊瑚”则是一种多元的生物，寓意吸纳多元的理念，同时珊瑚又是死的生物，“灵动”可以让她活过来。

2008年9月，灵动珊瑚开始推行视界工作坊，她们把发展教育分成三个部分，一是个人成长，二是社会议题，三是关于行动。为了回应外界对发展教育偏重个人成长轻社会议题的争议，工作坊对社会议题进行了重点设计，包含四个议题：社会性别、流动人口、环境保护和生命意义，并计划由个人成长切入，与社会发展相结合。

在第一天的社会性别议题中，工作坊请参与者反思：你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怎么认识自己的性别在人生中的位置和意义，以及和别人关系的影响？她们引导参与者从自己身体的探索来思考社会性别。反思之后，女参与者会探索平胸被歧视、脚大被歧视的原因，男参与者也开始寻找男性身材纤细、性格文静被歧视的社会原因。

第二天的议题是流动人口。以放映日本 NHK 的纪录片《穷人与富人》切入，请参与者分享观后感：每个人都有家，都有离开家的时候，哪怕是上班。你离开家时是什么感受？为什么离开家？你想为家做什么？你对家的怀念是什么？……离开家和个人有关，也和社会有关，她们希望启发人们对流动人口漂泊在外的同理心，同时也思考，为什么这个社会背景下那么多人离开家？

在环境保护议题中，工作坊选择气候变化为具体主题。她们假设地球变暖后已经毁灭，参与者作为幸存的地球人来到另一个星球，那里有一些痕迹是关于地球的，请人们去寻找这些地球被淹没的痕迹，并在过程中发现气候变化和人类和地球的关系，以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你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活。

最后一天，在以上探索的基础上总结思考：已经思考了几天这些问题，之后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为你的生命赋予什么样的意义……[\[1\]](#)

视界工作坊越来越成熟，但不久之后，资助就断了。那时候批评的声音很大，有人说，发展教育在国内发展这么多年，成了单纯的戏剧培训；也有人认为，个人成长的部分太个人。沈旭觉得很可惜，因为刚觉得找到方向的时候，就断了。

华德福教育的本土实践

灵动珊瑚的资助断了之后，沈旭再度转向华德福教育，她继续参与华德福小学培训，筹建幼儿园和小学。此时，带着发展教育的视角再深入接触华德福，又让她学会从社会发展大背景切入个人成长。她认为，中国的教育缺乏视野，也缺乏对内心和社会连接的关注。华德福教育可以补充这些，

让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更完善，而不像已经定型的成年人，还要花更大的力气来补课。

由于强调优质教育，加上不菲的房租与人力成本，在许多大城市里，华德福成为中产以上阶层才能享受的教育乃至出现媒体所称的“贵族化”趋势。但在沈旭来看，没有国家投资的私立幼儿园、学校成本本来就昂贵，华德福教育的门槛一时半会儿降不下来。如果不希望华德福贵族化，就得有人去做一些事情。

之后，沈旭在一些和社区服务机构合作的青少年项目中融入华德福教育的内容，比如新公民计划资助的魔法数学课程，80%的内容都是华德福内容，用游戏、故事、绘画将华德福的数学模块变成孩子们能接受的东西。她在项目实施中，还注重向家长提供培训，主张课程由社区里的妈妈们而非外来的培训师去上，社区里的妈妈学会了，才能更好地教给孩子，并改变原来带孩子的方法。实践之后，沈旭发现，华德福并不是那些已经吃饱了饭的妈妈们才能关心的事情。

和在广西实践华德福教育的卢安克一样，沈旭并不认为自己高尚，她一直赞同卢安克的观点：不要将非主流教育的实践者当圣人，他们只是在做一种教育实践。沈旭也是如此，感谢并珍惜实践教育理想的机会。

当选银杏伙伴之后，评委高小贤介绍国际计划的减低校园暴力项目给沈旭，问她要不要做。沈旭本有生孩子的计划，接了项目，会有很多行程奔波在山路上。她很犹豫，但项目诱惑力实在很大，国际计划已经打好了学校、教育局的铺垫工作，平台是现成的，这是个极好的实践机会。权衡之下，沈旭还是接手了。目前项目正在陕西的四个县市、十六所学校铺开，覆盖八千个孩子，沈旭负责指导其中四个学校的四个试点班。

她希望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可以对外说，华德福在中国本土有自己的实践，不光有在城市中产阶级中盛行的华德福学校教育，也有结合了乡村现实和 NGO 发展经验的实践。

银杏伙伴始末

沈旭很了解自己，她清楚自己出身成长的背景，也明确由于成长背景，自己不具有很多 NGO 人时刻感受到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她明白自己有小资情调，如果没有压力很可能一直随遇而安。但深入了解了发展教育和华德福之后，她更清楚，如果华德福教育不做改变，在国内就会成为小群体小圈子的事情，乃至贵族化。如此继续，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差距会越来越大。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得有人站出来做事情。

这是沈旭决定申请银杏伙伴的一大缘由——成为银杏伙伴可以带来压力，提醒自己把事情做完，如果没有这个名头和这些钱，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她可能继续随遇而安。简而言之，银杏伙伴让沈旭更有社会责任感。

回想起申请过程，沈旭觉得和三位评委老师高小贤、何劲、杨晓光面对面的那一场面试，最为

过瘾。对话非常有挑战性，让她觉得碰到了对手和老师，老师们对你有期待、又有启发，让她看到以前未曾看到的东西，视野更开阔。对话结束时，沈旭觉得，不管能不能选上，已经有了足够的收获。除了后来成为良师益友的高小贤，另两位评委也都有对她来说犹如醍醐灌顶的点评。何劲说，做事情不能只局限于灵动珊瑚，应当去看整个领域中，你能带来的新的价值观、新的视野是什么——你可以带动整个领域的发展，而不是一个机构的完善。这对沈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只做好一个机构的责任，对沈旭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推动力；但放大到整个教育领域，她明显感觉到自己沉甸甸的责任感。杨晓光则说，应当允许员工犯错误，给她们成长的时间，因为一个成熟的伙伴往往需要五六年的培养时间——这给她很大的安慰，因为之前和同事的相处中也会觉得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当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老总杨晓光也如此说时，她感觉到莫大的安慰，心中也就不再有那么大的压力。

不过，在银杏伙伴中间，沈旭偶尔也会觉得自己边缘，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如何筹款，如何做规划，如何把机构发展的更大。她想的不是这些，而是这么多事情要做，怎么把这些事情一件件落实下来？筹了这么多款，没有懂这些东西的人怎么去做？因为，人的培养很难，找到懂得教育、会做教育的人更难，教育是一个精细活，做好教育的人往往需要更多的个人成长时间。

林炉生：让教育与内心都回归自然

人物档案：学生时代为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骨干，2006年合作创办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之后相继在密云创建自然教育基地、昌平创办打工社区学习中心，2009年在自然教育基地基础上创办燕山学堂，致力于自然教育、自然教育生活化、社会服务及青年成长支持的实践，也注重净化内心与简单生活的探索，2011年获选银杏伙伴。

从学生社团到公益机构

林炉生在闽南乡间长大，高考后进入北师大专科部读经济专业。他发现，很多同学的大学生活都在吃喝玩乐、郊游踏青中度过。炉生很难融进去，家庭经济也不允许，便将时间更多的投入学生活动中。有一回，哲学老师上课时介绍农民之子社团，那时候还是2002年，农民是有些污名化的称呼，炉生立马对这个冠以农民之称的社团产生了好奇与好感。进去之后，感觉更不一样，很多高校社团也有官僚化作风，而农民之子的成员生活方式很简朴，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

从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到给学校工友做培训、文艺活动，炉生一发不可收拾，还在老乡中募捐图书，自己成立了个社团——思农学社，带着老乡们寒暑假回乡支教。很快，他在读书与社团活动之间走完大学三年。毕业时，炉生留在北师大做后勤行政工作。他本以为，有这么多做项目的基础，现在又有了后勤的“官方”身份，可以继续在校内做工友改善项目。但工作后，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后勤工作有自己一整套的框架限制。炉生那时候年轻，不懂变通和打“太极拳”，安稳的工

作和内心的理想发生冲突，他辞职了。

这时候，农民之子社团毕业的老会员越来越多，不少人都想将社团理想移植到社会上继续做。很快凑了7个人、7万块钱作为启动经费，成立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炉生全职负责。

然而高校社团不同于专业NGO，炉生一腔热情投进来，忽略了可能的难度。从学生社团到一家专业MGO是两回事，社团是流动的，往往组织零散的、自愿的活动，而专业NGO是持续的、稳定的机构，要进行系统的实践工作，需要有专业能力的工作人员，而非志愿者。但农民之子机构刚成立时，延续社团时期的做事习惯，缺乏专业经验的培育和对项目的系统策划。

先是帮农民搞生计，开展乡村旅游。炉生还在北师大后勤工作时，曾经与社团同学们一起帮密云西湾子村的农民策划板栗义卖，从中一分不赚，还承担了收到假币的损失，他们的做法感动了农民，受邀去农民家里做客。大家到了村子，发现周围有野长城，农家菜也美味可口，就萌生出帮助农民搞农家乐旅游的想法，既能自负盈亏，还能帮农民致富。

农民之子组织志愿者发帖招募城里人到村里旅游，农民有了收入，也很高兴，还在村里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但问题很快出现，来的人花了钱，就对农户的卫生、食品安全、住宿舒适度都有要求，而那时候那个村子的农民意识还相对淳朴，卫生间、厨房条件都相当差。游客提了意见，炉生他们反馈给农民希望改进，这就要花钱，农民觉得，我还没挣到什么钱，就要先投入，不愿意。旅游计划夭折。

后来，有个台湾老师建议做亲子农园，承包一块地，让父母闲暇时带孩子种地，既有收入，又能做儿童教育。炉生就和伙伴租了几块地，起名为亲子教育田园，邀请一些有消费能力的人，比如北师大的老师，带孩子去种地。活动很有创意，最重要的是适合炉生他们的擅长——青少年教育活动，但也有问题，一是交通太远，西湾子村离城里有120公里；二是吃住条件也比较差，家长来了几次就不再来了。

几经折腾，炉生发现自己根本不擅长搞农村生计。那个阶段在寻找方向中饱受煎熬，员工也有意见，不明白机构工作为什么总是变来变去，再加上经费压力，工作中经常争吵，先后有几位员工在短暂工作后就离去。这件事对炉生的打击也很大，他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把目光向内，了解自己的性格和特质，而这个时候，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教授夏林清老师为炉生等一群青年人指引的“生命故事”方法，给了炉生很大的帮助。炉生认为这是他后来向内心探索的起点。

自然教育的萌生与成型

2006年底，一心教育服务中心给了农民之子一万四千块的资助，让他们做流动儿童教育。次年一月，农民之子组织了一期冬令营，开始使用自然教育理念。结束后，资助方非常满意，并追加后续资助。

农民之子的自然教育理念有两个起源，一是卢梭的《爱弥尔》自然主义教育，一是老庄的道法自然思想。炉生本人自幼在山中长大，更对自然有深入骨髓的热爱。但2007年冬令营的时候，他们的自然教育还刚起步，主要还用知识模块的方式，如水文、天文、地质、农业等，让学生了解、接触自然。当时密云不老屯有个国家天文台，农民之子带着孩子们去看，见到巨大的射电望远镜什，小孩子惊呼：“哇，这么大一个锅！”但看过了，也就忘记了。而另一个活动，寻宝游戏，在树林里，藏一些东西让孩子们寻找，反而更受小孩子欢迎。看孩子们写的日记就会发现，他们印象最深的不是射电望远镜，而是游戏。这让炉生体认到，教育的关键不是给孩子多少知识，而是让他主动参与体验，他们的世界是经验的世界，而非概念的世界。

由此，农民之子开始注重设计更多游戏，也开始引进华德福教育、环境教育，以及其他机构的经验，在这样的摸索中，自然教育逐渐成型。

2007年的夏天，农民之子一口气办了三期自然教育夏令营，不仅继续获得一心支持，还有来自宣明会、乡村教育促进会的资助。作为一种另类教育实践，自然教育需要场地的配合，借来的场地，会限制活动深入开展。于是在当年夏天，炉生租下密云西湾子村废弃的乡村学校旧址，签了二十年协议，一年租金4000元，总共8万块。虽然场地租金超级划算，但基础设施很差。为了进一步省钱，也因为炉生认为，作为教育实践者，自己都不懂的东西，如何能教给孩子？接下来的几个月，农民之子的员工和志愿者，全部参与基地建设。从电焊工、油漆工到木工、瓦工，从建房到搬运苦力，从厨房到种地，炉生学会了做所有的工种，并明白教育是一种生活，由此提出一个理念，叫做自然教育回归日常生活。

基地建成后，参与者不仅仅是孩子们，很多成年人、大学生、NGO工作者、白领也开始参与，服务对象扩大，他们又去尝试更多元的课程设计。由于服务人群的多元化，农民之子在自然教育这个项目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经营项目的收入，由此可继续投入于基地建设及发展工作团队。

除自然教育外，机构也开始为社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服务。2008年，农民之子办公室从立水桥的一个小区搬到昌平东三旗附近半截塔村，从此扎根流动人口社区。这背后也基于一个理念：对服务人群应感同身受，真正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要。

回顾这两年，炉生认为机构走过了最艰难的初创阶段，流动儿童自然教育和社区教育得以齐头并进，工作方向逐渐清晰，工作团队也开始稳定。当时承担的项目越来越多，如面向打工子弟教师的《烛光通讯》、打工子弟师生文学联谊赛、乡村中医义诊等。炉生尤其感念的是，2008年自然教育项目开始得到香港社区伙伴（PCD）稳定持续的资助，他认为PCD是一家非常成熟的资助方，不仅提供资金，更提供机构成长支持，比如财务存在不足，就帮助培训财务人员，对自然教育理解不深，便提供更多参与培训机会以及其他外部资源。炉生再三强调请笔者为PCD记上一笔，因为这种特质

如果被更多伙伴和资助方知道，对行业发展更有意义。

困惑时的退守与探索

一切走上正轨时，炉生遇到新问题。他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阐述什么是自然教育。当不了解的人问起什么是自然教育时，很难说清。很多人把自然教育完全等同于环境教育，由此造成很多沟通上的困难。有些没有深入机构的人，甚至困惑和指责农民之子究竟是教育类机构还是环境类机构，为什么农民之子的业务范围又有流动儿童教育，又有环境教育。

此外机构项目增多，也出现矛盾，比如申请到了项目，为此招人做事，但项目完成或者做不下去，人怎么安排，请人离开机构？不离开的话怎么解决？团队内部为此产生矛盾，在炉生那时的经验里，解决不了，加上他想追寻自然教育的真谛和本质，便决定往后退，将机构事务、社区项目以及《烛光通讯》转交同事管理，只专注于擅长的、让自己内心有力量的自然教育。

“退思”时期，炉生接触了甘地和一行禅师的思想。甘地对简朴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探索，启发了他，他开始尝试素食、光脚走路、体验自然，越发觉得自然教育是一种自身修养和内心净化的体验。而一行禅师对佛法的阐释，也让他认为自然教育是一种改变现有生活的方式，他因此开始深呼吸，进行内观。

这些内在的探索给炉生及机构带来极大助益：大家的心开始学会往内看，遇到矛盾或问题时不再像以前只是指责别人，而开始会反观自己。这种改变逐渐成为机构重要的特质，而机构中的每个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益。

这两年间，农民之子的机构事务由另一位发起人卫宏负责。从春到秋，炉生专注于自然教育。由秋入冬后，自然教育事务减少，他则外出游学，到福建的华南内观中心做义工。两个半年的时间，炉生学会清理机构繁杂事务及生活中诸多不如意时带来的负面情绪，并重新养成健康的作息习惯与生活方式。

在炉生看来，这两年是他对自然教育深入再思考的关键。现在炉生对自然教育已有一个简练而清晰的表达——“随顺自然规律的教育”，而在实践上，机构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然教育实践体系。自然教育不再只是传授知识、举办活动，它回到生活中，关注每个人内心的转变。当内心产生善意时，才会有对外传播的力量，让服务对象受益；负面情绪不懂排解，则首先伤害自己，其次传播给周围的人。

当2011年中，炉生重新投入整个机构的工作中时，他感觉由内至外，都充满了力量。

银杏伙伴助力机构转型

立业之外，随着年龄增长，成家的压力对炉生逐渐显现。2011年，作为工资最高的机构负责人，炉生月薪只有3500元。“像我这样一般的农村家庭，父母务农，兄弟姐妹做工，仅供一个孩子念完

大学，就要花掉家里所有的积蓄”，炉生坦言，“尽管对于工作充满信心，也是内心最喜欢的职业，但我还是几次考虑过退为农民之子理事，自己去从事些能赚钱的工作”。

这时候，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征募新的伙伴，农民之子的同事们纷纷鼓励炉生参选，从初审到终审，他顺利获选 2011 年度银杏伙伴。也许有道德至上主义者会主张 NGO 从业者不谈钱，但炉生不讳言，这笔及时的资助让他整个心都沉淀了下来，也让一直为他担忧的家乡父母放了心。

当然，获选银杏伙伴带来的也不仅是钱。炉生这两年一直在探索什么是自然教育，银杏伙伴的专家来考察时，问他组织的规划是怎样的？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是什么？有什么机构人才培养计划？他才发现过去很少关注这些方面。获选后他有意识地学习，借助两届银杏伙伴组成的关系网络，赴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学习，参加非公募基金会论坛，赴恩派请教……很快学到许多可借鉴复制的机构发展模式。

从 2011 年底，农民之子开始考虑做战略规划，到 2012 年底已完成，目前还开始了一次颇具野心的战略调整，他们自称为“二次创业”。

自机构成立以来，农民之子始终是自然教育和流动儿童教育两条工作主线交叉并行，就像两个交叉在一起的圆，六年过去，两个圆都有极大的发展。流动儿童教育项目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诸如扎根社区的社区学校计划，面向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烛光通讯》月刊等；而自然教育项目从最初为流动儿童服务开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受众多元的普遍性教育理念和办法，特别是自 2009 年在自然教育基地基础上创办另类学校“燕山学堂”之后，他们在另类教育、另类学校的探索上，有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发展。

这次战略调整即是把农民之子分拆成两家机构，一家为农民之子，争取在北京实现民非注册，专注于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服务；一家为燕山学堂，专注于自然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简单生活、生态家园等领域的实践，并以社会企业模式运作。两个机构之间一线执行团队分开，但依然由炉生和其他几位核心骨干所组成的管理团队负责。炉生的愿望是，未来几年内两家机构分别在各自领域发展成全国优秀的典范。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2012 年冬季刊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366> [【返回目录】](#)

王静艳：“这个项目不虚伪”

在北京生活了五年，王静艳仍坚持认为，中和农信（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的小额信贷公司）是她留在这个充满雾霾的城市里唯一的理由。

感动和愤慨

王静艳，女，单身，天蝎座。

在上海出生、成长，生活一直很顺利的她曾天真地以为世界本就如此繁华。“虽然也去过西北一些贫困地区，但都是旅行，从未接触过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

像每一个家境良好的城市孩子一样，王静艳按部就班地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本科毕业那年，她申请随校队支教。“本科在同济大学读广告，学校有对口援建项目，支援云南，每年都组织学生到云南贫困地区支教调研。我特别积极地申请，结果老师不让我去，因为当时支教的学生都有免试直升硕士的机会，但我已经定了读研，老师说你就不要占这个名额了。”

“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去。”研一的暑假，王静艳随学院支教团来到了甘肃定西。“研究生时换了专业，开始学经济管理，定西是我们学院的定点支援市。去之前查资料，说那是黄河上游一片古老、广袤又神奇的土地，到了才知道，那片神奇的土地有多穷多贫瘠。”

几个月，王静艳和农民们吃住在一起。村里缺水，几百米深的井都不见水，好不容易打上来的水也都裹挟着黄沙、黄土。“洗脸都让我先洗，不敢用香皂，因为我洗完了大家还要轮流洗，全家都用这一盆水。”黄土地上长不出水稻，村里人吃面食。可为了这群南方来的孩子，村长特意到镇上买米，老乡们又不会煮，王静艳和同学们就总是吃夹生饭。

“很感动，老百姓是很好的，可好人为什么要受穷？因为缺乏眼界和机会，没有人给他们发展的机会。他们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祖祖辈辈习惯了那样的生活。”从甘肃回到上海，王静艳感到了对“习惯”的恐惧，“自己都不能适应，上海怎么能那么繁华，街上怎么能那么多人。”

站在大马路上，王静艳陡生一种“人生而不平等”的愤慨。“他们人好，智力也不差，可与我们的生活却相差太多。”她想起自己呆过的村子，小孩们围着圈儿新奇又小心翼翼地触摸着电脑键盘；她又想起自己的小外甥，几岁就开始玩电脑游戏、上英文课。

选择与坚持

在公司呆了一段时间后，借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上海筹款的机会，王静艳与机构建立了联系。“没多久，他们说这边招人，让我过来看看，就来了。”彼时，中和农信还没有正式成立，王静艳服务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负责“幸福花”项目——在小额信贷地区培养农村妇女做手工艺品。“整个部门也就十几个人，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岗位分工。”王静艳说，那是2007年。

“我不喜欢北京，我对北京没有任何概念和印象。那么痛快地答应来基金会工作，是因为那些曾经经历过的画面一直让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改变。我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养家，父母也没有负担，从这个角度看，低工资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可以不用为了挣钱，而是去做一些让这个社会更美好的事情，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想法很简单，做起来却很复杂。“我对公益概念的理解是有过程的，之前觉得很美好，然后一步步走向现实。”

没有“拿着钱四处发”的痛快，也没有“为他们建房子盖学校遮风挡雨”的满足感，王静艳面临的是一一为项目筹款。

“难、很难，尤其是为小额信贷筹款，人家都说，你给农民贷款还收利息，我凭什么给你捐？让我解释这项目有什么意义，我也说不出来，我根本自己就不懂。”两年，王静艳只募到唯一一笔钱，来自自己师兄的公司，二十万——不是捐给小额信贷的本金，而是下面的一个助学项目。

“那段时间很郁闷，觉得工作难做，跟想象的不一样，领导也说我业绩太差。”王静艳不得不开始更深层级地思考这个项目：到底什么是小额信贷？该怎么向其他人解释？项目的运作模式是如何确定的？如何让资金达到最高效运转？“虽然募款不成功，但自我提升做得相当好，学了很多东西，反思了很多问题。我们开始找融资。”

专业并职业

2008年11月18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小额信贷项目部转制成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2009年，中国扶贫基金会获得中国农业银行授信2亿元，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签字仪式。不再愁本金的刹那，王静艳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豁然开朗，虽然她开始了365天乘以24小时的工作制。

马不停蹄地出差，奔走在祖国各种村落，王静艳逐渐熟悉了与农民打交道的技巧，也终于能滔滔不绝地与人交流关于小额信贷的一切。“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改变对公益的理解。单有爱心没有用，需要的是专业，和做会计懂财务，做营销懂市场是一样的道理，做小额信贷，就要了解它的起源、演变、分类、模式、运作规律。”

因为专业，王静艳不喜欢常把公益挂在嘴边。“这圈儿里有种风气很奇怪，很多人会觉得我做公益多高尚，刻意为自己贴标签。可行业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各行业都在为社会做着贡献，汽车行业、IT行业、食品行业，缺一不可。公益人对自己的定位必须客观，这样在工作中才能多一些职业精神。”

岁末的北京，一直被雾霾笼罩着。年报、年会、年终总结……王静艳已经很久没休息。偶尔走神时，她也会想，为什么留在这儿？“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和农信，我看好小额信贷项目。”

“这个项目不虚伪。不是这个项目，我是不会做公益的。我希望与人平等，没有姿态高低之分。”

项目执行的过程是交易关连，而不是赠与。这是一块利润很低的商业机构不愿意来做的市场，我们用社会企业的模式经营，只是它达到的效果很美好而已。”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中和农信的业务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国 14 个省、63 个县、1161 个乡镇、17,273 个行政村，受益人数高达 2678 万余人。除了帮助农民脱贫外，就地招聘信贷员的方式还为 830 名员工提供了工作机会。2012 年，王静艳和她的工作伙伴们为全国农民发放贷款 13.55 亿余元。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test.gongyishibao.com/gongyi1/ZLxZL/201302/8ed233c639a945a99e2715f28636dc69.shtml>

[【返回目录】](#)

◎国际观察

美国公益风险投资运行概述

在美国，公益风险投资与整个新经济并行发展，不断繁荣。仅仅在过去 8 个月之内，就已经启动了三项基金：“亚利桑那社会风险投资伙伴” (Social Venture Partners Arizona)、“三角社区基金会企业伙伴” (Entrepreneurs Partnership of the Triangle Community Foundation) 以及“硅谷社会风险投资基金” (the Silicon Valley Social Venture Fund)。什么是准确的“社会风险投资基金”呢？至今还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概念，也没有任何组织能成功地印证这个概念。有些人将之描述为支持社会企业家的资金，有些人将之用于夹层融资，同时也有些人将之作为创建非营利组织的“冒险性”资助。本文将对美国公益风险投资的概况及其回报期望的分布进行简要介绍。

一、“公益风险投资”的定义

一种由风险资本家的努力积累而成的基金，就是社会风险基金 (social venture funds) 吗？或者，遵循风险资本的理念进行分配，它就是社会风险基金吗？莫尼罗研究所 (The Morino Institute) 的“社区财富风险投资项目”对此领域做了为期 6 个月的调查，发现公益风险投资有多种定义，各个组织对风险投资实践与公益慈善之间的联系并不确定。

本文把社会风险基金定义为下述情形：一种存在多捐款方的基金，特别是那些运用风险资本实践去实现投资者的价值和影响最大化，强调社会问题的基金。1997 年，莱茨、瑞恩及葛劳斯曼 (Letts, Ryan & Grossman)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开创性的文章，提出了能将慈善中的风险投资行为

和更为传统的慈善活动中的投资行为区分开的6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风险。(1)风险投资公司承担风险并得到相应的回报。它们不是防范风险，而是控制风险。(2)基金会则是规避风险，因为无论任何承担风险的方式都没有回报。因此，基金会降低了可测度回报的概率。

第二个要点是实施方法。(1)风险投资公司注重那些能够导致长期发展的绩效考核。(2)基金会注重短期方案的效果。

第三个要点是关系的紧密度。(1)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者之间是亲密的工作关系，他们共同操作交易流程，进行CEO的选举、制定战略规划等。(2)基金会往往与受助人(grantees)保持一定的距离。(3)基金会往往不参与运营项目。

第四个要点是融资数量。(1)风险投资公司很少对交易活动进行投资，但对已选择投资的交易活动，风险投资公司会投入足够资金，以求扭转局面，并且也会对后续的基金需求提供帮助。(2)基金会对每笔交易都进行小额的投资。他们往往提供很少的资金，且很少提供后续援助。

第五个要点是关系的维系时间。(1)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作伙伴都知道合作时间一般为期数年。(2)基金会和合作者的关系一般很少超过两到三年的时间。

第六个要点是退出策略。(1)从开始投资起，风险投资公司就有明确的退出时间。通常，它的退出可能是由另一个风险投资公司来操作的。(2)基金会很少有退出策略。

了解了以上含义，我们就发现，风险投资领域和“疯狂西部”(wild west)有些类似，也就是说定义比较混乱。个人、组织及基金会都在通过各种技巧使其投资最大化。如表1所示，这个领域最活跃的参与者是企业家和基金会，他们要么启动风险投资基金、要么采用了风险投资模式的要素，比如进行长期投资。相比而言，最独立的社会风险投资基金在本质上是一种多方捐赠，而且包含了个人投资，比如，联营公司投资中(pooling corporate investments)的企业家基金会策略。关于如何界定公益风险投资，并没有达成共识，对怎样将风险投资机制应用到慈善事业上，人们同样也不置一词。甚至像“西雅图社会风险投资伙伴”(Social Venture Partners, Seattle)这样的开创性组织也对一些应用步骤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莱茨等人提出了几种常见的风险投资技巧，慈善组织也可以用这些技巧使投资价值最大化(包括长期投资)，为能力建设提供资金，建立评估测量体系以及强大的投资标准。他们希望能让慈善组织感到投资中也有他们的一份从而受到激励。简单地说，如果投资者非常期望能取得可测的社会收益或经济收益，他们就会增加投入。投资者会有策略地投入资金和人力资源；他们的投资时间设置也会比较适宜；他们对管理成效的评估也会非常客观；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在必要的时候参与进来，这样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莱茨等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表述完整、论证有效并且论据充足的个案研究，说明了公益风险投资可能的意蕴。在他们的《美德资本》(Virtuous Capital)一文发表后，除了“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企业家基金会”(Entrepreneurs Foundation)和“新汉普郡慈善基金会”(New Hampshire Charitable Foundation)外，还没有别的组织能完整地或综合地形成自己的操作理念。莱茨等人的讨论比较重要，因为，他们不是为了风险投资而提倡风险投资方式，也不是为了在操作成功的情形下使风险投资中的现金通过杠杆作用而取得高额的利润；相反，他们把风险投资方法看作一种诊断方法，也就是弄清楚为什么非营利组织很少能够形成规模并且很少能持久。

此处提出的社会风险基金的设计及操作理念应该直接与亟待解决的问题挂钩。也就是说，应该关注解决问题的基金会的发展。应该清楚而客观地阐明投资者的期望。投资者的战略性和持续性参与应该是一个先决条件。虽然有些组织，比如“企业家基金”及“新汉普郡慈善基金会”都在采用莱茨等人的文章作为操作的理想模式，但大多数组织只采用了风险投资模式的细枝末节。例如下面的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参与实际操作(hands-on)。实际动手去做的投资方法也是一种风险投资模式。一些风险基金，比如“新利润公司”(New Profit Inc.)计划在投资对象的董事会中占有席位。然而，很多基金会和基金组织对侵入性的参与都持质疑态度，他们正在研发多种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基金会为那些提供战略性援助的组织安排捐赠伙伴，有些基金会，比如“新学校风险基金”则提供一个有力的志愿者网络，投资对象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

第二种方法是确立投资标准。虽然大部分基金组织对什么是“好的提案”(包括哪些人是优秀的有从业背景的企业家)所见略同，但在选择怎样投资上，他们却有着根本的分歧。“21世纪教育创始基金”采用了一套严格的记分卡来决定提案能否获批，而“企业家伙伴”则允许投资者来决定投资标准。

这一系列的活动可以说明，在建立社会风险基金上，没有现成的模式。现有的基金正在建立不同的投资方式，而每一种投资方式都产生了不同的参与机制，并进行各种期限的投资。

二、成功的公益风险投资个案

虽然没有统一的方法可以将慈善和风险投资行为融合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些组织在总体上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领军者，比如“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社会风险投资伙伴”、“企业家基金”以及“新学校风险基金”。保罗·布莱内德的“社会风险投资伙伴”(Social Venture Partners)模式对新经济一代来说极具吸引力。布莱内德创建了一个由年轻的专业人士及技术领袖组成的网络，这些人每人在两年内投资5000美元并对受助人提供实操方面的援助。这种模式已经在3个城市得到

了推广，其中包括奥斯汀和凤凰城，并且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企业家对此进行研究。许多其他基金会和组织正着手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方案，帮助非营利组织进行能力建设。比如，培训非营利性组织经理的“德纳里创始基金”(Denali Initiative)等组织就正在发展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能力，而“信誉基金”及“罗宾汉基金会”这样的组织也在帮助有决定性作用的专业人士提高他们改善服务供给的能力。本文对这些组织的谱系进行了概括。

看来，已经成功吸引更多支持的新社会风险基金是一个能够延伸并具有着风险投资经验的开创者。约翰·德尔(John Doerr)创建了“新学校风险基金”，吉卜·梅耶尔(Gib Myers)创建了“企业家基金会”。他们的可信度、交往关系(contacts)和启动资金使基金能够完全运转起来。相比而言，其他的基金也踌躇满志，却不能保障有一些交往关系，从而也未能注资。

有发展前途的新基金也具有一套构建良好的人力资源参与战略，以及强烈的对问责性进行评估的意识。为了确保受助者获得成功，“新学校风险基金”给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位有着相关经验的董事会成员，以及一个由其他企业家和新经济资源构成的强有力的网络。类似地，“21世纪教育创始基金”给投资对象提供了多位“诤友”，在这些“诤友”中，过去曾经包括惠普公司(Hewlett Packard)的总裁在内，他们和投资对象一起排除困难和制订战略。

在这些相同的基金组织中，许多组织开始使用商业计划去制定评估标准，确定资金受捐人的需求。“公益风险投资中心”(Center for Venture Philanthropy)的几位创立者和投资对象一起制订了一个3—5年的商业计划，包括对问责性的评估标准和合作的理念。“社会风险投资伙伴”的“商业工具”计划则向投资对象提出一系列问题，以帮助他们确定资金需求。

三、什么人参与公益风险投资？

公益风险投资的开创者大多是一些从未参与基金会共同体的新一代企业家。不过，在公益风险投资领域的先行者中，他们许多人本身就很熟悉风险投资的技巧，他们要么直接掌握这些技巧，要么通过对技术进行风险投资并取得成功从而获得了这些技巧，他们热切地想把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应用于公益性投资。实际上，“三角社区基金会”对“研究三角区”的慈善如何最大化进行了市场调研，确定把公益风险投资当作对年轻企业家最有吸引力的已有模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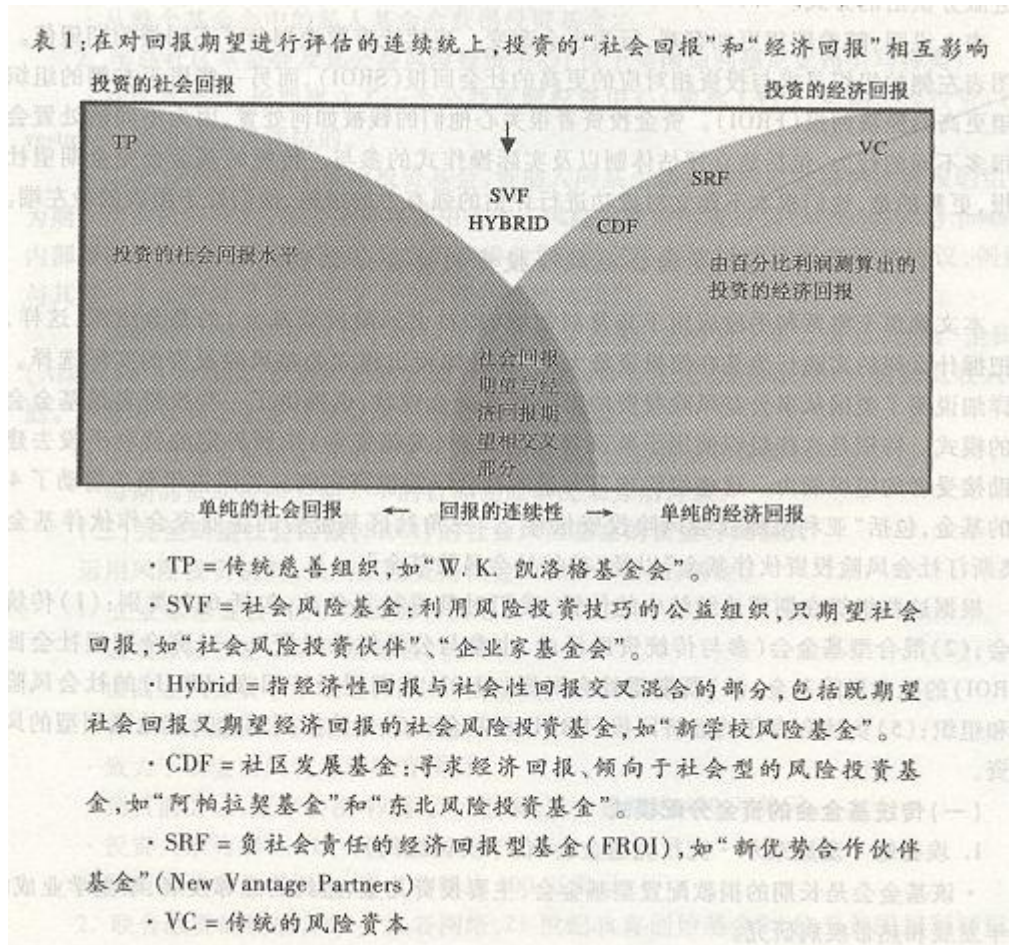
传统的基金会要么在追赶(catch-up)个体企业家，比如约翰·德尔和吉卜·梅耶尔，要么在发挥支持的作用。基金会已经躲过了游戏中最具风险的阶段，并且有可能会继续支持安全的投资，比如“召集”和支持最知名的企业家。也就是说，基金会领域中的一些成员很积极地参与其中，例如，“新汉普郡慈善基金会”将启动自己的风险基金并且给投资对象提供长期的资金以及组织性的援助，其他基金会也在公益风险投资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例如，“罗宾汉基金会”从11年前创办伊始就与投资对象建立长期关系，并组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志愿者网络，旨在为投资对象提

供战略性的帮助。其他的一些基金会也正式提供能力建设的资助，寻求和另外的基金会合作以加强投资对象的能力，这样的组织包括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惠普(Packard)、莫特基金会(Mott)及佩由基金会(Pew)。据 W. K. 凯洛格基金会的汤姆·里斯所说，甚至福特基金会也在谈论基础设施的发展事宜。

许多社会风险投资基金都是在西海岸稳步起家的，这里毗邻西雅图、硅谷这样的技术圣殿摇篮，而且在该地区，非营利组织曾经最为活跃，技术领袖们的相互激励也最为强烈。进而，这里的基金是针对地区性需求，或针对地方政府的需求而筹措的。企业家基金会集中关注圣佛朗西斯科海湾地区，而“西雅图社会风险投资伙伴”关注西北部的教育及青年问题。没有什么基金会关注中大西洋地区的青年发展问题。

四、慈善的回报期望连续统

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的慈善行为和新的慈善行为之间的不同，需要引入期望连续统这一概念。我们相信，慈善领域开始发生的行为转变可以追溯到慈善家的期望改变上。期望自己的投资能得到可测度结果的人与那些期望并没有改变的人相比，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特别是当人们从投资的社会回报转向投资的经济回报时，期望会变得更加客观并且可以进行评估，导致更多参与、更为活跃的投资行为。我们旨在对此连续统的中期阶段进行探讨，因为就是在这个阶段，盈利的期望被用到慈善活动上，努力使投资的产出最大化(见表 1)。



传统的慈善——特别是基金会——处于表 1 的左端。基金会的投资行为通常是被动的，它们很少去关注受助者的组织能力。结果，传统的慈善机构不去进行充足的投资，以使投资对象有能力发展壮大并且更有成效。

风险资本家处于表 1 的右端，风险投资公司期望结果，至少期望投入得到回报，最好还能有所盈余。风险资本家和投资对象进行交流，他们预料到可能的失败及其后果，他们和被投资者建立评估体系，以确定预期结果能否实现。他们鼓励进行能力建设的投资，他们深知，没有能力建设，他们的投资就会有很大风险。同样，风险资本家提供专业的知识技术，承诺长期投资，对结果进行评估，以保证投资得到回报。一言以蔽之，他们期望其投资能有可测的结果，并承诺能实现这些结果。

在连续统的中段，行为即是指期望的功能。假设此期望发生变化而且更加客观，投资行为就会变得更加可操作、更为活跃。投资者会对组织的能力建设进行投资，给他们提供取得期望结果的工具。他们和被投资者建立了对成功进行评估的体系，并不接受把服务供给作为投资的惟一结果。同时，随着新一层级水平的问责要求被引入，投资对象也会着手进行能力建设，改进服务供给的方式。

表 1 说明，随着期望更加客观，行为也会改变。连续统有效地划分了不同类的期望值。位于图表左侧的组织寻求与投资相对应的更高的社会回报 (SR0I)，而另一些居于右侧的组织则期望更高的

经济回报(FROI)。资金投资者很关心他们的钱被如何处置,因为不同的处置会导致很多不同的行为,包括建立评估体制以及实际操作式的参与。传统的基金会完全期望社会回报,更甚的是,他们根本不建立对成功进行评估的强有力的措施,他们处于图表的最左端。

五、美国公益风险投资的资金分配模式

本文聚焦于将营利手段应用于非营利领域(即社会风险投资基金)的基金组织,这样,才能把握什么样的实践行为是在使投资最大化,并且体现出建立公益风险投资的实际选择。下文详细说明了美国从事公益风险投资的组织和基金会现状,也提供了一些投资者给基金会带来的模式。特别是这些组织使用了莱茨等人的文章《美德资本》中所界定的营利手段去建设资助接受者的组织能力。这些组织选自大量的社会风险投资实例。美国去年至少启动了4项新的基金,包括“亚利桑那社会风险投资伙伴”、“三角社区基金会的企业家合作伙伴基金”、“奥斯汀社会风险投资伙伴基金”以及“硅谷社会风险基金”。

根据这些组织在期望连续统中的位置,我们对其进行了分类,包括6个类别:(1)传统基金会;(2)混合型基金(参与传统资助活动,也参与公益风险投资);(3)完全期望社会回报(SROI)的社会风险基金;(4)既期望社会回报(SROI)又期望经济回报(FROI)的社会风险基金和组织;(5)负社会责任的经济回报(FROI)型基金;(6)风险投资基金及其他赢利型的风险投资。

(一)传统基金会的资金分配模式

1. 埃德娜·麦康奈尔·克拉克基金会(位于美国纽约)

- 该基金会是长期的捐款配置型基金,主要投资儿童、纽约的睦邻发展、学生学业成绩、青年发展和热带疾病研究。

- 在捐款配置的过程中,认真考虑过采用风险基金和风险资本。

2. W. K. 凯洛格基金会(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克里克)

- 该基金会使用“合作型风险投资基金”,把慈善的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集中起来。

- 非常有兴趣适度地把风险资本投资模式应用于捐资活动。

- 虽然没有正式的风险投资计划,但是基金会“非正式地、持续地”为受助者提供切实的能力建设援助,包括对一些受助者进行长期资助。

(二)混合型基金会的资金分配模式

这类基金会参与传统的捐赠活动,也参与公益风险投资。

1. 新汉普郡慈善基金会(位于美国新汉普郡康科德)

- 投资范围广泛的社区基金会,包括人性化服务、环境问题、艺术、教育和公共政策等。

- 受莱茨等人在内的众多激励而创建的社会风险投资基金,旨在推动长期投资和组织的援助。

- 致力于建立受资助者间的网络。
- 非常接近于运营型基金。
- 从整个基金会中的私人基金会获得投资基金。

2. 半岛社区基金会及其公益风险投资中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

• 社区基金会, 近期建立了一个公益风险投资中心(简称 CVP), 强调公民投资(civic investment)的收益是可评估的。

• CVP 计划建立几支风险投资基金, 资助人向某个新兴组织或发展到新阶段的组织提供为期 3 年的投资计划, 每项投资均采用类似于风险投资的问责过程(accountability process), 从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两方面帮助组织获得投资, 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和谅解协议, 例如, CVP 与其第一个被资助者共同创立了一项联邦资助的项目。

• 1999 年 7 月 20 日公布了第一个风险基金投资, 总额为 350 万美元, 包括“全民资产”(Assets for All)联盟, 在资产并购方面(大学教育、自有住房、退休金账户)资助低收入工人家庭。三家非营利企业参与竞争第一笔 CVP 风险基金。

- CVP 管理资助资金并从其资金中分配基金(包括薪金和设备)。
- 每期的资助按照为期 3 年的目标完成情况来分期付款。

(三) 完全期望社会回报(SROI)的社会风险基金的资金分配模式

运用风险投资机制, 仅期望投资的社会回报(SROI)的基金。

1. 企业家基金会(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

- 近期在硅谷建立的风险基金。
- 由商业风险资本家创立, 并主要依赖风险投资模式。
- 将 1%的股权用于新创的公司。
- 致力于旧金山的青年和教育项目。
- 到目前为止, 董事会由 49 家公司组成, 资本总额为 490 万美元。
- 投资关系为期 5—10 年。
- 期望 500 家公司加入, 资本总额达 100 万美元。

2. 联合融资的挑战 2000: “硅谷网络, 21 世纪教育创始基金”(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图)

• 由企业和 20 个市政府联手创立的 2400 万美元的风险基金, 用于改善本区域内的商业环境和职员生活质量。

- 致力于投资教育。
- 许多来自科技领域的当地 CEO, 以“诤友”的身份, 每季度帮助学校解决困难。

- 完善的考核体系。

3. 硅谷社会风险投资基金(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圣何塞)

• 近期建立的具有发展潜力的基金,得到硅谷社区基金会(CFSV)的支持,并以CFSV开展的市场调查为基础,以期指明硅谷发展的正确方向。

- 基金将用于培训企业家,并使其参与当地的公益活动。
- 探索“社会风险投资伙伴”模式。
- 召开季度会议,提供硅谷非营利企业需求的分布状况。

(四)既期望社会回报(SROI)又期望经济回报(FROI)的社会风险基金和组织的资金分配方式

1. 新利润公司(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 “第二阶段”的投资基金,计划向建立“新利润部门”的计划和组织提供大约100万美元的资助(包括技术和管理经验)。

- 以投资的社会回报为首要因素,但希望既投资非营利企业,也投资营利企业。
- 处于第一个投资组合(四个组织)的筹资过程中

2. 辉瑞社区发展基金(位于美国纽约州)

• 将辉瑞的雇主和资本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结合起来。辉瑞基金会认为,应该将一般的支持资助转换为特定项目的资助,由此建立了辉瑞社区发展基金。

• 制定的计划不适合辉瑞基金会的专长或兴趣领域,此外,因为选派帮助投资对象的内部人力资源,以及基金会对实现高级经理人的期望感到困难,因此,该发展基金于1999年停止运营。

3. 硅谷社区风险投资(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 社区发展企业的范例。
- 运行商业咨询计划,将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与企业专业人士联系起来。
- 向海湾地区低收入社区中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提供贷款和股权资金。
- 通过捐助和银行投资得到资助。

(五)负社会责任的经济回报型基金的资金分配方式

1. 新优势合作伙伴(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维也纳)

- 为与使命相关的投资者、基金经理人和天使投资者提供咨询。
- 专注于中大西洋早期阶段私营公司的投资。

(六)风险投资基金及其他赢利型的风险投资的资金分配方式

1. 中大西洋投资基金会

- 种子基金和启动基金。

- 主要是基于技术的基金但是也做社区投资，其回报期望与传统投资是一样的。
- 100%营利性的风险资本公司，位于表 1 的最右端。

来源：基金会中心网

地址：<http://www.recende.com/Item/Show.asp?m=1&d=939>

[【返回目录】](#)

看国际基金会如何做工作评估

公益组织如今正面临着与人类产生对峙的最紧迫、最持久的问题。这些以使命为导向的组织追逐着宏伟的社会目标，包括消除贫困、促进人权、推动教育成果、巩固民主原则与进程等等。实现这些目标无疑是一项项长久的事业，需要有进取精神的解决方案、持续性的努力和坚定的决心。

但比起这些我们与之抗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公益资源却显得格外地稀少。不仅如此，在动荡的经济气候中，公益领袖还必须严格地分配这些有限的资源。而这个时代，无尽的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变革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得公益活动的策略性和有效性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呼吁与关注。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一样，公众事件的结果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作为公益领袖，我们如何在各自组织文化中定义、推动和增强对结果的承诺，将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事业的成与败。

结果如何，只能由公益组织所服务的社区的最终成果来定义。过程和某次活动的结果只能作为临时性的成果，真正受到关注的结果是所帮助人群的切实感受。

《公益时报》特别策划报道，看国际知名基金会如何做自己的工作评估，各家所坚守的评估手段，严格、创新、容纳利益相关方的声音，同时适合于基金会所工作的环境。希望能有借鉴意义。

福特基金会

如何在全球构建员工对结果的分享文化

在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大家持续工作以应对人类的挑战。我们的目标集中在社会公正原则上，因为这代表的是人们内心的尊严。

为遵循这些原则，福特基金会致力于保证社会体制和机构能够给予所有人影响自己生活和发掘自身所有潜力的机会。这项工作意义深远，但同时，它也自然是最难进行评估的工作。

由此，福特基金会所面临的挑战便是要创立一种聚焦于结果的文化，但同时又不以我们的远大目标或工作原则为牺牲。

设立一个明确、集中的策略愿景

一个聚焦于结果的文化始于对目标的清晰认识和为目标实现而创立的策略。在我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第一年间，我与全球项目团队一起细致地审视了我们的捐赠项目，以求我们的工作能够集中且清晰。我们明确了一整套核心的社会公正议题，使得基金会的目标令人信服。在每个议题上，我们设立了有明确定义的目标和策略，讨论出了实现目标的变革理论，并设计出了逐步操作的手段。这项工作的结果可以从我们网站获取，我们绘制了一份示意图，列出了我们的捐赠目标和策略，并将这两者和我们所支持的非营利、非政府事业联系起来。

这项工作的第二阶段是要明确实现每个策略所需的资源规模。这项工作意味着我们把对平均每个项目的资助从100万美元提升到了1000万美元。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终于能仔细地将基金会在捐款以外的资源进行了合理的分配，这包括项目领袖精神、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通讯以及聚集各方的能力。由此一来，直接的经济支持成了基金会用以解决某项问题的一小部分工具而已。

以区别化和动态化的方式分配资源

有了清晰的目标、策略和操作手段后，核心问题就变成了为了有效地实现预期结果，每项策略所需的资源规模是多少。最开始，基金会将财政、员工和其他资源按照目标性质和规模一一分配。现在，我们则要按照策略性的需求，动态地改变以上的分配。从结果可以看出，资源的规模在不同项目和同一项目的不同阶段变化可以是非常大的。

在持续的评估过程中，我们专注于与项目员工开展对话，讨论是否需要加大投资以取得显著的结果，又或是减少投资用以未来的探索工作。这一过程在内部形成了一个动态意见和信息交换场所，也预示了我们捐赠策略的演化过程。

基于清晰的角色和分工建立责任制度

清晰定义的角色和分工是聚焦于结果的文化中心所在。对于高层管理者来说，它有助于实现严格的监督和伙伴机制，从而有效地将资源与目标相连。责任明晰是责任制度的基本要素。

在福特基金会，我们将负责人的分工展开，并给他们严格的角色划分。一般来讲，一个负责人监督三个项目，监管项目团队和预算。我们在地方分支办公室工作的代表，需负责与在纽约办公室的总监一道确定某一地区最适合的项目是什么，并确保该项目的有效执行。尽管有许多人参与捐赠过程，某一地区或某一项目的预期成果需由总监团队和地区代表共同负责。

我们对于受助方的期望很高。我们需要他们展现最好的成果，同时，作为基金会领袖，我们也对自身提出高要求。从高级领导层到新入职的员工，福特基金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铭记，成为基金会的一分子便意味着为了确保结果，要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每一名员工都应知道，和受助方一样，我们也要为结果负责。

重视深层次、有效倾听

聚焦于结果的文化要重视倾听。在福特基金会，我们知道我们的受助方对他们服务人群的共同议题有着最深刻的见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支持那些项目管理者居住或工作在目标问题周围的项目。我们认识到与受助方开展丰富的对话是一项关键的需要。

福特基金会的全球办公室网络就是被设计用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想法的，在这里可以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和虚拟会议。平均每年，单单在纽约市的办公室中，我们就接待了超过两万名到访者，他们与我们的团队共同商讨现有的和尚待开启的项目。

深层次倾听的能力不仅对于单个项目很关键，对于我们机构整体也尤为重要。2008 年，福特基金会与超过 4000 名的受助者，与其他专家一道进行了策略重设的工作，我们相信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为重塑目标和唤醒我们工作活力做出了贡献。

在整个组织内执行理念

领导一个基金会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福特基金会，我们经手的款项超过 5 亿美元，并以多种方式改造着社会，其中包括提供个人和团队的指引、倾听声音和召集聚会、构建意识和合作关系等等。但这一系列上的杰出表现也并不一定能保证能孕育并维持聚焦于结果的文化。

我们在项目执行与支持上的成功取决于基金会出色的日常运营和独一无二的捐赠管理，因此我们也努力确保我们的“结果文化”能够超越项目团队层面，感染每一名员工。一家优秀的公益组织必须保证其机构的所有操作都和策略制定、资源分配、信息采集和结果评估这些步骤保持同等的严格程度。

2011 年，基金会对项目拨款超过 1 亿美元，这直接受益于 2008 年和 2009 年我们在运营上的成功改革和捐赠管理。举例来说，我们在 2009 年将原本用于内部运营开支的 4000 万美元改为对外拨款，从而使我们能够启动并完全资助以上所谈到的所有项目。此外，慎重地对所得捐款进行发放，成功地让我们从经济衰退而造成的投资损失中恢复过来。

（本文作者系福特基金会主席路易斯·乌比纳斯）

洛克菲勒基金会

如何对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进行评估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工作由具体的带有时间限定的跨部门项目所组成，这些项目均力求以创新的形式来促进环境的改变。基金会的结构反映了我们的观点，即当今世界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范围和本质上都是多维度的，它们需要跨部门领域的多角度回应。

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公益观点共同进化的还有我们的工作评估体系。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坚守的评估手段必须严格、创新、容纳利益相关方的声音，并且适合于基金会所工作的环境。

促成利益相关方实现共同成果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基于项目的工作方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基础理论是，从根本上认识到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挑战都是不可能被单独攻克的。这些挑战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它们通常在全球范围内的各部门、各地域中互相依存。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如网络组织、联盟以及综合了政府、基金会、公民社会、商界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的结合体，它们更有能力调动广泛的资源、发起大规模的行动，以促成可持续的、革命性的重大改变。

洛克菲勒基金会越来越多地让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受助方和合作伙伴共聚一堂，达成对问题、成果和成功指标的共识。在受助方的协议中，如今已加入了对结果共识的考量和需要受助方在其中做出贡献的共同成果。基金会团体也乐于操作需受助方也做出贡献的捐赠关系。这种共同成果手段也为不间断的监督、评估和报告打下了基础，也为受助方和合作伙伴间开启了相互学习的对话窗口。

监督和评估

大多数基金会在监督、与受助方和合作伙伴的学习交流、项目走访和协同工作等方面能投入的时间都有限，但洛克菲勒基金会为监督与评估团队和专家拨款，让他们在项目的整个寿命期内担当监督伙伴，我们称之为“关键朋友”。他们与受助者一道发现关键问题所在，帮助建立监督体系，并为分析监督数据提供支持。这些关键朋友最为显著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与受助者和合作伙伴建立了相互信任，从而能够提出尖锐的评估问题，并且帮助受助者利用反馈在整个项目期间不断提高自身。这些独立的团队定期对项目的成果和影响做出目标进展评估。

交流论坛和实践社区

大多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团队都会召集受助人和合作伙伴进行年度性的进展回顾，总结经验和挑战、庆祝成果、明确尚待改善的方面。通过这些论坛，受助者能够向他方学习经验、结识新的资助方、调整未来的行动策略。尽管交流会并不能直接扩大项目的影响力，但通过其创造的“主人翁”和共同成果的氛围有可能让这一愿望实现。此外，交流会还使受助者与新的资源方、捐赠者和学者发生各种联系。我们的目标是与受助者一道建立起一套协同工作、经验共享的体系，以及一种将评估视为交流来源和项目有效性的氛围。

比如我们加盟了由非营利组织 Pact 推动的“东南亚气候变化恢复能力实践社区” (South East Asia Community of Practice in Evaluating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旨在对亚洲十个城市的气候变化恢复能力有所帮助。这一社区聚集了众多评估人员、项目经理、受助方和政策制定方，所关注的内容是如何在东南亚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后进行适应和恢复性工作。通过全体东南亚国家内的在线交流、现场聚会和社区会员提供的辅导、讲授与训练，资源和经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分

享。

着手不对称问题

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网络的建立和巩固，并着手在各地开创地建立地区性机构，用以训练、教授和辅导评估人员，并促使其与其他地区的评估人员结成伙伴关系。通过这样的平台和网络，洛克菲勒基金会期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评估人员重新平衡选择和机遇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从而有效地控制其所在地的评估进程，并且通过与全球优秀评估人员的合作，提高其自身的评估质量。

例子之一便是非洲评估协会(Af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这家覆盖全非洲的伞状组织下囊括了全非超过 25 家的国家级监督与评估协会，并为尚没有国家级评估系统的地方个人提供帮助。

创新方法与手段

传统的评估方法与交流、反馈手段已不能和科技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相匹配。尽管科技的大幅进步、交互性的网络平台和多媒体工具使得来自受助方的实时反馈得以实现，但今天大部分的评估工作还是通过纸面来完成。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合作者在一个名为 Ushahidi 的项目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个开源项目能让使用者通过移动设备发送紧急信息，用以在地图上标注暴力行径。有感于此类工具在评估信息民主化、提高透明度和降低个人分享信息所遇障碍的潜力，洛克菲勒基金会目前支持了一系列创新的评估手段。

例子之一是“全球捐赠”组织(GlobalGiving)的“故事讲述”(Story Telling)计划，这种创新的方式收集发展中国家人们的信息，并在社区和执行机构间发布，并能让捐赠者实时发回反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全球捐赠”成功地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架构了一个网络，在数以千计的人群中收集了 2 万余条故事，不少该组织的合作方都从这些故事中找到了行动的灵感。

(本文作者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朱迪思·罗丁等)

欧文基金会

过去 6 年中在工作评估中的收获

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相比，私人基金会有他者不可比拟的自由度，在追逐自身使命的同时而不受各种限制。这种自由也可能成为一种挑战，因为没有外部力量可以驱使基金会去达成结果。如同《有成果的公益》一书中写道：“在公益界，‘杰出’二字任凭自己所赐。”这种现实促使我们做出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工作框架——基金会工作评估框架——来帮助我们评估詹姆斯·欧文基金会(James Irvine Foundation)的工作。

工作评估框架

2003年的一项重要策略性规划使欧文基金会简化了项目关注点并创立了新的工作评估手段。在这次详细的回顾和规划后，我们更新了使命陈述，并且将原本六项关注领域减至三项。

在确定了关注领域和目标后，我们将注意力放到如何测量和评估我们的工作进展上面来。我们召集了一个包括董事会成员和基金会员工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这一工作，耗时数月研究了其他基金会的优秀做法。然而，我们意识到，极少数基金会有关于工作评估的详细方法，所以这成了欧文基金会为这一新兴领域开拓新鲜想法和方法的机会。

在基金会工作评估仍处于萌芽阶段的情况下，我们推出的“工作评估框架”对六个方面进行关注——前三个聚焦我们的项目工作，后三个则将视野放大到机构范围。包括：我们项目领域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向项目目标做出了什么样的进展？我们的项目工作经验如何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工作手段？基金会如何在这一领域践行它的领导功能？关键的利益相关方如何看待我们，他们的看法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如何在财政健康和组织有效性进行测量？

演变、调整与改进

我们的工作评估框架从采用来自董事会的反馈演变至创建和采用年度工作报告。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演变是改变议题的次序和重要程度。评估框架最开始主要回顾报告年的新增拨款，但后来我们重新进行调整，将关注重点转到对在此之前所拨出款项的进展和结果上面来。我们将每年拨出款项的汇总以附件的形式放在年度工作报告末尾，但我们更倾向于用季度报表的方式提醒董事会成员最近所做的款项批准。

创立工作评估框架的重要之处在于把基金会的工作以整体对待，而不是零散的各部分。正是这种全局性的审核才促使我们做出这份按话题进行的报告，而不是按一个个的项目。

评估报告的读者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寻着我们工作评估报告的阅读对象。我们年度工作报告的主要读者应是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这份报告是每年我们与董事会进行深度探讨时所递上的基础衡量物之一。在评估框架几经演变，并且参考了董事会的意见后，我们又确定了另外的三方读者。

我们的员工，尤其是项目员工，是评估报告下一位重要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评估过程和结果中有所收获。年度工作报告实际上是一项对我们持续性策略制定和修改过程的定期检查，我们对工作的评估能够将项目员工凝聚至目标和成果上面来。我们发现工作评估的不足之处通常都是我们工作策略需要修改和精心设计的部分。撰写年度工作报告的过程也帮助我们发现现有的进展对将来的工作有何种预示作用。

在这两组内部读者之外，我们认为对年度工作报告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的受助方和其他资助方理

解我们如何定义该项工作的成功。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更认为这种理解能够促进各方对于共同目标的迈进。

公众则作为我们的第四组读者。我们在面对公众年报中加入了更多的工作评估信息，并使其方便地被公众获取，希望能以此方式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公益在社会中的角色。

（本文作者系欧文基金会主席詹姆斯·卡纳雷斯等。欧文基金会成立于 1937 年，致力于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百姓谋求利益）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test.gongyishibao.com/gongyi1/ttxw/201302/ffd9072a25734c6eafb7026a9cba0ce5.shtml>

[【返回目录】](#)

视觉春天：给穷人更好的视觉

全世界需要佩戴眼镜的贫困人口数量惊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发展中国家，共有大约 5.17 亿人由于得不到视力矫正治疗而视力受损。

而据牛津大学的发展中国家视力中心估测，这个数目应该更大：约 10 亿人没有得到必要的视力矫正。有个简单、古老而经济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戴眼镜。然而，贫困地区的穷人往往买不到或买不起眼镜，无数人因此不能充分发挥其潜能。

创建于 2001 年的“视觉春天”（VisionSpring）是致力于解决穷人视力障碍的非营利企业。每年，“视觉春天”平均售出 20 万副成品眼镜。它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并创造机遇。

吸取百家之长的新型企业

1984 年，还在波士顿进修验光配镜专业的乔丹·卡萨罗（Jordan Kassalow）志愿到墨西哥农村帮助当地的数百位近视患者。那里许多视力低下的人因无钱购买镜片，从而难以找到工作。卡萨罗认为，70%需要佩戴眼镜的人中，一半以上可以用药店里购买的现成镜片应对日常生活，这使他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们不能培训当地人来销售这种眼镜呢？”

17 年后，卡萨罗和朋友贝瑞（Scott Berrie）共同成立了一家非营利机构——视觉春天公司。最初，它只出售老花镜。

公司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是因为远视会严重影响经济生产，而且 75%的视觉障碍问题都是远

视。“视觉春天”旨在打破眼保健专家的垄断，使老花镜真正成为消费产品。

随后，“视觉春天”开发了新的商业模式，采取类似于玫琳凯的营销模式，上门为乡村居民提供基本的验光服务和成品老花镜。在评估了多家供应商之后，管理层认为中国是性价比最高的供应商。而为了接近乡村群众，“视觉春天”则训练当地妇女——“视觉企业家”们，让她们作为独立的特约经销代表，到村落中去销售老花镜，每副的价格不足4美元。视觉企业家使用视力表，对村民进行基本的检测，以确定镜片的度数。公司为她们提供销售包，这种销售包称作“口袋生意”，其中包括老花镜、验光工具、营销材料以及整套的制服。视觉企业家需要接受为期三天的训练，内容包括基本的眼保健和商业管理知识。

为扩大其在全球的覆盖范围和运营规模，公司还发展了基于按件计酬的授权经营模式。其销售套装被分发至其他非营利和营利组织，如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机构等。

采用批发销售模式，“视觉春天”将其老花镜散发至都市和乡村中心的药房。如今，“视觉春天”利用9000名女性的销售网络，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共11个国家发起了这项活动，但其最大的市场在印度。2008年，它售出了98,000副眼镜，2009年售出了201,000副，连续五年销售量翻番。公司认为，很大部分增长源自特许经营和批发销售模式，公司计划将这种模式扩展到其他国家的大型分销网络。

2010年，“视觉春天”的年收入约为29万美元，公司的运营仍主要依靠慈善捐款，这一年它们筹集的善款就高达170万美元。但卡萨罗瞄准的是更高的目标：建立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企业。他说：“我们将收入及外来的善款都用于寻找一个能成规模同时能赢利的业务模式。”

从慈善向商业转型

“视觉春天”风光背后却是一段长达10年的“赔钱”史。

2005年，卡萨罗给公司“视觉企业家”们配备了产品套装，内含30副中国制造的太阳镜，每个套装的成本是75美元，平均每副2.5美元。这些“视觉企业家”可以卖到4至7美元一副（她们先付10%的款项就可以拿走产品，剩余的钱未来再支付）。但她们在找遍了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后，很快就没有了新的客源。而且，从经济上看也是行不通的。制造、装运、销售培训加上曼哈顿总部日常办公的费用，“视觉春天”公司的成本价已达到20美元一副眼镜，平均每副亏损17.5美元。当时，卡萨罗说：“我们是一家非常好的慈善机构，但不是个好企业。”

3年后，卡萨罗决定与孟加拉的全球性小额信贷机构BRAC联手，后者也聘用妇女销售保健类的商品，如邦迪创可贴及阿司匹林等。卡萨罗发现BRAC8万多人的销售队伍可以帮他迅速扩大销售规模，同时又可以省去培训和管理的费用。2008年，视觉春天公司以每副眼镜1.7美元的价格销售了9.8万副眼镜（BRAC公司享受了批发折扣），但仍然平均每副亏损9.3美元。一年后，销售规模达到

20 万副，每副批发价 0.95 美分，亏损 7 美元。按此费率算，卡萨罗需要销售几百万副眼镜才能做到盈亏平衡。

2010 年，卡萨罗开始关注另外 50% 需要更好的眼镜而不是普通阅读眼镜的顾客，于是在 2 月份开办了萨尔瓦多分店。配制眼镜的售价为 15 美元，每副眼镜能赚 4.5 美元，女销售员每介绍一位顾客可以获得 1 美元的提成。卡萨罗表示萨尔瓦多店(开店加现场销售)在 2010 年赚了钱。

为了进一步减少现金支出，卡萨罗与一些已发展成熟的品牌进行易货交易，包括清晰视界(ClearVision)及 FGX 国际公司(FGX International)。FGX 国际公司已经以较大的折扣价卖给视觉春天公司 1 万副阅读镜，其首席执行官泰勒(Alec Taylor)说：“视觉春天公司在帮我们开拓市场。无论是用 5 年、10 年还是 15 年时间，人们最终会了解这个产品。”而到那时，卡萨罗的梦想也已实现。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302/147143.aspx>

[【返回目录】](#)

Professor H. I. Latiffee: 全球化语境下的格莱珉模式

小额信贷(Microfinance)是一种主要以城乡低收入阶层为服务对象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方式。小额信贷旨在通过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型企业提供获得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促进其走向自我生存和发展。它既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又是一种扶贫的重要方式。此文为 2010 年，洋葱与主管格莱珉模式全球化推广的 Grameen Trust 的负责人 Professor H. I. Latiffee 的访谈记录。)

Grameen Trust (以下简称为 GT) 致力于将格莱珉模式向世界推广以促成格莱珉的使命——消除世界贫困。他们站在资讯的最前沿，凭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向全球各种规模的认同格莱珉理念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培训以及技术支援，为相关问题关注者构建了一个国际化交流平台，同时亦以各种形式亲身参与到各发展中国家地区以促进贫困问题的解决。Grameen Trust 的总部主管 Professor H. I. Latiffee 就格莱珉模式在全球，尤其是中国的推广问题接受了洋葱的简短访问。

经济危机：机遇与挑战并存

Latiffee 教授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对小额贷款业务的影响。一方面，就 GT 的业务推广来看，经济危机意味着各个非营利性微贷机构的资金危机。尤其是对于那些新兴的主要依靠捐赠作为起始资金的机构来说，这样的打击有可能是致命的，他们必须有一个更健全灵活

的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规避危机。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受全球范围内经济动荡的影响，更多的个人陷入了经济困境，那么就更加需要灵活的小额贷款项目以帮助个人度过危机。在这一点上，GT 和全世界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微贷组织的任务是要与那些想借机大发横财的高利贷的机构竞争，去真正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群。

格莱珉在汶川：秉持信念，应对挑战

Latifee 教授以 GT 即将在 2010 年底于四川汶川开展的小额贷款业务为例详谈了格莱珉模式的复制问题。汶川项目会在 GT 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合作下展开，以小额贷款公司（MCC）形式注册，受政府主导的小额贷款行业协会（MCG）的监管。

在组织形式上，整个汶川项目并没有进行太大的为适应“中国特色”而进行的调整，而是将基本复制格莱珉模式。来自孟加拉的核心工作人员将与四川本地员工一起从基层筛选客户做起，帮助客户组成五人互助小组，再根据人数成立中心管理小组业务，由支行统管，逐项逐层审批贷款。就贷款业务而言，除了针对个人的传统小额贷款，亦会加大对小型企业的贷款扶持。此外，Latifee 教授亦委婉表示他们会尽力保证整体贷款业务的独立性。

至于为什么选择四川汶川作为格莱珉中国业务的切入口，Latifee 教授强调了格莱珉的一个重要理念——“帮助最需要的人”。GT 注意到政府主导的汶川震后重建工作多数只在道路房屋建设等宏观领域，尚未细节到个人的帮扶计划，GT 有责任与义务去帮助最基层的民众。此外，汶川地震让四川政府意识到 NPO 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在政策方面给予了 GT 很大支持，这是此项目能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

谈到四川项目的主要困难，Latifee 教授首先幽默地指出没有“困难”，只有“挑战”。他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GT 做的都是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摸索出适宜的推广方案，而这些经验也正是 GT 能够与更多其他微贷机构分享的宝贵财富。

他委婉地指出主要的“挑战”在于 GT 在与中国官僚体制交流沟通。他说，格莱珉模式在孟加拉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能够保持与政府的相对独立运作，但是这在中国显然不太可能发生，尤其是在格莱珉的主要业务涉及金融这个颇为敏感的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去沟通……你知道，有的东西不能妥协。”他微微一笑却目光坚定，“但是我们毕竟做到了。”

社交媒体：行胜于言

谈到社会媒体的角色问题，Latifee 教授一再地强调“行胜于言”的理念。他先谈了社会媒体的宣传效应。他表示 GT 当然综合利用了各种网络媒体进行宣传工作，最直观的一点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实习生、志愿者帮助 GT 翻译各种业界相关资讯到各种语言，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有机会对小额贷款有充分认识。但是他更加着重强调没有实际成效的空洞宣传只会适得其反，“你必须要有成果让别人

能看见”。

他同时也指出网民并不是格莱珉最重要的客户群体，他们的客户群体在农村、在城市的隐蔽角落，而这些人未必是网络的常用户，而且他们参与微贷项目的最大动力是来自他们能够看到的实实在在的改变。所以 GT 的网络宣传重点只是向全球各地的微贷从业人员以及对贫困问题关注的个人、组织展示格莱珉模式的成效，探讨更多关于贫困的话题。

针对 Kiva 等 P2P 微贷平台对全球化小额信贷业务的影响，他指出，只要这些平台是以根除贫困为使命目标，GT 就认为他们是伙伴而不是竞争者。当然，这些平台的兴起确实对格莱珉以及其他微贷组织的基层业务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他们很难控制用户在参加格莱珉小额贷款的同时亦从网络支取第二份贷款，而并不是每一个用户都能承担两份贷款的还贷压力。他们已经在基层进行了关于此类问题的宣传调查，鼓励用户只参与一家机构的贷款项目。他也提醒到：“不过这种方法在孟加拉还不算普及，要知道我们的网络还不是那么发达。相信很多真正需要微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

来源：创思客

地址：<http://www.thinker360.com/page/3723>

[【返回目录】](#)

TOMS SHOES-买一捐一背后的隐忧

TOMS SHOES 是一家成立于 2006 年的“社会企业”。他们最大的卖点不是鞋子，而是鞋子背后的“慈善”——顾客每购买一双鞋子，TOMS 就会向贫困地区的儿童捐赠一双新鞋子。截止 2010 年底，他们已经送出了一百万双鞋子。

为什么要送鞋子呢？TOMS 自己的理论是，A. 很多贫困地区的儿童没有鞋子穿 B. 没有鞋子穿是人们感染肠道蠕虫类疾病(soil-transmitted helminths)的重要原因 C. 没有鞋子穿会很容易受伤 D. 孩子们不能上学因为有的学校要求一定要穿鞋子才能上学。综上所述，送鞋子就变成了 TOMS 的至高使命。

听起来是不是充满了爱心？是的。可是这样就够了么？当然不是。事实上，TOMS 的这种模式背后隐忧重重，不但是不能够满足当地的实际需要，还有可能对当地产业链条产生恶劣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人们树立了一个不靠谱的榜样——只要凭着一腔热血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改变世界，以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捐赠”就是解决问题的终极办法。

TOMS 的理论站不住脚

首先，贫困地区的儿童到底有没有鞋子穿？他们最需要的到底是不是鞋子？针对这个问题，一个名为 A Day Without Dignity 的倡导活动号召 TOMS 鞋子发放地区的普罗大众、发展项目工作者站出来讲述他们与“捐助”之间故事：

有人在乌干达十五所学校里访问老师同学们的需求，他们需要清洁的饮用水、节能炉灶、更懂得教书的老师，没有一个人说他们需要的是鞋子。

有人研究了非洲马拉维 Malawi 地区的鞋业市场，发现市场上分明就有不同价位不同质量的鞋子供大众选择，从超级便宜的中国塑料鞋到昂贵的欧洲皮鞋都有得选。人们不是没有鞋子，而是没有钱去买昂贵的鞋子。所以重要的是解决就业等经济问题，而不是送鞋子。

有前任 Peace Crop（和平队）成员从医疗健康角度仔细说明送鞋子和改善贫困国家医疗问题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而且这是最没有效果的方案之一

其实就算只用常识想想，如果一群人跑到你的村子里告诉你只要穿上他们的免费鞋子就会找到打破贫困圈、改善卫生条件、提供教育机会的金钥匙。您会相信么？

大额捐赠会干扰本地市场

TOMS 捐鞋子这件事除了没什么用之外很可能对当地市场的供求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道理很简单，在本地消费者面前，一边是免费的的国外衣物，另一边是普通的本地产品。前者的吸引力当然不容小视。

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样不是很好么，低收入人群可以免费得到质量不错的国外商品。可是问题是，他们低收入的原因是人们没有过得去的工作。对于技术知识水平普遍较低的人群来说，本来在制衣工厂工作可以是一个选项，但是服务本地的制衣工厂在国外免费物资的挤压下步履维艰，根本没有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能力。本地失业率不断上升，人们越来越贫困。人们看起来越贫困，越多的国外物资又再度涌入当地市场。恶性循环就这样产生了。

根据 Garth Frazer 一份名为 Used-Clothing Donations and Apparel Production in Africa 的调查显示，1981~2000 年期间，非洲国家制衣业生产力下降的情况有 40% 要归咎于不负责的二手衣物捐赠行为（即使 TOMS 捐的是新鞋子，从影响上看也是没什么差别的）。而另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请问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是靠接受别人的捐赠从此摆脱贫困走上自立自强之路的？

捐赠是不划算的投资

当然，关于国际物资捐赠对当地市场的影响在经济学界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即使我们假定 TOMS 这类的捐赠行为对当地市场秩序没有大坏处，但这也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怎么讲呢？TOMS 的鞋子售价在\$38~\$79 之间，在帆布鞋界算是贵的。我们姑且算 TOMS 鞋子

的平均价是 58 美金，也就是说其中的 29 美金是为了那另一双捐赠的鞋子支付的。如果要为一个有一千名学生的小镇提供鞋子，也就是消费者们要花掉 29,000 美金。就算他们的鞋子质量再好，能穿两年已经是极限。那么也就是说，花 29,000 美金，能让 1000 个儿童在两年内各有一双鞋子穿，从而降低感染肠道蠕虫病菌的几率（这一点是 TOMS 一直反复重申的直接效果）。

而另一种降低肠道蠕虫病菌感染几率的方法是修建卫生条件良好的厕所。乐施会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建一个合格厕所的花费是 52 美金。正常情况下，一个厕所可以使用 25 年。那么 29,000 美金，可以建 557 个可以用 25 年的厕所。相比劳心费力送鞋子，难道不是后一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当地卫生水平么？

其实 TOMS 是一直声称他们只送鞋子到有需要的地区。而且随着捐赠模式的改变，他们也在努力与当地机构开展配套的医疗、教育项目。力求做到从实处送出帮助。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送的那双鞋子真的那么有必要么？把钱花在刀刃上岂不是更理智的选择？

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 TOMS 的网站上，有这样一句标语——” Giving is what fuels us. Giving is our future”。听起来很有感召力也没什么错。但是，同是 Giving，是送一双鞋子靠谱呢，还是送一个未来更靠谱？

是不是永远不要再支持类似 TOMS SHOES 这种买一捐一的模式了？未必。但是我们的确应该在盲目当做潮流支持这类活动之前想想这些噱头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不能，怎样做才会更好。

是不是永远都不要捐衣捐物了？当然不是。您当然可以捐，但是您应该根据需要捐赠。假设某地遭遇大型自然灾害，冰天雪地之中人们急需保暖的衣物，那你大可以通过有公信力的机构把你的羽绒服送到人们的手中。您还可以换个方法捐。比如到善淘网上去捐，把二手物品变作更实在的善款，投入到靠谱的长期公益项目中去。

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对这篇文章有什么回应，不妨留言加入讨论。本文也仅是一家之言，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就再欣喜不过了。

来源：创思客

地址：<http://www.thinker360.com/page/3721>

[【返回目录】](#)

◎企业社会责任

2012CSR：入春

当1916年芝加哥大学的克拉克教授提出“我们需要有责任感的经济，并且这种责任感要在我们工作的商业伦理中得到发展和体现”时，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声呼吁响彻了现代社会，经过近百年的争论、博弈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CSR)理论逐步被接受，成为一种新商业信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及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至2012年，CSR进入中国刚好经历了一个生肖的轮回。社会各界已经越来越熟悉这个词汇，同时它经常被解读、被误解，一切真的、假的、外部的、内部的凑在一起，造成CSR的关注度在过去5年持续温热，在2012年CSR终于算入春了。

春暖——

首先，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2012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已达历史新高的1006份，而且未来还将持续自2006年以来的“井喷式”增长。同时，落户中国的500强公司中有近一半的企业开始发布国别版报告，回应中国利益相关方期待。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手段，CSR报告一直被政府及监管方强推，要求上市公司和大型央企必须发布。虽然目前报告水平优劣不齐，但持续的发布对于公众了解这些企业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作用。让人特别鼓舞的是看到不少非上市的民营企业也积极发布CSR报告，梳理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并用报告与利益相关方展开沟通。

其次，企业及企业家发起设立基金会的热情高涨，截至2012年年末，企业基金会的数量已达300家左右，迄今两家原始资金最大的基金会发起人均出自企业和企业家。蓬勃发展的大势下，基金会已被人视作时髦之物，而已身在其中的企业基金会却为安身立命之道小心探索和求证。参照国外企业基金会的发展，我们既看到中国企业堪比美国企业的公益热情和回馈社会的责任感，企业基金会引领了更多企业开拓企业社会责任及社会参与的新天地。同时发现多数企业对于如何进入这片天地，以及进入后如何大展拳脚，仍有很多疑问。其中，企业基金会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融合之道尤为关注。

同时，伴随着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的独立成篇和“美丽中国”的首次提出，绿色发展与转型成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本年度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关键议题。近年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面孔越来越多，企业和NGO组团参加更是蔚然成风。NGO参会的目的是为了发声，与之不同的是，企业领导人都是带着问题去参会的：环境和发展之间是否有通行的桥梁？可持续商业发展的前景是什么？国内著名环保组织阿拉善SEE基金会秘书长刘晓刚率队在参加德班会议后，对此深有感触。她觉得如果可以协助企业尽快踏上绿色发展之路，将是最大的公益。2012年1月2日赶在北京的第一场雪前，她邀集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业组织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和上百名企业

家启动了“中国企业绿色契约”，一个以服务企业绿色发展，推动企业绿色实践为己任，以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企业家为主体的自律平台。

在企业家主动求学问道的背后，我们看到环境和资源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坎。节能减排逐步启用市场机制，碳排放、水资源利用都将计入成本，消费者权力意识觉醒和员工基于价值观的选择，资本向绿倾斜，日益严苛、细化、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绿色实践促成行业领先的示范效应都迫使企业重新思

考发展模式。2012 年 8 月香港交易所公布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对于信息披露明确提出了定量绩效指标，其中就包括了环境排放物，并计划至 2015 年前由“自愿报告”发展至“遵守或解释”制度，由此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走向 KPI 之路。

另外，员工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成为 2012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一道风景线。一项由 VSO(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北京代表处)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联合进行的“中国企业志愿服务研究”调研显示，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鼓励员工参与志愿服务。花钱让员工去义务服务，已成为企业做公益的一种趋势。

前些年还在纠结企业该不该为员工志愿者活动买单的公司，现在已悄然转变观念，通过设立公益假期、内部志愿者激励基金、开通员工志愿者网站和简讯大力推动员工参与志愿服务。从前都是跨国公司在推员工志愿者理念，现在民营企业的提倡力度上有超过之势。2012 年 4 月 17 日，腾讯公司发布了员工公益假期计划，开了企业公益假期的先河。几乎一时间所有的企业在提及自身 CSR 表现时，都会说到员工志愿者，从前的“副业”有变成“正业”之势，当然其中既有经济不景气之时企业直接捐赠数额削减之因，也有企业改变社区参与方式，重视利益相关方沟通的考量。随着志愿精神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这样内外兼顾的企业责任践行方式还将更加丰富和多元。

最后，业内一直呼吁的 CSR 经理人培训终于在 2012 年盼来了开学。北师大开了“社会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MPA 班的消息令很多在岗的和待岗的 CSR 人备受鼓舞，因为长期以来 CSR 人才的短缺和培养的严重滞后影响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专业化、科学化管理水平。目前这个职位的人都是半路出家，完全靠自学成才。虽然也有一些咨询机构和瑞典使馆开设了短期学习、交流参访班，但仍不能系统地讲授 CSR，满足不了提升的需求。目前北师大的“社会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MPA 班还属于试点阶段，毕竟学院培养 CSR 经理人仍需要探索，但它释放的信号让人对行业未来发展有了一定信心，春天来了。

春寒——

作为一种与传统商业价值观截然不同的商业信仰，CSR 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最先只能得到少数人的青睐，接受它与实践它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在中国，CSR 仍要面对料峭春寒。

其一，企业社会责任仍然是少数大企业关注的事情，同时自愿和自主性有待提升。相比较政府及监管方的大力推进，企业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性还够，很有些强按牛吃草的感觉。

其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整体不足，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融入战略发展的企业不多，有目标，但无管理机构，也没有管理制度保障落实者居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与品牌传播日益结合，却对企业运营实际影响较小。纵观众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责任治理的部分千篇一律或语焉不详，披露

CSR 战略的更是寥若晨星。君不见 2012 年夏天以来周鸿祎剑指百度垄断市场，成为假医疗广告集中地，缺乏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竟挑得百度股价连连下跌。其实百度在 2009 年即起意制定了 CSR 战略，但一直未进入核心运营，现已成百度软肋。

其三，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公益的认识仍占据一定市场，并且有将错就错，长此以往之感。现在不少热闹的 CSR 评选徒有虚名，而且把公益仅限于捐赠。由此就不难理解，今年身陷“胶囊门”的修正药业竟然在某一国家级媒体主办的评选中获得 2012 年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杰出企业称号。

其四，战略性公益少之又少，多数企业的公益行为还属于“行善赚钱”，而非“赚钱行善”，同时多为追求公关效应而做的短期活动。它体现了企业对公益理解过于狭隘、视野不够开阔和战略高度不足，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公益慈善还处于“不是不愿意，而是不会”的状态，价值观营销需要更多智慧。

有人根据年度捐赠额来说 2012 年是中国“公益小年”，对于 CSR 在中国来说它却是入春元年，历经 12 载，引领众多企业成功中找到新商业信仰，如今千舟已过万重山，终于迎来春意。2012 年中国企业站在历史的节点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相信对于责任的思考和回应将开拓新的 CSR 发展路径。

来源：社会企业家博客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dcef4b0101f2fj.html

[【返回目录】](#)

发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

研究人员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环境、社会的贡献。

“我个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逻辑，应该是社会对企业期望的提升和企业对自身功能认识的提升相一致的结果。”全球契约中国网络秘书处副主任李伟阳介绍说，企业绝不应该简单地视为股东实现其利润目标的营利组织。“企业是社会的，必然会回归和融入社会。”他强调。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李伟阳举例说，根据调查，有83%的日本国民认为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与健康、质量、性价比、环保性等。“这是一个认同程度非常高的调查结论。”他说。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

据专家介绍，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经历了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我国企业开始逐步重视起社会责任问题。此后，一些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开始对社会责任进行系统的介绍和广泛的研究、讨论。政府部门也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现在，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到来。《WTO经济导刊》副社长殷格非表示，2012年，中国社会责任报告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企业、社会和政府共同发展的新时期。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责任发展的新里程碑”。

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程中，广受关注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众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吸引劳动力资源，激励他们创造更多的价值，并由此获得美誉度和信任度，从而实现企业长远的经营目标。

其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技术革新可首先减少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同时也可以降低能耗，节约资源，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这将有助于缓解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间的矛盾。

此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有助于社会公平。一方面，大中型企业可集中资本优势、管理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开发贫困地区的资源，既可获得新的增长点，又可弥补贫困地区资金的不足，解决当地劳动力和资源闲置问题。另一方面，企业也可通过慈善公益行为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事业，提升企业的形象和消费者的认可程度。

他山之石

美国英特尔公司：重视保护水资源

英特尔投资了超过一亿美元用于水资源保护计划。该计划帮助节约的水足够装满 4615 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在英特尔中国大连芯片厂，其生产设备密闭冷却系统设计能使水资源的再利用率达到 87%，大大减少了工厂从市政供水管网中补充水的消耗。

德国巴斯夫公司：分享环境数据

巴斯夫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很高的环境标准，力求通过规模经济达到领先的环境标准，并协助减少全球碳排放总量。其生产基地一直与周边相邻社区保持联系，共同分享信息并回馈他们的要求。例如，巴斯夫与临近上海巴斯夫应用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的社区分享了详尽的环境数据，成为政府环境监测数据库的一部分。

瑞典宜家：供应链上的责任管理

宜家的潜在供应商在与宜家正式建立商业关系前，必须符合启动要求：无强迫性或束缚性用工，无童工，不使用来自国家原始森林或具高保护价值森林的木材。向宜家提供实木、单板、胶合板、单板层积材、竹子和藤条的供应商，必须确保完成这些原材料的来源追踪。

来源:和讯网

地址: <http://news.hexun.com/2013-02-27/151515910.html>

[【返回目录】](#)

博世中国慈善中心发布慈善项目三年计划

未来三年实施博爱、职教、扶贫、社区四大慈善工程总计 40 个慈善项目，覆盖中西部约 13 个省份

通过推行教育与扶贫结合的公益模式，从根源上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脱贫

“博世职教工程”支持职业教育，帮助贫困学生掌握就业技能

近日，博世中国慈善中心正式发布 2012-2015 慈善项目三年计划，即在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三年期间实施“博世博爱工程”、“博世职教工程”、“博世扶贫工程”、“博世社区工程”四大慈善工程总计 40 个慈善项目，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与扶贫事业。项目将覆盖约 13 个省份，其中 13 个项目已于 2012 年启动。

“长期以来，博世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致力于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此次发布的在华慈善项目三年计划正是这一企业发展战略的有力体现。”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陈玉东博士表

示，“教育与扶贫是博世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密切关注的两大领域。博世紧密跟随国家扶贫发展方向，希望通过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事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秉承公司创始人罗伯特·博世先生的慈善理念，以企业发展的自主性和财务的独立性为坚实基础，博世始终高度注重全球业务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了更好地在中国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博世于2011年成立了“博世中国慈善中心”，作为其在华慈善项目的运作主体。自成立以来，博世中国慈善中心相继启动了博世校园助学金计划、博世四川希望小学、博世爱心育苗助学金等慈善公益项目，支持高校、贫困受灾地区以及社区贫困学生的教育发展。在项目落实过程中，博世与受资助院校、当地政府等多方共同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明确各方职责，建立监督机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资助资金的合理运用。

博世中国慈善中心四大慈善工程简介

博世职教工程

“博世职教工程”通过资助职业学校贫困学生、提供实习机会、选拔优秀毕业生就业、奖励优秀教师、提供专业汽修检验设备等方式，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该工程旨在鼓励欠发达地区职业院校学生掌握生存技能，同时也为制造业尤其是汽车行业储备优秀的一线人才。目前，博世中国慈善中心已在广西河池市、贵州丹寨县等地启动了“博世励志班”试点项目，为该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积累经验。

博世博爱工程

“博世博爱工程”致力于改善欠发达地区中小学师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未来三年内，博世中国慈善中心计划在青海、甘肃、西藏、云南、陕西、新疆和四川等七个省份各设立一所“博爱小学”；在先期试点成功的情况下，在宁夏21个县各选一所中学或小学开设“博爱食堂”；在河南南召一中建立“博爱图书馆”。

博世扶贫工程

博世中国慈善中心通过“博世扶贫工程”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NGO)的社会发展研究项目，并在国家连片特困地区选择合作项目，致力于改善当地生态环境。2012年，博世参与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该项目包括营养干预及学前教育两部分。第二周期试点将继续在青海、云南进行，并开展项目长期跟踪研究，以期推进国家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的制定。

博世社区工程

“博世社区工程”计划通过设立博世奖助学金、提供博世志愿者社区服务等方式，参与博世在华业务所在地的社区公益事业。预计到2015年，博世在华各事业部将建立志愿者组织并发展志愿者3,000人。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302/147141.aspx>

[【返回目录】](#)

媒体批肯德基做伪善公益

肯德基必须为其过错付出代价

在此次“速成鸡”事件中，知名连锁餐饮企业肯德基犯下了难以被原谅的错误。其过错至少有二：一是隐瞒不报，二是对公众撒谎。这两个过错之间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根据上海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公布的情况和相关媒体所报出的信息，肯德基在此前的自检中已经查出问题。可是，肯德基对这些问题只字不提，未能按照规定向社会及时通报。直到最近的表态，仍依旧显得一脸无辜。

肯德基是国际知名企业，在食品安全的保障方面如此无诚信，令消费者倍感失望，令社会舆论失望。说到底，肯德基为了一己私利，置公众食品安全于不顾。这不是一个跨国连锁企业的应有做派，也突破了一个企业公民的起码底线。

肯德基曾名列“中华慈善榜”，被视为热心公益的企业之一。可是，当一家企业连起码的食品安全底线都不愿守护时，则其所谓对公益的热心，就显出几分伪善来。比之这样的爱心，我们宁愿其守住底线。

有人说，肯德基一定不怕被罚，因为按照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企业在这方面的违法成本还很低。这句话不无道理。不过，比之有形的公开惩罚，更严厉的惩罚来自消费者的内心。受到伤害的公众将会用脚投票，除非整个社会都患上了失忆症。

肯德基将会为其所犯错误付出沉重代价。这些代价或有形，或无形，也终究会验证一个道理：任何不负责任的侥幸做法，一旦被公之于众，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后果。

在昨天（12月20日）的社论中，我们还在呼吁，期望知名企业在保护食品安全方面要有更大的担当。知名企业本应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要做践行社会责任的模范。现在看来，肯德基缺少这份担当，确实让公众失望了。

“速成鸡”事件还没有结束，但基本过程已经明晰。再次剖析这一事件，值得反思之处不少。

反思之一，监管制度必须防范所有的企业，没有例外。观察一个企业是否可能发生问题，不能凭其是否为“免检企业”，是否为著名品牌，抑或是否为上市公司。在那些貌似具有更多诚信的标签

背后，同样可能隐藏不少的猫腻。以前有些“免检企业”靠不住，出了事情；现在如肯德基这类著名品牌，同样靠不住，也出了事情。

反思之二，监管方面还可更进一步监管企业的后续作为。从“速成鸡”事件来看，相关部门已经发现肯德基的供应商有多批次产品抗生素不合格，对百胜集团收到自检样品有不合格的报告后，是否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要做进一步调查，如存在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情况，要从严处置。

人类常常无法基于社会公益等无私的动机来行事。很多时候，一个社会所期待的，是大多数人既利己也利人。但总有一些利益主体，只顾利己，不管他人——这就需要制度来防范。制度的设计，必须盯准人性深处的某种黑暗。

其实，有关养鸡场使用过量抗生素和激素，坊间一直都有传闻。这个问题不复杂，很多人都知情，也似乎将之视为潜规则而习以为常。但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当地监管部门必须尊重明规则，在整个事件中，主动作为还需加强。

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连“互相投毒”的状况都无法避免，谈什么提升幸福指数？对此，每一个食品工业链条上的参与者，确有义务为消弭“互相投毒”的乱象而尽一份力。如果不能发挥更大的能量，也尽量要做一支微细的蜡烛——“点燃一支蜡烛，驱散一片(哪怕只是一小片)的黑暗”。

反思之三，在食品安全监管中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倡导诚信经营，还任重道远。一个企业要想真正落实上述要求，既要靠外部的压力，也要靠内部的自省，要有忏悔意识。倘若外部压力不足，内在反省无力，则问题必将难解。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c12a052d01019oj7.html

[【返回目录】](#)

◎专题报道

盖茨这样做慈善

墨西哥城内的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位于城区西南，拥有大片绿地，素有“城市之肺”之称。公园又与著名的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相拥相邻，从人头攒动的墨西哥老城区来到此处，更觉神清气爽。

2月12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三的下午，我们从“城市之肺”南门穿过马路，来到附近的四季酒店。刚刚抵达墨西哥城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此接受了财新的专访。

（一）

58岁的盖茨今天引人注目，不仅在于他身为微软公司创办人和董事长的身份，更重要的还是在慈善业的宏大作为。从1995年到2007年，盖茨连续13年是《福布斯》评选的世界首富，他捐资创办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正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至2012年12月，基金会总资产已达362亿美元。

恰如当年从哈佛大学辍学创办发展微软公司，盖茨在慈善业的举动同样不同寻常：2006年6月，在将近51岁时，盖茨宣布将淡出微软管理工作；2008年6月，他正式从微软退休，全职从事慈善事业，并宣布已立下遗嘱，将把绝大多数个人财产遗赠基金会——其时，盖茨的个人财产总值约为555亿美元。

盖茨同时以成功企业家的财力和能力倾注慈善，深得大投资家巴菲特认可。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表示将把自己的慈善捐助注入盖茨基金会。如今，巴菲特是盖茨基金会的三名董事之一，其余两人是盖茨夫妇。

盖茨加巴菲特，成功的世界级富豪以其富可敌国的实力从事慈善业，且亲力亲为，将给慈善业带来什么样的新局面？这对中国正在悄然兴起、亟待提升的慈善业，特别是私人慈善业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

盖茨此次墨西哥之行，计划与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一起，参加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中一个新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

CIMMYT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创始于1943年，在1966年拓展为国际机构。盖茨与当今的世界首富斯利姆为其新研究中心联合出资2500万美元。新中心主要研究种子的基因特征，旨在为CIMMYT的种子库增加适应不同环境要求的良种供世界各国选用；而盖茨基金会已有计划，将改良的种子用于对非洲和南亚等地的农业扶贫。

盖茨此行亦有联手斯利姆，更多从事慈善之意。

盖茨在筹划基金会时，曾对美国最有影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做过多次考察，与小洛克菲勒的会面就达七次之多。盖茨基金会设定的关注领域，着眼与其他慈善基金会的配套、补充或加强，其国际上重点是健康和消除贫困，在美国国内则是教育机会均等。

有针对性地推动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在盖茨看来正可以帮助穷国的小农户提升生产力。

到目前，盖茨基金会运作的项目覆盖 100 多个国家。其中，每年大约 15% 用于美国国内，60% 用于海外医疗卫生事业，20% 用于全球发展——包括 10% 用于农业扶贫。

（三）

或因常有日光浴，盖茨的肤色黝黑，略显清瘦，神色中带着刚下飞机的疲倦。他穿深灰色西服套装，戴有小红点的浅棕色领带，很随和地过来和我们握手，采访结束时还一起合了影。我们并坐在长沙发上交谈。他听到提问反应很快，滔滔不绝，说话时则直视前方，配合语言有手势和身体的动作，情绪饱满。

盖茨显然总是在思考中。从企业而转至慈善业，盖茨基金会该做些什么，他总在想。

话题从农业开始，很快转入中国，再转入他对于慈善项目如何建立信用、提升效率的思考——就在 1 月间，盖茨刚刚发表了他的年度公开信，其核心就是必须加强对慈善项目的结果考量，这一话题自然成了采访的重点。

预定的采访限时到了，记者抢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高科技背景，还有你成功的企业家经历，哪些对你今天直接从事慈善事业帮助最大？

他笑了。他告诉财新，他觉得对新科技的理解力，和组织能力相结合，对于他从事慈善业的确很有帮助。

高效慈善何来

“要让慈善组织高效，首先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还有对达到目标各个步骤的实际效果的衡量标准”

慈善业的效率总是引人关注。

自上世纪初至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结社浪潮，全球慈善事业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往昔个人扶弱济困的自发善举，转变为以组织化、公益化为标志的现代慈善事业。慈善事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模式正在更新中，盖茨基金会就做出了诸多尝试。盖茨本人曾反复强调，要高效利用有限资源。而创新、企业化的管理，就是打开公益事业效率之门的钥匙。

2009 年起，盖茨每年初都发表公开信，阐释和分享在慈善公益方面的思考和规划。2013 年的年信中，盖茨对其在 2010 年提出的结果考量管理手段做了全面阐释。他指出，历史上，外国援助总是

以投资的金钱总额来衡量，而非以帮助人民的实际效果为标准。他担心，“如果一项革新——无论是新疫苗还是改良的种子——不能触及未来受益的人群，它就无法产生影响”。这一看法，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财新记者：你在年信中强调结果考量对慈善业的重要性。在你看来，慈善中的结果考量和商业的结果考量有何异同？

盖茨：主要有两大不同。第一，在商业领域对结果的考量是如何提高利润，而政府和慈善组织并不将盈利作为主要目标。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

第二个不同是，企业能否吸引到人才和能否获得投资，都取决于盈利能力。如果企业不成功，获得的资源就少。而在慈善部门并没有这种直接反馈。在商业世界，如果一个公司缺乏效率，很可能会消亡。但是在慈善业，即使效率不高也可能继续运营下去。

要让慈善组织高效，首先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对达到目标各个步骤的实际效果的衡量标准。这方面慈善组织在逐渐提高中。例如在卫生领域，在统计死亡率、疫苗接种率等方面，我们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力求能够建立对结果的衡量。从效果而言，卫生项目的效率和认知度都提高了很多。举例说，小儿麻痹症的根除就是因为我们在结果考量方面做得不错，不断寻找提高效率的方法。

财新记者：商界搞结果考量，有约束和激励机制，最终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在慈善业，靠什么样的机制，能使人们更看重、从而更积极地进行结果考量？

盖茨：政府和慈善组织面临共同挑战。他们都没有类似企业的、基于盈利能力的直接反馈机制，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

在政府项目方面，可以将一国的情况与别国相比，可与历史情况比较，可以向私人领域学习并吸引人才。

当然，很多事情是慈善业能做而商业部门做不到的，甚至政府也做不到。商业部门不会重视贫困人群的需求，因为他们在市场中的声音很弱，只有慈善业才会关注，并以创新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在结果考量方面，我们只需要保证不比商业部门差很多就可以了。

财新记者：你既是成功的商业领袖，也是慈善组织的领导人。以你的感受，两种身份之间的转换会面临什么挑战？

盖茨：我觉得，这两种身份对个人能力的要求是相似的。科技的角色是对创新下注，慈善的角色得知道如何传递愿景，如何获得社会关注。两个角色也有不一样的目标，涉及一些不同的技术，但基本的管理方式和对结果的考量一样。

附记：确实，盖茨基金会的特色，不仅在于其资金和规模，还在于基金会的运作采用商业手段，

体现了一种商业模式。按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的说法，盖茨基金会的运作类似风险投资机构，但投资的对象并非企业，而是全世界的贫困者；目标不是获得商业利益，而是形成社会效益。

他举例说，盖茨基金会目前最大的投入领域为全球健康，其中约一半资金用于疫苗。疫苗的广泛使用可以显著降低死亡率，但在南亚、非洲以及中国西部等贫困地区，人们往往难以负担高昂的注射费用。盖茨基金会通过投资支持企业进行疫苗研发，改善生产条件与能力，降低研发成本，研发成功后即可将疫苗低价销往贫困地区，使穷人可及。以肺炎疫苗为例，跨国公司报价需每针 100 美元，但盖茨支持的公司可以把价格缩减至每针 3 美元。不过，一旦企业不能克服研发技术瓶颈，或因其他变故项目无法继续，基金会的项目难免失败。

“这就是风险，这种投资精神，就是一种冒险的精神，是现在大部分的慈善机构都不做的。”叶雷说。如果项目成功，人们不用再高价购买疫苗，基金会将通过企业直接销售低价产品的方式进行扶贫，由此达到公益目标。叶雷介绍，一旦可持续的机制形成，盖茨基金会也将“功成身退”。

问题是，公益事业的成效并不像商业投资那样可用利润等指标轻易衡量。以往公益事业常用计划手段推动，如教育扶贫，评估方法也仅是投资额，或是新建多少学校，增加多少老师等物化指标，学生的能力提升等关键因素被忽略，慈善投入和实际受益人群所获真实效益难以挂钩形成良性循环，这也是全球慈善事业的通病。但盖茨认为，社会效益实际上可被测量。关键是要对社会效益制定可行的量化目标、测量方式和监督机制，包括对慈善组织自身的管理运营亦行此道。即便这必然推高慈善的成本，却是保证资金“不打水漂”的必要投入。

在制定终结脊髓灰质炎的行动计划时，盖茨基金会遵循国际社会此前制定的清晰目标，迅速扩大疫苗接种率。现在，脊髓灰质炎仅在三个国家还有流行，每年新增病例始终处于 1000 例以下。依据更详尽的收尾计划，全球有望在六年时间内实现目标。

在美国的教育项目中，盖茨基金会提出“有效教学衡量标准”，通过建立一整套考量与反馈系统以帮助教师改善教学，这其中包含一项与毕业率脱钩的学生结业考试。这套衡量方法虽因老师和校长们的不适而一度遭遇推行困难，但现在已渐受教师信赖。

在中国，盖茨基金会资助的艾滋防控项目中，也一反以往以投资额或举办防控活动次数规模等量度慈善成效的常规，而是在寻找艾滋感染者进行有效防控的过程中，要求受捐部门将寻获的新增感染者数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这也曾不被理解，但几经曲折后终见成效，使得这一考量模式最终成为中国疾病防控部门的一个规范性指标。

如何考量在华慈善

“我们一半的努力是用中国经验帮助其他国家”

自 2007 年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来，盖茨基金会承诺在中国的投入至 2012 年已超过 2 亿美元。

一些是通过中国办事处来完成的，其中包括中盖艾滋病项目 5000 万美元，中盖结核病项目 3300 万美元，绿色超级稻项目 1800 万美元，中国红十字会控烟项目 900 万美元等，另一些则是由西雅图总部直接捐赠，或是基金会的全球合作伙伴、受赠机构执行。如此投入，如何评价产出？

财新记者：你们怎么考量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

盖茨：这取决于我们制定的目标。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结核病项目，旨在减少受结核病之困的人群。从三年前开始，在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我们已经看到结核病感染人数明显下降。这是我们的目标。其间的考量方式包括我们能多快检测出结核病人，怎样让病人遵循处方坚持做完治疗等。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检测跟踪，这样项目效果就更好。

财新记者：你对盖茨基金会在华项目取得的成果满意吗？

盖茨：满意。我们的疫苗项目非常成功。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投入，有助于控制这一疾病。

控烟方面还没有看到太多进展，死亡率仍然在提高。在所有成功国家中，中国对烟草的课税最低。尽管有在某些地方不允许吸烟的规定，但并没有强制实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市场手段对控烟的激励不足。控烟方面进展速度较慢，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投入。

控烟项目，需要思考如何让全社会谈论二手烟的问题，了解被迫吸烟的危害以及感染肺癌的风险。目前还没有在中国达到这样的效果。当然，美国也是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也就是 40 年前，才逐步改善控烟，推动现在的变革的。

财新记者：盖茨基金会在中国遇到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盖茨：我们的工作集中于一个领域，即健康领域。如果有其他的机会，我们也抱着开放的心态。

可以说，从三年前开始，我们一半的努力是用中国经验帮助其他国家。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取得较大进展。当然这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三方的合作——贫困国家、中国和我们——但我们有信心将其推进。我们在中国的项目也同样在推进中。

附记：盖茨基金会对中国的项目较乐观。叶雷透露，盖茨相信中国未来会有非常快的增长，因此把很多项目安排在中国。

基金会落地中国初期，投入主要用于直接支持中国的项目，如艾滋、结核病的防控等，大部分据称都进展顺利。

据叶雷介绍，盖茨基金会的项目主要由其他机构来执行，“受益人可能都不知道是你的投入让他受益”。例如，具体的运作，就采取把资金投给当地的一些执行部门的方式，包括政府和项目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同时，基金会方面更希望携手多方一起来参与。

“中盖艾滋病项目”是一个成功案例。2007 年，盖茨基金会承诺与中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包括男男同性恋人群在内的高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并资助 700 万美元研究经费，

用于艾滋病预防的研究。艾滋项目将每年新检测出的阳性感染者数量、感染者关怀、教育的具体数量等作为考核指标，并将考核指标与项目款项分配直接挂钩。2012 年末，中盖艾滋项目完成技术输入和制度建设，进入尾声，中国政府接过接力棒，将成功经验继续运用在艾滋病防治领域。

相较而言，控烟项目进展有限。据悉，盖茨基金会控烟项目有两个预期的产出：第一是搭建国家级的控烟框架，现在地方有了文件，要推动国家级的政策法规出台；第二个就是提高烟草税。在实施中，至今进展仍较为缓慢。

携手中国创新

“我们更希望在中国国内项目和中国创新对世界的贡献中寻得平衡”

对中国，未来盖茨基金会计划除了在某些重大的全球健康问题，如重要传染病的防控上加速进程，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人才、技术以“中国制造”的优势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制造的低价优质的疫苗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乃是重点。盖茨认为，中国绝不仅仅是受捐者，更应当成为慈善力量的输出者。

农业也是盖茨基金会想携手中国改变世界的雄心之一。盖茨基金会正在资助研究者，打算将不依赖化肥的“绿色超级稻”带到非洲，以绿色新技术帮助贫困农民在恶劣环境下实现粮食丰产。

财新记者：这次你的墨西哥之行主要为了当地的农业项目。为什么对农业问题如此关注？

盖茨：盖茨基金会每年提供 30 多亿美元赠款，其中农业项目的投入增长很快，从 3 亿美元增长到每年 4.5 亿美元左右。这是一笔可观的投入，我们也非常重视。农业赠款中的较大部分用在提高贫困国家农产品产量的种子研究上。

我这次到墨西哥来，主要是拜访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当年玉米与小麦这两种重要作物的绿色革命就是发源于此。当然，大米的改良主要是在菲律宾。

时至今日，对种子改良的研究投入仍然不够，产量还需提高，出现了新的农产品病虫害，而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旱灾也越来越严重。

全世界 70% 的贫困人口是拥有小块农地的农民。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绿色革命”，以及此后中国的“绿色革命”都大幅提高了农作物产量，避免了一些本来预计可能出现的饥荒。现在我们需要将农作物产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非洲提高主食农作物的产量。在中国，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培育“绿色超级稻”，引种到非洲并本地化。这个项目若顺利推行，非洲最贫困农户家庭的产量将在未来十年中提高 20%。

财新记者：农业生产中规模化很重要，你为什么选择主要资助小规模生产的农民？其中经验是否能推广到规模化农业生产中？

盖茨：贫困国家缺乏大型农场，而农民没有资金来购买机械。幸好，大部分主食农作物即使在

小块农田中也能获得高产，不需要依赖机械化。有一些作物需要规模化生产，比如咖啡和茶叶等，人们称其为种植园作物。

如果一个国家发展程度高，人力资源价格高昂，自然会提高机械化程度。但主食农作物一般都是最后机械化的。而且许多非洲国家还远远达不到机械化的要求，主食作物还是小规模生产。但即使这样也可以非常有竞争力。

财新记者：为什么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没有较大的农业项目？

盖茨：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农业捐赠主要是种子研发，而大部分投入在医疗方面，如疫苗、结核病等。中国有非常高的结核病发病率，盖茨基金会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不少捐赠，用以对抗结核病。此外还有烟草控制的项目。中国的“吸烟父亲”（smoking dads）比例很高，可能是世界最高，而且还在不断上升之中。在艾滋病防治领域我们也有在华项目。

现在我们更希望在中国的项目和中国创新对世界的贡献中寻得平衡。水稻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稻种可以让贫穷国家获益。我们和中国政府建立合作，共同投资这方面的创新研发。

附记：在盖茨基金会近期完成的全球策略调整中，中国的角色和定位已显著变化。直接援助资金逐步减少，战略性的投资如农业、卫生领域的研发将保持增长。2013 年，盖茨基金会将把更多精力放在中国项目成果的推广上，尤其将助力中国研发的创新产品的商业化进程。叶雷坦言：“最近两年，我们更看重利用中国的能力来帮助世界。”

显然，在盖茨看来，中国近些年在卫生、科技等重要领域的投入和发展非常巨大，这使得中国具备科技、新产品等慈善新动力的输出能力。虽然中国之前确实存在如今也存在投入不足、制度不良、人才流失等问题，但较前已进步良多，和国际水平差距大大缩小，甚至不少跨国企业也愿意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我们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支持全世界的基地。”叶雷说。

叶雷还分析，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不仅具有“中国制造”的独特生产优势，在某些领域还具备相当大程度的技术优势。

他告诉财新记者，盖茨基金会曾寻找企业合作研发一种动物疫苗，后来却发现中国的研究者早已攻克难关，并具备成熟技术。

由此，叶雷强调，盖茨基金会可以发挥桥梁作用，把中国好东西推向世界。不但要让世界知晓，也要让世界接受。

2008 年，基金会向中国农业科学院提供 1800 万美元研发资金，用于研发可在恶劣环境下成功生长的“绿色超级稻”。目前，稻种培育已十分成熟，这种单位产值高、不需要施加化肥的新型稻种，正在同样以小农耕作为主的非洲国家进行本土化栽培。若成功推广，将能在短期内使非洲粮食产量翻番。

新疫苗研发，是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投入的重要领域。

盖茨基金会发现，中国医药产品安于巨大的国内市场，例如疫苗产品就非常缺乏出口经验，生产也很少达到国际标准。七年前，盖茨基金会捐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进行新疫苗研发。目前，这种疫苗正在获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新药认证。一旦通过，中国疫苗将有资格大量供给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叶雷分析，此举不仅使慈善事业受益，企业一旦获得走向世界的门票，未来必然也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盖茨基金会在其中投入的回报，则或将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的进一步降低。

慈善动力之源

“政府可以有效地推动慈善，例如帮助企业家建立慈善组织，提供税收激励等，尤其是慈善相关的遗产税减免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方法”

盖茨在退出微软公司之后，开启了劝说世界巨富捐资从善的漫长旅途。中国也是其旅途的重要站点。

不过，这些钱并不需要富豪们捐给盖茨基金会。甚至，盖茨和巴菲特都曾许诺，在去世后若干年内，要将所有捐款花完，结束基金会。盖茨式慈善也面临可持续性问题。但盖茨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理念的传播，制度的建立，是他努力的方向。

有关心制度的思考在先，盖茨怎么看中国慈善业？

财新记者：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级开始关心慈善业，愿意捐献自己的钱为社会做事；并且不少富人建立了公益基金。现在人们最大的担心是善款使用不当。

盖茨：现在中国的基金会数量还非常少，慈善业才刚刚起步。而且其中相当大部分集中于灾难救助。政府的灾难救助并不依赖于慈善捐赠。在其他领域，例如研究方面，投入很少。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之一是香港的李嘉诚。

慈善在中国刚刚起步，有很多关注和讨论。

我曾与为数不少的中国成功企业家会面，他们都表示对慈善兴趣浓厚。我们会进一步观察未来的发展。

政府可以有效地推动慈善，例如帮助企业家建立慈善组织，提供税收激励等，尤其是慈善相关的遗产税减免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方法。政府还能为慈善企业喝彩，达到鼓励的效果。

财新记者：人们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仍然不够。如何让中国的慈善组织赢得社会信任？

盖茨：中国红十字会做得还是不错的。说到底都要看数字。任何对慈善认真的人都关注具体数字，而不仅仅是一个丑闻。事过几年，当初的丑闻应该没什么人提及了吧。

人们应该更关注数据，看资金怎么花的——如果你捐助的是研究项目，研究是否加强了；如果

你资助控烟，是否控烟得到加强。

中国的慈善不应该比美国或者任何地方差。人们可以选择自己能直接监督的项目，例如在自己的城市帮助残疾儿童和研究。若要捐助有更大的影响，有时候需要加入一个较大的基金会，投向较远的地方。总的说来，中国慈善业应该有可见度，是可以监督的。

财新记者：2010年，你和巴菲特来华，为中国的成功企业家举办了著名的“巴比晚宴”，共同商讨如何募捐和从事慈善，此事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你如何衡量“巴比晚宴”的效果？下一步还有哪些举措？

盖茨：那次活动的曝光率高，源于媒体关注度高。

当时我们并没有向参与者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是想有一个讨论，并分享我们做慈善的感受。我们鼓励中国的慈善家经常性聚会，这在海外是常见的事。遗憾的是这个聚会并没有出现。当然是否想更有组织，是否愿意互相学习，都是慈善家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按照现在中国的财富程度，即使捐助数额仅有美国十分之一，也能产生多得多的基金会。

我会继续与中国企业家会面，看看自己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中国的慈善组织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我只能分享慈善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多么让人享受。或者说，仅仅是帮助中国的企业家更多了解资本主义，了解慈善是其中正面的一部分。

财新记者：基金会在世界各地的项目，都需要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地区，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专业化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欠缺。基金会如何寻找和培养合作伙伴，帮助其成长？

盖茨：我们给他们提供资金，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帮助。我们也带来世界各地的经验，例如艾滋病防治的创新，主要借助了印度的经验。印度民间组织接触比较封闭的群体，例如吸毒人群、性工作者、男男同性恋等富有经验。通常政府很难接触到这些人群。非盈利项目的推行并非易事。我们和政府合作，逐步建立起推进的能力。

财新记者：盖茨基金会在墨西哥的农业项目与当地企业家，也是目前世界首富斯利姆（Carlos Slim）合作。在中国有这样的紧密合作伙伴吗？

盖茨：如果在中国有愿意资助农业的慈善家，我们当然愿意与之合作。我们和中国政府合作绿色超级稻，这本身就是一个可观的农业项目。

财新记者：你过去的从业背景是高科技领域，同时又是成功的企业家。你觉得哪个背景对你今天充当社会企业家更有帮助呢？

盖茨：疫苗技术和育种技术堪称奇迹。如果没有科技就不能获得这些神奇的进步。如何能凝聚共识，激发热情，克服挑战，需要组织能力。

对我来说，需要把对于科学的理解和组织能力结合在一起。惟有如此，才能集合大家的努力，管理各种项目，提高项目的社会关注度，让大家关心为什么需要注射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为什么非洲农产品种子不足等，然后调动资源并较好地使用资源。

我不明白你说的企业家是指什么。不过，我们既需要组织能力，也需要了解奇迹来源何处——这是科技的力量。

附记：2013 年 2 月 19 日，乌克兰“钢铁大王”、富豪维克托·平丘克（Victor Pinchuk）公开承诺，将在有生之年及身后捐出自己一半以上的财产。由是，他成为最新进入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的第 105 名富豪。

捐赠承诺，是盖茨夫妇和巴菲特 2010 年 6 月发起的捐赠行动。盖茨和巴菲特从这一年起，亲自游说世界级的富豪们，鼓励他们为慈善事业做出承诺，在有生之年或过世后捐出 50% 以上的财富从事慈善。在他们发起这项行动仅两个月后，就有 40 名美国最富有的个人和家庭同意在捐赠承诺书上签名。这份名单还在不断拉长。迄今为止，已有来自 9 个不同国家的 106 个富豪和家庭，加入到了“捐赠承诺”中。据美国基金会中心估计，这些富豪捐赠的身家共计约 4000 多亿美元，捐赠者中年龄最小的 28 岁，最大的 97 岁。而与盖茨在墨西哥城会面的现任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即是在平丘克之前最近一位加入该行动的富豪。不过，至今尚无中国富豪进入此榜单。

作为其慈善行动的第二站，盖茨和巴菲特曾在 2010 年 9 月底来华，邀请了 50 名中国富豪参加慈善晚宴，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巴比晚宴”（参见本刊 2010 年第 39 期封面报道“错位的慈善”）。这一活动，将中国的富豪们推上风口浪尖。对比海外巨富们的慷慨解囊，中国富人们的善举远不令公众满意。2010 年，胡润富豪榜单上排名前十名的富豪（共有 12 位），只有 5 人进入前 50 名慈善榜单。

不过，正如盖茨在事前事后反复强调的，这一场晚宴并非要“劝捐”，更多的是中国慈善理念与国际视野的交流碰撞。宴席中，一些中国的富豪虽表现出投身慈善的意愿，但也普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私人财产保护不力、社会保障福利体系仍有缺失的情况下，不得不为子孙后代的未来打算，称“裸捐”风险太大。

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变化，越来越开放的慈善环境，也为中国的富人慈善创造了空间。上市公司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 2011 年正式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资本逾 35 亿元，是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截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中国本土已登记注册了 1707 家非公募基金会，以富豪或企业财产成立的基金会，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会的数量（1323 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更积极地回应社会问题，他们面临更多的挑战，将是在现代慈善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花好他们捐出的财产。

盖茨向来认为，加强慈善机构的能力非常重要，也尤其重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影响力。他自己的慈善事业瞄准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领域，以期更持续有效地影响改变乃至世界。

传统的官办社会组织，大多仍延续非市场化的管理模式，转型有待时日。从 2011 年开始，无论是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还是河南宋基会的投资风波，一系列官办机构的丑闻，促成官办社团的改革。

在登记、税收的重重限制下，根植于民间的组织刚刚起步，良莠不齐，不少机构在专业性、职业化上都颇有欠缺，无论是在能力建设还是组织经验上，甚至难以同政府机构或者官办社团相提并论。2012 年底，网友对民办机构中华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财务管理能力发起连续质疑，即是典型案例。这些慈善组织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并最终获得公众信任和认可，还需时间的检验。

来源：财新网

地址：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2-22/100493240_3.html

[【返回目录】](#)

重新定位国际援助

继全球基金陆续撤离，中国艾滋病防控领域的另一家重要的资助方——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也将结束对中国直接资助项目。

2007 年，盖茨基金会承诺向中国投入 5000 万美元，与中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至 2012 年，盖茨基金会的资助即告一段落。由于一些收尾工作尚未完成，部分项目将延续到 2013 年底。

盖茨基金会的离场，一度被看做国际援助资金撤离中国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从 2008 年始，包括双边或多边发展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开始削减对中国的援助资金。

过去的 30 年间，这些国际机构植根于中国基层社区，为中国的教育、赈灾、扶贫、环保等领域提供了大量资金。它们或者与地方政府合作，或者培养扶持本土的公益机构，为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成为中国本土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助推者。

援助资金的减少或者撤离，引起公益界对“洋奶”断流的普遍担忧。如何促成本土基金会转型、使官办慈善资源下沉，一度成为热点议题。

不过，与人们的理解有所不同的是，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并未离开中国，也不准备离开中国。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转型，这些国际组织开始在中国重新定位。它们对

中国的援助，不再局限于基层的具体项目，而是与国内公民社会力量一道，共同推进中国的制度性改革。与此同时，它们更期望与中国携手帮助世界，输出中国多年来的发展经验。

国际组织的重新定位，为本土公益的发展留出了更广阔的空间。重新审视 30 年来的合作经验，本土的公益方能接力前行。

助推中国公益

究竟有多少家国际组织在中国活动？无论学界还是官方，都没有完整的目录。公益领域信息平台——中国发展简报收录了 295 家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国际机构。至于其中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了中国代表机构的境外基金会，仅有 19 家。

早在 20 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老牌机构”就在中国开展活动。1949 年后，这些国际机构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扫地出门。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和技术支持，在中国政府的主动邀约下，一些国际机构重新进入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韩俊魁介绍，这一阶段，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教育、赈灾等传统领域。在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机构进驻中国的速度加快，工作领域也更加多元，扩展到乡村选举、基层自治、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

碍于中国严格的社团登记管理制度，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NGO）一样，大多数国际组织也找不到愿意担任其主管单位的政府部门，无法正式登记注册。为了寻求合法性，这些组织大多数选择与地方政府，以及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合作。

但也有不少机构，在与政府合作的同时，也将大量资金直接投向民间。韩俊魁介绍，一些大型的发展机构在进入中国时即非常成熟。他们在设计项目时，便已规划好了五年或十年后的退出策略。至于退出后项目如何可持续地发展，这些机构往往采取两种策略：一是推动政府政策的变化，以政府的人力财力持续提供服务；另一个方向，就是培养、留下本土的公益组织，继续在当地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本被认为是公益认知缺失、公益支持缺乏的边远贫困山区，反而有一大批小型的民间组织，率先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相较中国政府，这些国际组织对草根 NGO 的作用也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例如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包括全球基金、盖茨基金会在内的多家机构，均要求地方政府与草根 NGO 合作——在性工作者、男男同性恋等群体中，只有依靠社区小组，方能甄别干预对象，有效开展工作。

国际组织为这些草根 NGO 提供项目资金，支持它们的运营，更为它们带来先进的业务理念和管理方法，成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中最重要推力。

“我们可以为项目和合作伙伴带来知识和技术。”“国际计划”是一家以儿童为中心的国际人道主义发展组织，其中国区的首席代表马克·莱顿表示，除了知识技术的传递，“国际计划”同样重视

对合作伙伴的能力培养。“我们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工作，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非常有限。”马克·莱顿介绍，根据当地合作伙伴的能力，“国际计划”会对工作的侧重点予以调整。一些合作伙伴则需要他们提供更多的能力建设。“国际计划”要求合作伙伴都必须遵循严格的财务管理标准，例如接受国际标准的财务审计。

北京“农民之子”总干事、燕山学堂的创办人林炉生对此也颇有感慨。2008年，当他的机构接受香港社区伙伴的资助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燕山学堂还没有专门财务人员，只能对机构的收支做简单的流水账。香港社区伙伴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对燕山学堂的工作人员进行财务专项培训，建章立制，使他们的财务管理最终获得业界认可。

这样的管理运营经验，被看做国际机构给中国公益行业发展带来的最重要的礼物。从2008年开始，国际资金撤出的担忧开始在业界弥漫。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是汶川大地震，悲剧背后，中国也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本土捐赠和社会动员的能力；其二便是北京奥运会，集中呈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力。

在此前后，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合作援助的出资方就中国是否有资格继续获得国际发展合作援助以及有关发展合作在中国的作用有过激烈的讨论。在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反对继续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示威游行。经评估和双边磋商后，传统的发展援助提供者，如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先后削减或终止了在华的大规模发展合作项目，将发展合作的重点调整到非洲和东南亚地区。

2010年的全球基金事件，则被看做援助政策转向的另一个节点。

2010年11月，因对资金管理及公民社会参与不足有意见，全球基金停止了对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拨款。2011年5月，全球基金冻结了在中国的所有支出，涉及金额达上亿美元。随后尽管资金解冻，但预算规模缩减，全球基金的艾滋项目更确定将在2012年底撤出中国。加之盖茨基金会的项目资金也近尾声，长期接受这些项目资金的草根组织普遍担忧资金断流。

不过，据韩俊魁观察，尽管一些双边机构撤出了资金，但大多数国际组织并没有离开中国。“更准确地说，他们进入了战略调整期。”韩俊魁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迅速，政府职能范围也在不断调整之中，同时新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国际组织需要重新定位，以更准确地回应中国的社会问题。

“中国政府并不缺钱。”马克·莱顿表示，“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如何选择分配这些资金。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政策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有效管理的问题。”

大多数国际机构的一个转变，便是加强了政策倡导的力度。孙学兵介绍，据他了解，近五年来大多数双边组织在削减了在华实地干预项目的同时，明显地加强了对在华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对话类项目的支持。相应地，其在中国的业务模式、专业人员构成、优先专业领域的选择，都发生了明显

的调整和变化，将知识传递、政策研究和倡导、公众沟通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例如乐施会刚完成下一个六年的战略规划，准备采用“一体化”的项目方法。具体而言，乐施会在未来的具体项目设计中，将采用更加综合的项目规划方法，因应国内的优先考虑和乐施会的比较优势，将基于实地的示范项目与政策研究和政策倡导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在知识转移、经验总结和推广，以及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等方面的工作，从总体上提升合作项目影响和可持续性。

除此之外，不少国际组织也在重新定义中国在其国际网络中的位置。“国际组织将国际视角、先进经验带到了中国，也需要把中国的经验带到其他国家。”孙学兵表示，中国三十年来的减贫成就世界瞩目，对于传统合作理论的完善，中国的实践应该、也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更好地帮助其他贫困国家的减贫事业。

盖茨基金会更是明确，在减少对中国直接援助的同时，将加大对中国合作伙伴的战略性投资，例如对农业、疫苗方面的研发支持。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表示，中国政府和企业都有着帮助世界的意愿，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先进技术，以及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无疑将助力其他贫困国家的发展。“我们更看重用中国的能力来帮助世界。”

如何接力

面对国际组织战略调整、一些领域直接援助资金减少，本土公益如何接力，业界已讨论多时。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并不缺乏本土资源，尤其是在 2008 年以后，本土捐赠热情高涨，以企业家和企业为捐赠主体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关键在于如何建立资源分配和对接的渠道。舆论呼吁的方向，一是尽快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二是推动本土基金会与草根组织对接。

近两年来，两方面都已有了明显发展。2012 年和 2013 年，中央政府连续每年拿出 2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民政部也正在草拟一份有关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方案。例如在艾滋领域，失去国际资金支持的社区小组已明确得到了财政资金继续支持的承诺。2012 年艾滋病日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与防艾民间组织座谈，表示要“为民间组织开展防艾工作创造更好条件”。

国内的基金会也开始陆续走向了“资助型”定位。让草根组织感受颇深的是，这两年国内各类招投标、创新评奖的公益项目明显增多，愿意和草根组织对接的基金会也在增加。

业界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这些资金的使用能否透明而高效。

在不少学者看来，相较国际机构对资金安全和效率的强调，国内很多项目仍显粗放。令韩俊魁印象颇深的是，一次在防艾社区小组的培训会上，一个小组宣传自己过去一年里，动员了两三万人。韩俊魁细问他们的动员方法，被告知是在火车站发放防艾宣传单。“可见一些机构的钱确实很好拿。”

与之对比，盖茨基金会对效率的评估可谓苛刻。“我们的指标是，你发现了多少个艾滋病患者，

照顾到多少个患者，然后按照这个结果，决定给你多少钱。”叶雷坦言，这一套绩效方案，一开始遭到大量反对，“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不信任他们，保证一定会有个好结果，不需要做这些测量。”但最终，这一套评估方法被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所接受，测量指标成为国家项目评估的依据。

前期的基线调查，中期的督导以及后期的第三方评估，乃是大多数国际组织为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而惯用的手法，但尚未被国内的基金会广泛运用。“一些基金会大笔大笔地往外给钱，我们看着都心疼。”韩俊魁认为，一些基金会还没学会花钱，甚至都没有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往往就依社会名声、权势选择合作方。

在财务、项目管理方面，无论是执行项目的草根组织还是提供资源的基金会都仍显不足。2012 年底，网友对民办公募基金会中华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财务管理能力连续质疑，即是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资源，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的资源，依旧集中于官办组织手中。其透明度过低，缺乏社会监督，过度依附权势等体制性问题，也随着 2011 年的红会“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投资丑闻等而曝光。

多家接受采访的国际组织表示，继续推动中国公益行业发展、为合作伙伴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仍是它们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之一。然而，在中国当前的慈善法制条件下，不少国际组织自身也面临尴尬。“没有全国性的慈善法去界定中国政府对国际机构的期望，国际机构注册登记的法规也亟待出台。”“国际计划”中国区首席代表马克·莱顿认为，规则的缺失，使得国际机构在中国的转型成本尤其高昂，国际机构很难做出对中国的长期规划，也让它们难以找到长期稳定的捐赠者。

推动中国公益行业变革，需要国际组织和本土机构的共同努力。

来源：财新网

地址：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2-22/100493238_2.html

[【返回目录】](#)

◎公益布告栏

NPO 财务 3A 培训——阿里班学员招募书

专门针对环保领域公益组织的财务管理培训班开班啦！

什么？在公益组织里，财务人员只是做账？财务管理是可有可无？扔掉老土观念，从 NPO 财务 3A 培训开始，重新认识财务管理吧！

NPO 财务 3A 培训是由恩友发起的，针对公益组织的系统财务管理培训。本次培训由阿里巴巴

公益基金会全额资助。

我们根据环保公益组织的业务特点，从近百个环保案例总结出了丰富全面的经验，通过针对性案例分享、深度剖析，让你充分认识到财务管理的意义，恰当运用财务管理，更可以帮助组织筹措资金、提高运营效率、服务机构战略，推动机构发展。

培训收获：

如果你是管理人员，你将收获：

- 1、 了解环保资助方资助策略；
- 2、 编制全面预算及资金预测；
- 3、 对项目产出进行绩效评估；
- 4、 提升筹资能力。

如果你是财务人员，你将收获：

- 1、 学习民非会计制度、财务公开要点及税收优惠政策等基础知识；
- 2、 对项目产出进行绩效评估；
- 3、 掌握预算编制和监控方法。

此外，在培训中，我们将提供你与环保领域基金会直接对话的机会！并得到行业基金会专家现场点评的机会！让财务管理成为公益机构发展运转的新动力！

特邀嘉宾：李海市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项目经理

你所付出的：交纳培训费人民币 500 元/人。

得到的优惠：主办方报销外地学员培训期间食宿费及往返差旅费(硬卧标准)。

培训时间地点及对象：

培训对象	培训时间	备注
管理人员	3 月 26 日和 27 日上午	27 日上午课程需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共同参加
财务人员	3 月 27 日--29 日	

地点： 杭州市(具体地点将另行通知入选学员)

招生数量： 25 家机构(每机构 2 人，管理人员 1 名，财务人员 1 名)

截止时间：2013 年 3 月 11 日 恩友将通过电话筛选并确定参加培训学员。

报名表请发至：info@nfriend.org

报名联系人：胡春

咨询电话：010-6417 6797

培训主办方：恩友财务

恩友是一家专门为中国公益组织提供专业化财务管理咨询服务的支持型公益机构。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总部设在北京，设有广州分办公室，拥有全职员工、专家、志愿者 30 余人。

自成立以来，已经为全国超过 1200 家公益组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恩友的宗旨：通过为中国非营利组织提供财务管理的专业服务和支持，提升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能力，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官方微博(新浪)：恩友财务

官方网站：www.nfriend.org

培训资助方：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英文名"Alibaba Foundation")是于 2011 年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将通过集中公益资源、提升公益项目效率和专业性，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宗旨是：营造公益氛围，发展公益事业，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具体业务范围包括：自然灾害救助、扶贫助残、帮助受助群体提高能力以改善生活条件；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支持环保类公益性组织的发展；支持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及组织培训、国际交流等活动；符合章程规定的其他公益事业。

官方微博(新浪)：阿里巴巴中国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官方网站：www.alijijinhui.org

来源：NGO 发展交流网

地址：<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86322>

[【返回目录】](#)

全球 CSR 专家探讨如何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水平

中国第一届亚洲 CSR（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智享峰会助力企业成功应对全球 CSR 挑战

上海 2013 年 2 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作为全球会议及培训项目策划领域先锋企业的 Dot Connector 正在中国筹办第一届亚洲 CSR（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智享峰会。“2013CSR 战略智享峰会 -- 创享可持续的商业价值”经过为期两年的严谨市场调研及筹备，将于 2013 年 4 月 15-16 日在中国北京 J.W.万豪国际酒店隆重举行。此次峰会致力于为企业制定高效的 CSR 战略提供系统全面的案例式解析，助力企业成功应对全球 CSR 挑战，把握本土 CSR 发展机遇，实现企业综合价值的最

大化。

届时来自中东、亚洲、欧美及本土的 200 位企业社会责任践行高管及 NGO、NPO、基金会、政府、行业协会、学者、媒体记者将齐聚一堂展开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峰会已开始接受社会各界的注册报名，详情可登陆会议官方网站查询。

未来，CSR 将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及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

Web2.0 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企业面临着新的透明度考验，数十年树立的品牌形象可能在一夜间顷刻崩塌。当前，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与关注企业在追逐盈利的过程中，是否兼顾了对社区和环境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及贡献。未来能够从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必定是那些做出了变革，具备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品牌。

2012 年 3 月 13 日，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国资委将出台《央企社会责任管理指引》，相关指引要求大型央企履行社会责任，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希望以此激励央企履行社会责任。正走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之路上的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央企、民企和跨国企业也在不断摸索着适合各自发展的有效 CSR 管理方式，以实现企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赢增长。

“议题务实，企业与 NGO 需要交流，希望这样的平台更多一些。”

在此背景契机下，2013CSR 战略智享峰会专家组委会以“如何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实现商业、社区、环境的共赢”为主题，设置了为期两天的峰会及两天的会后专项培训研讨会。大会目前得到了超过 100 位来自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及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部分发言嘉宾及主要议题如下：

发言嘉宾：

彭华岗，局长，国资委研究局（确认中）张峻峰，副所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刘萌，中国首席代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陈英，前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前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中心主任，北京融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终身名誉所长（确认中）王志乐，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第十项原则专家组成员，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鲁德福，项目主任，GIZ 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 Chris Nelson，总裁，Phil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Philippines David Wilson，总经理，J.W.万豪国际大酒店[13.50 1.05%]Brendan Jack，企业可持续发展及 CSR 部门总监，Nakheel 集团 Carla Berina - Kim，可持续发展部门总监，马尼拉水业集团；执行总监，马尼拉水业基金会刘念宁，企业公民、政府事务及大学合作部门总监，EMC 陆建忠博士，企业公共事务部门副总裁，Sateri 冯丹龙，企业公共事务及政府关系部门总监，辉瑞 Jack Kuang，CSR 部门主管，安利；秘书长，安利基金会 Ralph Thurm，CEO，A|HEAD|ahead；企业可持续发展及创新部门总监，德勤荷兰

华威廉，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前 Bayer 中国担任副总裁 25 年主管企业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事务）Ibrahim Al-Zu'bi，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主管，Majid Al Futtaim - 2011 中东及欧洲的确最有影响力的 100 位思想领袖 Eric Li，中国对外事务高级总监，雅培

主要议题：

善因营销的成功秘诀及案例分析：如何帮助政府，消费者和其他关键受众理解企业在 CSR 方面所做的贡献，培养品牌忠诚度并将 CSR 价值转化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前瞻全球 CSR 发展动态与趋势，辨别本土 CSR 发展机遇与挑战：核心议题，热点话题，潜在风险与投资机遇如何成功高效地将 CSR 融入企业的发展战略？转变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商业目标的实现，提高企业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决定了 CSR 战略与实践的成败？如何将其他企业的成败经验运用到自己的企业中去针对本土 CSR 发展面临的问题，从全球领先的实践经验与知识中找到解决方案：高效工具，管理理论，核心技能 CSR 合作伙伴及项目的选择技巧：如何挑选与企业自身 CSR 理念匹配的 NPO 合作伙伴，如何设计出契合企业商业发展及品牌形象的项目如果您对此次会议感兴趣，可拨打 (86) 21 6607 5806 进行相关咨询。同时，会议主办方愿意为在 3 月 1 日前注册的参会者提供优惠价格。

媒体联系：

Candice HU

电话：+86-21-6607-5806

来源：美通社

地址：<http://www.pnasia.com/story/75407-1.shtml>

[【返回目录】](#)

2013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申请说明

2011 年 7 月 15 日，壹基金推出“海洋天堂计划”。该计划源自电影《海洋天堂》，本计划在 2011 年与 2013 年三年周期内，联合全国范围的民间服务机构形成网络工作模式，为脑瘫、自闭症、罕见病等贫困特殊类型残障儿童提供救助，提高民间服务的组织发展能力，联合企业、研究机构与民间服务机构进行公众宣传与社会倡导，促进国家对特殊类型残障儿童的关注与政策支持，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独立自主，积极融入社会生活。

2011 年—2012 年，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与全国 100 多家民间服务机构展开深度合作，形成学习网络工作模式，为脑瘫、自闭症、罕见病三类贫困特殊类型残障儿童提供救助和社会融合支持。2013

年，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将继续开放合作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接受民间服务机构申请成为“海洋天堂计划”成员机构，为脑瘫、自闭症、罕见病三类贫困特殊类型残障儿童继续提供服务。具体内容请查看以下内容。

一.2013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华北地区自闭儿童关爱救助项目介绍

华北地区自闭儿童关爱救助项目内容包括：贫困儿童康复训练救助，社会融合活动，民间服务机构能力建设活动，公众宣传与社会倡导活动，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是该项目该地区的枢纽机构。本年度壹基金将面向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安徽）接受不超过 25 家自闭症民间服务机构加入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华北地区自闭症儿童关爱救助网络。

二.机构入选基本条

1. 认可壹基金“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理念；
2. 原则上为合法注册的民间服务机构，非公立学校或福利院/中心；
3. 具备较完善管理制度与专业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专业服务；
4. 具有一定的宣传意识与渠道；

三.成员机构需要提交的资料清单

1. 机构资质资料复印件并盖机构公章，包括但不限于注册登记证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许可证，收入发票样板，由经办人签字

2.财务管理能力：

需提供财务人员的资质证复印件并盖机构公章，如财务进行委托代理，需提供代理 财务公司的登记证复印件，由经办人签字；

提交上一年度财务报告与本年度度财务预算；

如做过财务审计，需提交 2012 或者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证明在本中心网站、博客、微博等渠道对机构的财务进行公示的资料；

3.机构基本制度

提交机构简介（含机构愿景、使命介绍）与上一年度机构年报；

如有机构管理制度文件（如组织框架、机构章程、理事会制度、行政制度、财务制度、人事制度、项目制度），则需提交机构管理制度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由经办人签字；

4.专业服务能力

有固定办公场地需提交办公场所的房屋购买或者租赁合同复印件并盖机构公章，由经办人签字；

有相关服务介绍，如康复儿童训练体系、评估与记录表格、转介与咨询服务体系介绍等文件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由经办人签字；

需提供专职项目团队介绍、人员责任分工以及项目执行经验并加盖机构公章，由经办人签字；

有专业服务人员需提供员工数量与名单，附上资质证明（如教师资格证、社工证、康复师证、相关专业毕业证）复印件并加盖机构公章，由经办人签字；

提供机构员工的专业培训记录复印件并加盖机构公章，由经办人签字；

5.机构如有网站、博客、微博地址等网络宣传渠道，请列出提供名称与链接方式。

6.签署《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合作申明》并加盖机构公章

四.成员机构申请流程

1.选择网络：申请机构自主选定希望加入的服务网络，选定后则需进入该网络的枢纽机构网站查询相关申请事宜。

2.提交申请：申请机构在枢纽机构官方网站下载并填写《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成员机构合作申请表》，下载并签署《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合作申明》，按照要求提供纸质版申请资料，并在规定时间内寄送给枢纽机构。

3.接受初选：枢纽机构收集整理资料，组织项目管理委员会审核申请资料，并且依据标准对申请机构进行打分排序，确定初选名单。

4.初选公示：本项目接受社会监督，枢纽机构在其网站、微博、博客等渠道公示《海洋天堂计划成员机构初选名单》1周。

5.合作确认：公示无异议后，枢纽机构将《海洋天堂计划成员机构初选名单》报壹基金审批，确认最终合作名单。经壹基金后确认的成员机构，将与枢纽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开展项目。

五. 申请说明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合作模式：枢纽机构联合各地民间服务机构以区域服务网络形式联合向壹基金提交项目申请，壹基金不接受单个机构的项目申请，即各地民间服务机构需向枢纽机构递交《成员机构合作申请表》；

机构按照以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确认入选后再提交项目计划资料；

本项目帮助自闭症儿童，不包含脑瘫儿童救助和罕见病儿童救助；

因项目分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南地区四个网络进行管理，因此请申请机构按照以下省份分类指引到相应枢纽机构申请。

若机构申请加入“华北地区自闭症儿童关爱救助项目”，则不能重复申请加入2013年度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脑瘫儿童和罕见病儿童关爱救助项目，以及其他地区自闭症儿童关爱救助项目。

机构若在 2013 年 3 月 25 日仍未收到合作确认，则视为未能入选本年度合作范围，递交资质资料不再退回。

六. 申请日期

从 2013 年 2 月 27 日截至 3 月 12 日 17 时，申请机构应将以上所提供纸质资料一式二份寄送到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 18 号院 4170 号，100121，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发展部，逾期不再接受任何申请。

注意事项

目前的申请工作只需机构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机构证明材料即可，确认入选后再提交项目计划资料；

机构只能申请一类“海洋天堂计划”所帮助的贫困特殊类型残障儿童，不能同时申请两类及以上。

七. 联络方式

联系人：孙忠凯

联系电话：010-85373236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 18 号院 4170 号，100121

八. 附件

附件 1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成员机构合作申请表》(点击下载)

附件 2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合作申明》(点击下载)

来源：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地址：<http://www.guduzh.org.cn/tabid/37/ctl/Detail/mid/486/Id/1141/Default.aspx>

[【返回目录】](#)

VS0 分享：搜索引擎优化 (SEO)

公益组织预算有限，怎样更好地通过网络渠道传播自己？

VS0（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国际志愿者 Ed Sander 先生在陕西西部发展基金会任市场顾问期间总结了《搜索引擎优化 (SEO)》，和你分享如何通过优化网页内容，来实现在搜索结果中的高排位。文章介绍了什么是搜索引擎营销、中国的搜索引擎、谷歌最佳实践以及百度搜索引擎优化几方面内容。全文可以免费从 VS0 网站下载：

http://www.vsoconsulting-cn.com/Images/Optimized%20search%20engine_tcm119-38730.pdf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http://www.cdb.org.cn/ngo_talkview.php?id=3991

[【返回目录】](#)

加措活佛做客京师公益讲堂，畅谈“佛法与公益”

亲爱的朋友：

中国公益研究院已邀请嘉宾加措活佛，于3月13日周三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办第十五期『京师公益讲堂』，演讲主题为“佛法与公益”。

加措活佛，是著名民族文化交流传播者、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慈爱基金发起人。在此诚挚邀请公益行业专业人士及各界热心于慈善事业的朋友前来参与，期待现场与您的沟通与交流，也烦请您将本邮件信息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您确认参加，为保证您能顺利入场，请回复个人信息（姓名、单位名称、职务、联系方式、邮箱）到 cc@bnul.org 进行报名，我们将为您预留前排座位（特别提醒：座位保留至讲座开始前二十分钟）。咨询电话：（010）58801928-818。详细信息请登录我院官网 www.bnul.org。

您在邮件中还可以事先写明想要向嘉宾提出的问题，以便我们提前和嘉宾沟通，更好的解决您的疑问，同时您也可以现场进行提问。

京师公益系列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公开，不收取任何费用，切勿相信任何收费信息。

讲堂时间： 3月13日（周三）18:30-21:00

讲堂地点：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讲堂主题：佛法与公益

讲座嘉宾：加措活佛，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慈爱基金发起人、著名民族文化交流传播者。

关于嘉宾

加措，雅江扎噶寺活佛，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慈爱基金发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1980年9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13岁到色达五明佛学院，剃度出家，成为法王如意宝普美彭措的弟子，开始在上师座前接受教法直至上师圆寂。

每年都在亚青禅修中心闭关修行三个月

北京民族大学学习汉语

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

加措活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文化交流传播、家乡教育事业发展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加了“5.12”汶川地震、“4.14”玉树地震等重大突发灾难的救援，加措活佛和他的团队为灾区人民募集了大量的物资与善款。在五年的时间里，加措活佛和他的团队在藏区建立了8所爱心学校，让近千名贫困失学儿童走进了课堂，并为藏区做了大量的救济扶贫的工作。2011年6月，由加措活佛为发起人之一的慈爱基金正式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下设立了，这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公募基金。

人生是只能出发一次的旅程，我们其实一直在路上。如果只能携带两件行李，我愿是无畏与无执。如果只能有一个牵挂，那一定是，众生。

-----加措

关于京师公益讲堂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致力于通过研究、倡导、教育、培训等方式培养专业的公益人才，倡导先进的公益理念，推动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转型与健康发展。“京师公益讲堂”即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创建的重要平台之一，秉承“传播公益，服务社会”的原则，营造良好的社会公益氛围，扩大先进公益理念的广泛传播，引导社会大众正确的公益认知，广邀中外公益领域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其他知名公众人物做客讲堂，就其在公益慈善方面的经历与感悟，以及相关热点事件发表演讲，并与听众进行深入的互动交流。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http://www.cdb.org.cn/sortinfoview.php?id=7985>

[【返回目录】](#)

◎新书快递

守护自然·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TNC不寻常的成长故事 [平装]

《守护自然·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TNC不寻常的成长故事》: TNC(大自然保护协会)是最主要的自然保护国际组织之一,近60年来致力于用科学系统的方法在全球保护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陆地和水域,保护自然环境,提升人类福祉。目前TNC的保护项目涉及全球30多个国家。

TNC于1998年进入中国,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共同开展包括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森林可持续经营、自然保护区建设、可持续流域保护与管理,缓解气候变化,以及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各类保护项目。

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 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 目前其资产已经超过 37 亿美元, 年收入高达 8 亿美元, 成长之快令众多企业羡慕不已。这个在 1951 年由几名生态学家成立的非政府机构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它已从 1990 年的 50 万名会员发展到目前的 100 万名会员并拥有 3500 名员工。这些员工分别在美国的 50 个州和其他 30 多个国家开展着自然资源保护工作。

TNC 的成长故事讲述了人们是如何搭建起一个顶级机构, 一个全世界最成功的组织。这是一个以成功结尾的故事。它生动地讲述了 TNC 的前辈们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所经历的重重危机和种种挑战。《守护自然》着眼于幕后故事, 它详细地讲述了人们勇于尝试改变工作方法, 不断进取, 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事实再次证明, 只有经历过困苦并善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人们才能使自己的机构从众多机构中脱颖而出, 尽管这些困难有时是人们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气馁或伤脑筋的。《守护自然》中出现的人物正是从那些困境和危机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那些困难和危机迫使他们在面对考验时重新思考他们的行为, 重新制定更合理的组织原则、重新确定更好的工作方法, 以使 TNC 变得更强大。

在《守护自然》中, TNC 的领导者战胜了无数的挑战: 目标不清、组织文化冲突、保护模式陈旧、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管理方式、从美国本土自然保护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公共信任危机等等。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改革创新。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成为想要创建有魄力、有决心取得成功的保护组织的榜样。《守护自然》告诉我们, TNC 对创新方法的支持造就了成功的领导者, 他们勇于实践, 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返回目录】](#)

【刊物简介】

公益慈善周报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策划编辑，旨在为 NGO 领导人以及政府民间组织管理负责人提供一周公益慈善新闻回顾，把握当前公益慈善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从而为 NGO 机构发展与地方民间组织政策推动发挥积极作用！

【主办机构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人文与发展学院先后参与了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参与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民政部民间组织局相关政策调研项目、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以及众多国际与国内 NGO 的项目评估与监测项目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公益慈善领域主要关注的重点：

-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
- 公益组织发展咨询研究
- 公益项目开发、评估与监测
- 公益组织能力建设

【刊物订退阅】

如果您的同行或相关人士希望订阅此刊物，请发送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位至 gycsweekly@gmail.com 即可。

如果您希望退订此刊物，也请直接回复上面邮箱告知。

主办机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董 强
编 辑：赵丽霞、杨文、蒋育龙、陈婉君、阳慧颖
办公电话：010-62731470
电子信箱：gycsweekly@gmail.com